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a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原民臺記者如何報導阿美族豐年祭？

記者的文化價值與新聞實踐

How Do TITV Journalists Report Amis' Harvest Festivals?

Exploring Journalists' Cultural Values in their News Reports

潘文成

WEN-CHENG Pan

指導教授：洪貞玲 博士

Advisor: CHEN-LING Hung, Ph.D.

中華民國 108 年 8 月

August 2019

謝辭



不知道這是第幾個在辦公室待到凌晨的夜晚，終於！我完成了我的碩士論文。回首過去六年就讀新聞所的時光裡，嚴格來說，應該是兩年，把所有學分修完後，論文進度便開始緩慢行進，如今，它終於走到終點。

首先，我要謝謝我的指導教授貞玲老師，兩年多前聽完我的論文主題後，便義不容辭地擔任我的指導教授，從不限制我對研究主題的想像，每一次的 meeting 都能為我指點迷津，並給我不一樣的思考面向，一次又一次，讓我更加確定我的研究核心，並且在漫長的書寫過程中給予我鼓勵與支持，六年前是貞玲老師面試我進新聞所，六年後也是貞玲老師簽名讓我離校，很開心也很榮幸可以有貞玲老師這麼如天使般的指導教授。

同時，我也要謝謝錦華老師，碩一時在她所教授的課堂裡，肯定我的期末報告，因此給了我信心，也在她的影響之下，一直沒有讓我忘記當時想做但又無法全心投入完成的原住民新聞研究，如今我終於完成了；另外，也感謝嘉穗老師，是她的研究讓我得以在其原住民新聞研究基礎上，連結國外觀點，發展在地視野。我還想要說，有她們擔任我的論文口試委員，給予我詳細的建議，讓我更有具體的修改方向，真的是完成這份論文的幸運。

寫論文的這段過程，對我來說，非常孤獨，但很慶幸的是，原住民族委員會的同事們不時給我加油打氣！謝謝瑞盈處長，下班前總跟我聊上幾句，要我撐下去，繼續完成論文；謝謝我最好的姐姐莎韻・斗尻，偶爾的食物餵養與每日的心靈喊話，著實為我增添了不少信心；謝謝我最好的妹妹 Nawmi，我知道她不懂論文，但是她懂我；謝謝曾經的娃娃車司機方婕，謝謝她歷來對我的照顧與鼓勵，還有害她睡過頭的即刻救援；謝謝我的旗上經紀人瑪勒芙勒芙・杜姐利茂科長，在那段不時請客吃飯的光陰裡，不斷給予關心，要我努力完成論文；謝謝玉敏姐傾囊相授論文教戰守則，有如汪洋裡的一根浮木；謝謝康寧科

長，可以在他下面工作，是很幸福的事，總之，謝謝原民會同仁的照顧。特別謝謝阿高！在我請假專心寫作的那段時間裡，辛苦了，真的是我最好的妹妹。

當然，我要特別感謝我的母親潘春枝女士，支持我所做的每一個決定，當我因為還沒拿到學位，又沒工作的時候，面對親戚朋友的輿論，她只告訴我：

「做好該做的，不必在意他們。」，讓我感受到滿滿的愛，所以為了她，我一定要拿到學位；感謝我的父親姚春河先生，他雖不善言詞，時常唸我畢不了業這件事情，但我知道他所言都是愛我的表示，同時也鼓勵我很多；感謝我的兩個姐姐秀娟及慧珍，讓我在臺北做自己；感謝小阿姨與小姨丈，願意相信我；感謝所有家人，還有牡丹鄉及滿洲鄉的父老兄弟姊妹們，摯愛我的故鄉。

我還要謝謝我身邊所有朋友，嘉榮、晨皓、杜莉、基成、李垣、陳堯姐、任遠、劭文、Nunung、呂世豪、阿嘎西、康源晉、麗君、Uli、Nivu、丁繼、薛傑、志遠、潘璿、安博、文斌，族繁不及備載，都在我心中記著。特別要提的是，感謝近期芳怡姐陪伴挑燈夜戰，「連線」是很有效的同在；阿德，我們的約定，不管誰輸、誰贏，至少我們辦到了，就算我輸，也很甘心請客。

最後，感謝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於 107 年度提供本研究整年度「臺灣原住民訪問研究者」獎助學金，及民族所館藏資源，實為我的研究論文充實許多，且透過該所《午餐時間》讓我也能夠分享本研究成果，並獲得許多珍貴回饋與建議，也開闊我對民族學、人類學研究的認識。

最後的最後，感謝所有的研究參與者，百忙之中抽空與我分享原民臺新聞實踐經驗，言談中可見他們對原住民新聞的熱情與初衷，對我的包容與耐心，我都感恩在心，沒有他們就沒有這份研究；也感謝原民臺先進們於中研院民族所《午餐時間》現身說法，讓我的研究有了不同的觀點，替本研究圓滿不少。

真正的最後，給我自己，不要停止自我找尋，我，是阿美族，也是漢族。

潘文成 Mayaw 謹識於

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

中華民國一〇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中文摘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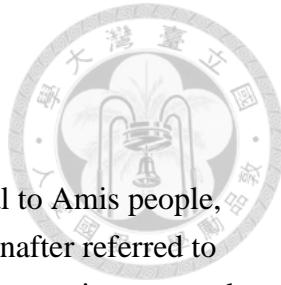


阿美族豐年祭為阿美族人重要的祭典儀式，在原民臺的報導中，常以基於文化、本於部落的報導方式作為其所秉持的原則。原民臺肩負原住民族文化復振、促進原住民族參與公共討論，以及彰顯原住民族主體性的使命，反映過去原住民新聞學相關研究所強調的報導原則，原民臺基於文化適切性進行族群新聞報導並提供反論述，實現設臺的核心宗旨，然而其面對部落爭議事件時，在報導實踐上未能適時扮演「看門狗」一角，揭露部落內部問題並引導部落內部自省，仍以翻轉主流媒體論述為主要報導原則。

本研究採取「文化價值系統」，分析後發現原民臺記者訴諸「集體主義」文化價值，尊重部落文化、遵守祭典禁忌。「性別」、「族群」、「族語」成為劃分記者與消息來源間「權力距離」的主要因素，為破除彼此間距離，記者們各展身手。而在報導爭議事件時，原民臺記者與新聞室站在同一陣線，本於部落，進一步彰顯出「高度規避不確定性」文化價值，不以追求即時的利益為目標，反之，考慮長遠影響，反映出「長期導向」文化價值。另，原民臺記者在彰顯「陽剛」文化價值的背後，亦帶出報導中女性形象逸失的現象，「沒有場外的女性勞動，何來男性的祭典實踐？」便成為研究者的反思，希冀在平衡報導的同時，也完整呈現祭典中男、女性別分工的智慧。

關鍵字：阿美族、豐年祭、文化價值、原住民族、原住民新聞學、新聞再現、原住民新聞

Abstract



The Amis harvest festival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ceremony and ritual to Amis people, and among the news reports of Taiwan Indigenous Television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ITV”), many were reported based on cultural viewpoint and community-centered principles. TITV carries the mission of revitalizing indigenous cultures, enhancing public discussion between indigenous peoples and demonstrating the subjectivity of indigenous peoples. Reflecting upon those newswriting principles learned from related researches of indigenous journalism, TITV have fulfilled its purpose by producing culturally appropriate reports and providing counter narratives; however, when encountering controversial incidents within the community, their reports seemingly failed to play the role of “watch dogs” by adopting the principle of reversing mainstream news discourse whereas the reports should lead the community members to internal discussion by revealing inner conflicts of the community.

The thesis adopts the cultural value system and the analysis results found that journalists of TITV appeals to the cultural value of “collectivism”, and respects both the community traditions and the taboos of its rituals and ceremonies. “Genders”, “ethnic groups” and “mother tongues” are the major factors to distinguish the “power distance” between journalists and news sources – the distance which journalists seek to diminish by showing their capabilities. Moreover, when covering disputed incidents, the TITV journalists choose the same side as the news room, with the community perspective and to further highlight on the cultural value of “high uncertainty avoidance” instead of pursuing on the instant benefits; in other words, to show the cultural value of “long-term orientation” after thorough consideration in the long run. In addition, while journalists of TITV emphasize on the cultural value of “masculinity”, the news reports also bring forth the phenomenon of losing female presence, to which the author ponders – can men conduct their cultural practices without the off-site labor force from women? After all, with the expectation of objective reports, the author hopes to balancedly present the wisdom from both male and female during ceremonies and rituals.

Keywords: Amis, harvest festival, cultural values, indigenous peoples, indigenous journalism, news representation, indigenous news

目錄



謝辭.....	i
中文摘要.....	iii
英文摘要.....	iv
目錄.....	v
表目錄.....	vi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緣起.....	1
第二節 研究背景.....	2
第三節 研究目的.....	6
第二章 文獻回顧.....	7
第一節 阿美族豐年祭的背景脈絡.....	7
第二節 西方新聞專業意理與主流媒體中的原住民族再現.....	12
第三節 族群媒體與原住民新聞學.....	18
第四節 「文化價值」與「新聞實踐」.....	30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方法.....	42
第一節 研究問題.....	42
第二節 資料蒐集與分析.....	43
第四章 原民臺《每日新聞》內容分析	51
第一節 報導區域分布特性.....	51
第二節 報導消息來源特性.....	56
第三節 報導著重面向分析.....	78
第四節 小結.....	104
第五章 原民臺「記者」訪談分析	111
第一節 原民臺記者如何「採訪」阿美族豐年祭.....	111
第二節 原民臺記者如何「報導」阿美族豐年祭.....	143
第六章 結論.....	177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建議.....	177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反思.....	181
參考文獻.....	183
附錄、原住民記者訪談大綱.....	192



表目錄



表 1：受訪記者與訪談資訊	50
表 2：報導所屬地區與則數	51
表 3：報導事件所屬地區與則數	52
表 4：報導事件所屬族群與則數	55
表 5：報導消息來源身分與人數	56
表 6：報導消息來源所屬族群與人數	67
表 7：報導消息來源性別與人數	70
表 8：報導消息來源使用語言與人數	76
表 9：報導消息來源人數與則數	77
表 10：報導著重面向與則數	79
表 11：報導立場與則數	88
表 12：受訪記者基本資料	110

第一章 緒論



還記得五年前那場令人印象深刻的課堂演講，澳洲學者分享著他的研究發現，我聽得入迷；那是我接觸原住民新聞學研究的開始，也讓我展開了這趟不可思議的旅程。

第一節 研究緣起

由衷記得，首次接觸原住民新聞學研究是在 2013 年碩一時，一堂名為「傳播理論」的課程中，邀請到一名學者 Folker Hanusch 進行專題演講。過程中讓研究者印象深刻的是，他論及有關原住民新聞學研究的發現，同時，藉由課前的閱讀發現，他的研究當中無不強調「文化」對於新聞實踐的影響，也讓研究者深感興趣。

Hanusch (2009) 在其研究中，著重於「文化」影響因素，分析英美國家與德國間「新聞室」內部運作的差異，且論及英美國家與德國間新聞實務工作之所以存在差異，導因於「社會文化」的影響，進一步肯定了「文化」與「新聞實踐」相互影響的關係。可見，「社會文化」對於處在社會結構中的「新聞媒體」與「新聞實踐」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力，又如同 Hanusch (2012) 於其研究中針對 15 個國家計 30 家報紙進行視覺化分析，發現「社會文化」影響媒體如何報導「死亡」議題；Hanusch (2014a & 2014b) 更在紐西蘭毛利新聞工作者的新聞實踐中探究了「文化」影響的軌跡，發現毛利傳統文化價值對於新聞記者的影響已是根深蒂固，並落實於新聞產製中。

因此，研究者認為「文化」在原住民新聞學研究中是值得深究的領域。這也讓研究者反思在原住民族電視臺中，擁有來自不同族群的新聞工作者，而在我國認定計有 16 族原住民族的臺灣社會裡，各自皆保有文化特色、祭典儀式，及其遵守的核心價值，對於各族群的原住民新聞工作者來說，原住民族群文化是否為他們形塑了一套「文化價值」？且這樣的「文化價值」是否對他們在新聞實踐的過程當中產生影響？而這樣的發想也成為了研究者於當時課程期末報

告所探討之主題，可惜的是當時未能提出完善的理論架構以釐清「文化價值」影響面向，僅就原民臺記者所認為不同於主流媒體，具有原住民報導觀點的新聞應當具備和條件進行探究，但研究結果卻讓我更確認「文化價值」對原民臺記者「新聞實踐」的影響是確實存在的。



當時研究者因自身的原住民族身分—阿美族，使得研究者以自身族群之祭典—阿美族豐年祭做為研究個案，探討原住民新聞記者的「文化觀點」如何影響阿美族豐年祭的報導。而當時的研究發現，進行原民臺記者在進行阿美族豐年祭採訪工作時，每一位原民臺記者皆表示：「進到部落就應當入境隨俗，儘管自己身為記者也要學習尊重部落祭典，以免觸犯禁忌。」，就算來自不同族群，原民臺記者皆表示，每當參與自身族群的祭典時，祭典的神聖性與不可侵犯性時常告誡著自己，連帶影響其參與其他族群的祭典時也要嚴謹地遵守該部落的祭典「禁忌」，而這樣的「文化價值」影響同時也徹底地貫徹在他們的新聞實踐上。

由於當時未能完善此一研究主題的探究，所關注之處未能全面地被分析並討論，使得研究者後續更投入原住民新聞學研究領域，過程中接觸了許多原住民新聞研究相關文獻，讓自己的學習觸角得以展開並且深化，也漸漸地將過去未完成的研究旨趣重拾，更將此一研究興趣做為本碩士論文研究主題，並同樣選擇以阿美族豐年祭做為研究個案。

第二節 研究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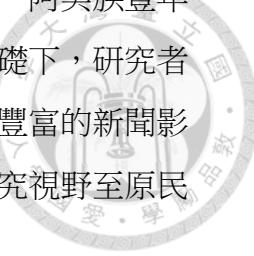
一、學術研究中的「阿美族豐年祭」

一年一度的豐年祭對阿美族來說是極為重要的歲時祭儀，從部落傳統的豐年祭直至現今都會區所舉辦的聯合豐年祭，都可以看出這樣的祭儀活動伴隨著時代的變遷、社會結構制度的改變而有所變化。時至如今仍為社會大眾所關注，同時更在暑假期間，成為新聞媒體爭相報導的對象。

觀察媒體相關報導，阿美族豐年祭時常被拿來當作促進當地觀光發展的引信，藉由傳播媒體大肆宣傳吸引大批遊客向舉辦豐年祭的部落朝聖，其中主流媒體便扮演了推波助瀾的角色；但回顧過去，主流媒體對原住民族群祭典的報導時常是偏向歌舞式、嘉年華會式的報導方式（謝偉姝，1998），往往忽略了祭儀的重要文化內涵，呈現的僅是原住民族唱歌、跳舞的歡樂景象，無形中也塑造了大眾社會對於原住民族群的刻板印象，且實際上，主流媒體的報導也時常與原住民族文化間的有著現實上的落差。因為這些看見，促使研究者想就主流媒體對原住民族的報導為基礎，深入了解相對於主流媒體，阿美族豐年祭在在族群媒體報導中的形象。

同時，本著原住民新聞研究興趣，研究者回顧過去以「阿美族豐年祭」做為分析個案的相關研究，發現過去研究著重於時空變遷中的祭儀形式流變的探究（黃緯強，2002；張育綺，2007；蔡中涵，2008；陳彥廷，2010；吳欣駿，2012）、歲時祭儀歌謠研究（王宜雯，1999；盧蔓竹，2007；孫俊彥，2012；陳維瑩，2013），以及阿美族祭典對於認同形塑的探討（黃貞璋，2008；林春鳳，2008；謝博剛，2010）為大宗；少數則以祭典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關係（林靜玉，2007；陳美玲，2011），及祭典性別平等的檢視（陳金燕，2015）為主題。

儘管先前研究未以「阿美族豐年祭」做為新聞報導分析的個案，但在其他有關原住民族祭典報導研究尚能看到黃譯淵（2008）以賽夏族「巴斯達隘」祭典做為研究主題，從多元文化觀點探討該祭典的相關報導；此外，亦能看到許多以「原住民」議題為主題所發展出的傳播研究，其中可見以原住民報導再現為題的分析（倪炎元，1998；王嵩音，1998a & 1998b；郭良文，2010；陳右果2014；鍾嘉順，2009）、以原住民傳播權發展與媒體角色做主題的研究（陳清河，2004；陸正誼，2004；林福岳、陳楚治，2008；林福岳，2010；林福岳，2012；洪貞玲，2013）、關切原住民新聞觀點與實踐的探討（謝偉姝，1998；張錦華，2012 & 2014；洪貞玲，2014；孫嘉穗，2014）等，其中又可見鍾嘉順（2009）與洪貞玲（2014）特以原住民族電視臺的報導做為分析對象，探究原民臺如何呈現原住民族群新聞。



根據上述的研究，可以發現在傳播研究的領域中，尚未見以「阿美族豐年祭」做為個案探討對象的研究，而就在豐厚的原住民傳播研究基礎下，研究者得以發展以「阿美族豐年祭」為題的新聞報導研究，且在原民臺豐富的新聞影音資料中，進一步探看原民臺如何再現阿美族豐年祭，並延伸研究視野至原民臺記者的阿美族豐年祭的報導實踐。

二、臺灣原住民族傳播權的落實－原住民族電視臺的成立

從臺灣統治政權歷史發展來看，臺灣原住民族群身在社會結構中，舉凡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面向深受統治政權的壓抑，想要透過「傳播」抵抗在媒體中長期被扭曲、被負面詮釋的族群性格與形象，進而掌握詮釋權，著實非易事。而原住民族群在追求自我發展的過程當中，於傳播面向來說，林福岳（2012）在其研究中指出，要重拾原住民族群於媒體中的話語權、詮釋權，應當建立起傳播主體性、落實傳播權。

而自 1948 年聯合國公布《世界人權宣言》並宣稱傳播權為基本人權之後，更可見聯合國和區域組織積極透過各種反歧視、維護族群多樣性、保護少數族群基本權利宣言、公約或會議等著力於爭取原住民族傳播權益。一直到 2007 年，聯合國通過《原住民族權利宣言》，宣言第十六條宣示了原住民族的傳播權益之外，也強調了國家對原住民族群傳播的責任，宣言主要為以下兩點：

- (一) 原住民族有權以自己的語言建立屬於自己的媒體，並有權不受歧視地近用各種形式的非原住民傳播媒體；
- (二) 各國應採取有效方式，確保國營媒體恰當反映原住民文化多樣性，而國家也應在不受偏見影響之下，保證能完全得表達自由，並且鼓勵私有媒體能充分反映原住民文化多樣性。

我國法律學者林子儀（1999）強調，在平等自由權的基礎上，應讓弱勢者有權近用媒介表達意見，讓社會上每個人獲得平等尊重。著眼於我國保障少數族群近用傳播媒體的相關法律，舉凡大法官解釋會議解釋文、通訊傳播基本

法、公共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廣播電視法與廣播電視法施行細則等，皆揭示了原住民族群有權近用並且享有傳播媒體的所有權（洪貞玲，2006）。



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廣泛地保障了原住民族語言、文化、民族地位、政治參與、教育文化以及社會經濟等權利，而在這樣的基礎之下，1998年通過的《原住民族教育法》第二十九條為傳承原住民族文化教育，政府應當編列經費或接受捐助成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設置專屬於原住民的傳播頻道與媒體事業，首次將原住民族群媒體的發展納入專屬於原住民族群的法源當中；直至2005年，《原住民族基本法》公布，其中更是明確地規範與保障原住民族基本權利，其中第十二條則積極要求政府為保障原住民族傳播及媒體近用權，必須成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進而規劃辦理原住民族專屬及使用族語之傳播媒介與機構。

2004年，原住民傳播界的浩角翔起，原住民族電視臺正式開台，經過半年的節目製播與頻道測試，終於在隔年的7月1號正式開播，成為全亞洲首創的《原住民族電視臺》（簡稱：原民臺），這也可以說是臺灣原住民傳播權實踐的里程碑。

歷經了台視、東森、公共電視等電視頻道製播，原住民族電視臺自103年1月1日起交由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正式自主營運¹。原民臺揭示以傳承文化、扭轉主流媒體形塑的印象、進行文化與語言的復振等重要任務，更強調為原住民族發聲此一目標，力擋主流媒體的扭曲報導，幫助臺灣原住民族拾起詮釋權，逆轉困境。

¹ 參見原住民族電視台官方網站。2007年12月21日立法院三讀通過的《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設置條例》，第一條明訂基金會設立宗旨為「傳承原住民族文化教育、經營原住民族文化傳播媒體事業」，2009年8月6日，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原民會）依設置條例規定，開始董監事人選之遴聘事宜，直至2010年1月14日，原文會經揭牌儀式正式成立，由洪清一擔任董事長。網址：<http://www.ipcf.org.tw/about.jsp>，上網日期：2016年5月23日。

第三節 研究目的



「豐年祭」延續至今已有長久歷史，是阿美族群重要的文化資產。基於本研究者興趣，試圖探看原民臺在相對於主流媒體的具體存在，是否真有別於主流媒體，能夠為原住民族的媒體弱勢處境挽回頽勢？然原民臺成立至今將近 15 年，在這個標榜為原住民族群發聲、試圖奪回原住民話語權的族群媒體又是如何呈現原住民族祭典的樣貌？尤其針對阿美族豐年祭此一個案，若將層次拉高視之，便是原民臺如何為原住民族發聲？

同時，為增添原住民新聞報導研究的熱度，研究者希冀社會大眾不單透過報導認識阿美族豐年祭，更期待能夠藉由報導背後的新聞運作感受到「人」的溫度，報導寫於記者，若能由原民臺記者之口，述說報導實踐經驗，與單純觀看報導的感受截然不同，就如同電影映後導演座談會一樣興奮，得以了解記者所做為何？更看見報導背後的故事。

回顧國外原住民新聞學研究，可見「文化價值」深刻影響「新聞實踐」，將視野轉至臺灣，思索臺灣原住民族群文化對於原民臺記者的影響，亦成為將「記者」帶入本研究的絕佳理由，先觀其報導，再聞其詳，了解其如何報導阿美族豐年祭？且在各自族群文化的薰陶之下，原民臺記者的「文化價值」又如何影響原民臺記者的「新聞實踐」？透過本研究直擊幕後，並且了解幕後運作的機制，在以服務部落為設台宗旨的原民臺建置下，帶出「記者」、「新聞室」與「部落」間角力，以釐清報導背景脈絡。

此外，研究者發現臺灣以「阿美族豐年祭」做為研究主題的傳播研究尚缺乏，為了厚植臺灣原住民新聞學相關研究及論述，研究者試圖以「阿美族豐年祭」為題，串連國外觀點，發展在地原住民新聞學研究的視野，更以本研究做為了解自身族群文化的媒介，期待在自我認同找尋的路途上，亦在學思的歷程中，留下足跡。

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研究以原民臺記者如何報導阿美族豐年祭為題，並檢視原民臺記者「文化價值」與「新聞實踐」間的關係。本章將由「阿美族豐年祭的背景脈絡」、「西方新聞專業意理與主流媒體中的原住民族再現」、「族群媒體與原住民新聞學」、「『文化價值』與『新聞實踐』」四節進行相關研究回顧。從耙梳阿美族豐年祭相關文獻，了解阿美族祭典文化；由過去主流媒體中的原住民族形象再現，理解原住民族處境；透過族群媒體的發展脈絡，在發展中的原住民新聞學報導原則中理出在地視野；並借用「文化價值」理論，因地制宜，做為分析原民臺記者的主要架構。

第一節 阿美族豐年祭的背景脈絡

首先，研究者得耙梳阿美族豐年祭的背景脈絡，並理解其發展淵源還有其祭典的文化意涵。但因阿美族於地理分佈與文化祭儀有所差異，因此研究者僅以現有的阿美族豐年祭相關文獻中構築出普遍的祭儀面貌，做為後續進行報導分析與深度訪談的背景知識。

一、阿美族豐年祭的意義與禁忌

(一) 淵源

蔡中涵（2008）指出，日治時期日本學者佐山融吉於 1911 年針對昔日台東馬蘭部落所做的田野報告中提到「Pafilong」一詞，阿美族語意指「過新年」，亦是我們現在所通稱的「豐年祭」，然「豐年祭」為小米豐收之意，但事實上阿美族人依據分布地域的不同而有慣用的名稱。阿美族主要分布在東部沿海平原，由北至南，北部阿美稱其為 Malalikid（漢語發音似馬拉力氣）；中部阿美稱 Ilisin（漢語發音似亦利辛）；南部阿美則稱 Kiluma'an（漢語發音似吉露瑪岸），而「豐年祭」一詞是直到 20 世紀才被普遍使用（陳雨嵒，2004），目前社會大眾與新聞媒體也多以此稱之。



觀看阿美族居住環境，可見大多聚居於平地，其傳統的生產方式有農業、狩獵、漁撈、採集、飼養，其中又以「農耕」最為重要。從阿美族文化社會中與農業相關的歲時祭儀就能看出阿美族與「農耕」密不可分，且在早期的農業祭儀就有播粟祭、祈雨祭、祈晴祭、驅蟲祭、收粟祭、貯藏祭、豐年祭等祭典儀式，其中以豐年祭為最盛大（郭祐慈，2009）。

阿美族人大約從春季開始耕作、播種小米，到了秋天進行收割，收成的小米必需經晒乾後放入穀倉，大約到了八月滿月時部落頭目就會下令全體部落族人開始「過新年」（蔡中涵，2008）。但因為文化差異與生活方式不同，阿美族的過年與漢人的過年亦存在著明顯的差異。

而對阿美族人來說，所謂的「過新年」則是在部落族人進行小米、稻米等作物收割後，主要以祭典儀式感謝眾神與祖靈的庇佑（陳雨嵐，2004）。而明立國（1989）則在其書中提到幾位阿美族頭目談論有關豐年祭的重要意義，主要有三點：（一）、讓部落阿美族人在歷經一整年的夏熱與冬寒後，身體能在豐年祭期間得到休息；（二）、阿美族人藉此盛大隆重的祭典儀式來紀念阿美族祖先；（三）、豐年祭的舉辦則表示一年過去了，部落族人要準備迎接新的一年。

從諸多影像與平面報導中，皆可見「豐年祭」對阿美族人來說，是一年當中極為重要的祭典儀式。現今，按其舉行的時間來看，因為各部落農作物的播種與收割，及習俗上的差異而有先後之分。但透過報導可見，各地區的阿美族部落主要還是在七、八、九三個月份中舉行一年一度的豐年祭。

（二）神聖性與禁忌

阿美族的豐年祭是規模最盛大並且熱鬧非凡的慶典，其中包含了政治、軍事、經濟、教育、訓練等功能，在阿美族人心中被認為最神聖的祭典，是族人延續文化與傳統的重要場域，（達拉烏拉彎・畢馬，2001）。就「俗世」的層

面來看，阿美族豐年祭有慎終追遠、感恩祈福的意義；另一則是將其視為「祭典」，乃因它本身具有「神聖性」（林春鳳，2008）。



依附在祭典「神聖性」背後，豐年祭亦有其「禁忌」規範族人，以維持祭典的順利進行。達拉烏拉彎・畢馬（2001）在其書中論及，阿美族豐年祭主要的禁忌與規範包含：（一）按中部阿美傳統習俗，第一天禁止女孩子參加，但最後一天則是女孩子須全部參加，並以其歌聲做為結束，亦為大家所稱的送靈儀式；（二）早期豐年祭的祭歌於平時不能唱，甚至連練習都不行，犯者會遭致禍患或生病，但如今因傳統漸漸流失，已無禁唱的規範；（三）、舉辦豐年祭時，未參加祭典歌舞者或遲到者須罰錢；（四）、豐年祭期間各部落宣布公休，一同慶祝，且豐年祭公休期間不得到田裡工作，犯者其家農作物會受到病蟲害；（五）、男性年齡階級皆須參加，違者須受處分；（六）、豐年祭男子在夜間歌舞（迎靈祭）活動中，女子禁止參加。

可見阿美族人在其豐年祭中有其「禁忌」，亦顯見，因為現代化社會的影響，傳統文化逐漸流失，文化禁忌逐漸鬆動，族人對此亦有調適，但仍能見阿美族豐年祭「禁忌」為祭典文化所刻劃出的面貌，主要反映在「男」、「女」性別禁忌。

（三）程序與過程

蔡中涵（2008）論及，阿美族傳統社會主要有三大特色：（一）是母系社會；（二）、有男性年齡階級制度；（三）、是領袖制度。而眾所周知，年齡階級制度是阿美族社會運作的重要部分，與領袖制度時常是相輔相成的關係，他們以部落集會所為中心，以部落頭目為首，透過男性年齡階級，各自扮演維持社會運作的角色，並完成任務。

「男性年齡階級」是指男子成年之後以「年齡」長幼為序而組織起的社會組織，其與豐年祭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對於豐年祭來說，年齡階級可以使整

個儀式與過程順利完成，同時，豐年祭也具強化年齡階級結構運作的功能（明立國，1989）。



在部落「男性年齡階級」的主導下，部落豐年祭的籌備與辦理就此展開。因為阿美族部落分布於台東沿海部落，各部落舉行豐年祭的時間不一，進行過程也不盡相同，甚至在豐年祭中會結合某一傳統祭典一同舉行，故本研究大致將阿美族豐年祭的進行程序整理如下²：

- 1、在「豐年祭」準備期間，必須要由部落年齡階級共同籌備；「豐年祭」前則由青年階級整理豐年祭會場，並進行祭典儀式的準備工作。
- 2、「豐年祭」第一天，傍晚天黑之際正式展開「迎靈祭」歌舞儀式。在迎靈的過程中，只有男性可入圈跳舞，女性與小孩可在一旁觀看，但不得進入祭典場內，以免觸犯禁忌。
- 3、「豐年祭」第二天，舉行「宴靈祭」。「宴靈祭」的氣氛不像「迎靈祭」般嚴肅、單調，反倒充滿著慶祝的氣氛。「宴靈祭」通常會舉行兩天以上，且在「宴靈祭」的最後一天會同時招待來賓，來賓則可邊享用美食、邊欣賞歌舞。
- 4、「豐年祭」最後一天，舉行「送靈祭」。該祭典儀式只有女性可以進舞圈中，且「送靈祭」的歌舞與前幾日的祭典歌舞較為不同，只有女性可以學習。而「送靈祭」的氣氛就如同「迎靈祭」般嚴肅。

可以見得，阿美族豐年祭是從「男性」的「迎靈祭」開始，由女性的「送靈祭」做結束。而對阿美族人來說，豐年祭的意義大致就是：慎終追遠緬懷祖先、維持社會結構運作、凝聚部落團結意志、感恩祈福慶豐收，以及解除厄運等。由男性年齡階級扮演祭典主導角色看來，有保守的長輩認為豐年祭是「男人的祭儀」，藉由豐年祭，男性年齡階級組織得以運作，並且肩負起部落文化傳承的使命。

² 參考臺灣原住民族資訊資源網。網址：http://www.tipp.org.tw/ceremony.asp?CD_ID=190，上網日期：2019年8月23日。

(四) 目前轉變



阿美族的傳統豐年祭已流傳許久，對於各地的阿美族人來說更是非常重要的祭儀活動。順應著時代的變化，明立國（1989）指出，阿美族人在快速社會變遷的過程中面臨考驗，因為受到教育、經濟、政治、工作等影響，迫使阿美族人離開部落而群集於都市中，部落傳統的豐年祭勢必有所變革，而在傳統文化流失的過程中，政府開始提倡文化建設，為讓國人了解阿美族文化，使得阿美族之豐年祭趨向「表演性」的活動。

在政府的推行之下，阿美族豐年祭進而演變成部落觀光的重要活動。盧夔竹（2007）在其研究指出，近年來出現了所謂的「聯合豐年祭」活動，政府每年舉辦此活動將各部落的豐年祭集結在一起，除了達到互相觀摩的目的之外，也讓外族人一窺阿美族豐富的文化內涵，但也在吸引大批觀光客與媒體前往的同時，無形中將豐年祭嘉年華化，「觀光化」的現象逐漸使得祭典喪失其神聖性，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娛樂性。

如今，豐年祭隨著時代變更，這些儀式更與表演體系、外來政治力量以及族群意識相結合而演變成大型的聯誼活動，如現今都會區的阿美族聯合豐年祭（王嵩山，2010）。達拉烏拉彎·畢馬（2001）歸納出阿美族豐年祭活動的形態有：都市型、康樂型、聯合型、原始型、綜合型等五大類型，其中聯合豐年祭在花蓮縣境內早已普遍存在，活動內容有歌舞以及各種競賽，節目亦經特別安排；此外，部落合辦的聯合豐年祭活動也提供機會讓彼此觀摩、交流情誼；但明立國（1989）卻也指出，聯合豐年祭的政治與觀光目的遠勝於它原有的傳統本質。

此外，就在政府以阿美族豐年祭推動觀光的同時，阿美族豐年祭成為媒體報導的重點，近年來也有許多研究者更以此祭儀活動做為研究主題（李富美、林榮章，1997；林靜玉，2007；林春鳳，2008；張子媛，2003；謝世忠、劉瑞超，2007）。阿美族豐年祭非但對阿美族群來說是極具重要性的祭儀活動，對

外界來說也是了解阿美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管道，於研究中更是展現出阿美族豐年祭深厚的文化基底。

然每年只要一到暑假，各部落豐年祭與都會區聯合豐年祭便緊鑼密鼓相繼舉辦，當地政府開始大肆宣傳，結合觀光旅遊業者與傳播媒體達到促進當地觀光產業發展的目的。豐年祭每年舉辦一次，加上不同部落舉辦的時間不同，對許多研究者來說便有多次機會能參與如此盛況，進行相關研究；而對本研究來說，暑假期間的阿美族豐年祭報導同時更提供分析需要，使研究者透過原民臺報導，以了解阿美族豐年祭的再現面貌。

二、小結

綜合以上有關阿美族豐年祭的文獻，可以看到阿美族豐年祭的意義與文化內涵，但卻也能夠發現因為時代變遷、社會結構與制度的改變，使得傳統文化不斷流失，加上政府推動觀光化的政策，使祭儀儀式變成一種觀光景點式的活動參與。在盛大的歌舞表演中可以讓外族群的人認識自阿美族文化，卻無形中將阿美族豐年祭塑造成一種嘉年華會的活動。不過，也能在諸多報導當中看見部落面對外來衝擊，亦試圖在儀式與形式上的變化中，盡力保存珍貴的阿美族文化核心價值，阿美族豐年祭儀活動雖逐漸流失所謂傳統的面貌，但阿美族人對文化意義的堅持，及祭典儀式的維護，卻是有目共睹的。

第二節 西方新聞專業意理與主流媒體中的原住民族再現

欲探究原民臺記者如何報導阿美族豐年祭，研究者認為應當從主流媒體中的原住民族再現談起，探看西方新聞專業意理所強調的新聞製播準則如何反映在原住民族相關報導，如此才能接續討論原民臺做為原住民族人的電視臺是如何呈現豐年祭？原民臺記者又是如何進行祭典相關報導？亦能幫助研究者理解原住民族在主流社會所處的位置，在主流媒體中所擁有的族群形象。

一、西方新聞專業意理

新聞媒體做為閱聽眾的「守門人」，為閱聽眾在資訊鴻溝中進行守門、把關。「守門人」一詞則源於 1947 年，心理學家 Lewin 以購買家庭食品的決定研究創出該詞，後續由媒體界學者延伸其概念，以「守門人」概念進行新聞組織與新聞從業人員的相關研究。



相關文獻指出，源於西方國家的新聞專業意理強調「真實」與「客觀」的報導，同時亦做為「守門人」所操持的新聞守則（李茂政，1987；李金銓，1988；彭家發、馮建三、蘇衡、金溥聰，1997）。從 Cohen (1963) 早期針對各國駐華盛頓採訪外交的記者之工作態度研究，將記者的專業意理分為「中立者」與「鼓吹者」。而李金銓（1988）接續就學者 Cohen 所提之兩種「守門人」的角色做擴大解釋：

- (一) 「中立者」守門人意理：傳統自由主義的象徵，強調客觀報導、反映現實；
- (二) 「鼓吹者」守門人意理：透過積極參與實際政治，鼓吹理想、實現目的。

「中立者」守門人意理將「客觀」報導奉為圭臬，可說是新聞專業化的具體表現，但「鼓吹者」守門人意理則是不以純粹做一個旁觀者而滿足，否認外在世界的客觀存在，認為新聞就是相對性的社會現實建構（李今銓，1988），較「中立者」守門人意理具批判視野。

由於採取二分法的方式，將新聞記者專業意理分為兩種稍嫌粗糙，故有學者又做了較細微的詮釋，將新聞專業意理分為三（Weaver, 1975；轉引自游明儀，2003）：

- (一) 資訊傳布者：廣受記者接受且實踐的專業意理，主要任務為傳達事實；
- (二) 解釋者：不僅分析事實，也可加入記者個人意見，但目的不在於說服閱聽眾接自己的觀點；
- (三) 對立者：於記者界較為少見，是力推社會運動、進行改革的「鼓吹型」。

可見相對於保守的資訊傳布者，在強調「真實」與「客觀」的新聞專業意理之外，記者在此基礎上還能加入個人意見，進行倡議改革。程之行（1991）則強調守門人應當兼顧「平衡報導」、「公平性」，以及「可靠性」等專業意理，強調媒體應描繪正確且全面的新聞面貌，並且重視他人處境，將不為人所見的議題加以陳述，最終在新聞來源的處理與媒體責任的兼顧之間取得平衡，獲得閱聽眾信賴。

除了諸位學者所提出的見解，觀察國外新聞專業組織規範亦能看出新聞專業意理規範與準則。美國「新聞專業記者協會³」強調在公眾服務、公眾啟蒙的前提之下，尚有以下新聞專業意理必須恪遵：

- (一) 發掘並報導真相：查證消息來源、勿扭曲新聞真實、開放意見交流，為弱勢者發聲；
- (二) 減少傷害：在同情與關懷的基礎上製作報導，勿傷及報導當事人與閱聽眾；
- (三) 獨立超然：避免利益衝突、勇敢拒絕權勢者；
- (四) 負責：勇於承認錯誤，嚴以律人更要嚴以律己。

而堪稱世界上最大的跨國廣電新聞專業組織「廣電新聞主管協會⁴」在強調「專業電子媒體記者應認知，對公眾負責為首要責任」的基礎上提出以下專業意理：(一) 公眾信託；(二) 事實；(三) 公平適當；(四) 正直操守；(五) 超然獨立；(六) 責任感。

由美國新聞專業記者協會所訂專業新聞製播意理，可見對於弱勢族群的關懷，並重視與消息來源間關係，廣電新聞主管協會則強調媒體應對社會大眾負責，除了追求真相、不扭曲新聞、指明消息來源、區別新聞與評論、呈現多元

³ 1909年，「新聞專業記者協會（Society Professional Journalist, SPJ）」成立於美國印第安那州DePauw University，屬於新聞同業的榮譽組織。參考自：《電視新聞專業規範與研究》。

⁴ 成立於1946年，由來自30個國家的廣電媒體新聞總監、新聞組織、教育界人士，以及學生所組成的「廣電新聞主管協會（Radio-Television News Directors Association, RTNDA）」。每月出版Communicator期刊，超過3000名會員。參考自：《電視新聞專業規範與研究》。

意見、報導本於個人專業非偏見、不抄襲，以及尊重公平審判權之外，必須遵守「公平適當」原則，在不傷害他人的前提之下完成報導。

二、主流媒體中的原住民族再現

上述研究與組織論述皆論及媒體應當具備的專業意理，亦為主流媒體時常秉持的製播守則，對原住民族群來說，應當被給予期待，期待能讓在臺灣社會結構中處於劣勢的地位、在社會資源分配不平等的現實狀況下，於政治、社會、文化、經濟難以被平等對待的原住民族群能在傳播領域中取得平等發言及被真實報導的機會。但長期以來，原住民族被定位成「被報導者」、「被詮釋者」的形象，在主流媒體當中被視為「他者」（*the others*）的角色，進而被主流媒體再現，處於一種被建構、被標籤化，甚至被污名化的處境，想藉由媒體發聲更是不易（Kress, 1996；Hall, 1997；林福岳，2010）。

主流媒體報導原住民新聞經常因為其媒體價值的偏誤與缺乏理解而使得原住民族在新聞報導中總是以負面、不實、被扭曲、被刻板化姿態出現。觀諸近年來許多研究顯示，報導中仍是充滿著主流觀點論述，也就是所謂刻板印象，以及偏見（倪炎元，1998；王嵩音，1998a & 1998b；謝偉姝，1998；孔文吉，2000；Pietikäinen, 2003；陳清河，2004；高德義，2004；林惠娟，2005；林福岳，2005；楊政霖，2005；Levo-Henriksson, 2007；黃驛淵，2008；張錦華，2012），而這樣的現象不勝枚舉。

謝偉姝（1998）在公共電視原住民記者觀點研究中，歸納出三點主流媒體在處理原住民新聞時產生偏疏的原因：（一）媒介制度面的缺失；（二）主流媒體新聞製作過程的偏誤；（三）文化背景的差異；其中因為媒介制度、媒體新聞室運作、以及文化的差異使得主流（漢人）媒體長久以來報導原住民的方式與框架主要呈現為：（一）把原住民當做「異文化」，偏向於製作祭典、嘉年華、歌舞式的報導；（二）對原住民族標籤化，偏向製作如雛妓、酗酒、犯罪等社會新聞；（三）對原住民族群文化與結構缺乏認知，導致缺乏較深層的內容。

孔文吉（2000）針對主流媒體對原住民族做的錯誤報導加以闡述，進一步指出錯誤報導主要表現反映以下三個層面：（一）將與少數民族相關之議題「問題化」；（二）疏於報導少數民族的成就與貢獻；（三）缺乏事件背景的深度報導；同時，他也針對主流媒體與臺灣原住民族兩者間存在三個應該被重視的問題：（一）缺乏與原住民相關之研究；（二）報導偏向凸顯「問題」與「文化」；（三）拘泥於「山花式的報導理念」。由此便能看出主流媒體因缺乏對原住民族群文化背景的認識，缺少對其所處之社會經濟結構的了解，進而導致在報導有關原住民族的新聞時，流於刻板印象、偏見，甚至是充滿歧視的報導方式。

王嵩音（1998a）以「還我土地運動」議題分析原住民族於主流媒體中如何被再現，發現新聞報導出現以下框架：（一）媒體強調運動的發生始於「外力影響」，引述官方對於事件的說法，不正式族群訴求；（二）偏向使用「瑣碎化」與「忽視」的報導方式，描述非事件重點之內容，並以忽視的方式讓族群聲音消失；（三）強調內部歧見，呈現族群內意見分歧，抱持悲觀的態度報導族群意識。

除了「還我土地運動」議題新聞，王嵩音（1998b）亦以蘭嶼核廢料場抗爭做為個案，發現各報所使用的框架為：（一）忽視：以不報導的方式處理；（二）低估化：低估參與人數，降低抗爭的影響力；（三）強調內在歧見：強調內鬨以醜化運動者；（四）不平衡報導：強調政府的努力，淡化抗爭行動；（五）強調外力影響：懷疑蘭嶼居民抗爭的自發性；（六）瑣碎化：報導表象，不深究行動訴求與問題癥結。

主流媒體對原住民族運動的刻意「忽視」與「瑣碎化」報導框架得以看出原住民族被「選擇性」地呈現，而非全面而有深度地被了解與詮釋。王嵩音（1998b）發現主流媒體支持「維持現狀」的主流意識型態，使用新聞框架機制框限原住民族的抗爭運動；而主流媒體更以「衝突性」新聞價值選擇的手段，迫使原住民族議題流於抗爭「有無」的判斷基礎上，淪落消失、無聲的處境。

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原住民族新聞報導的方式也隨之有所差異。王嵩音（1998a）指出，報紙中的原住民族相關報導趨勢可分為：（一）忽略期（70年以前）；（二）問題期（70年代前期）；（三）社運期（70年代後期）；（四）逐漸重視期（80年代以後），由此可以看出報紙媒體在80年代後對於原住民族的報導愈趨重視、在報導數量上明顯增加、呈現出較正面的形象，且針對文化相關之議題的報導較深入詳盡，不過也可以發現報紙仍然集中報導文化與原住民族運動的議題，顯示報導內容未隨著年代變遷而有所改變。

林惠娟（2005）以新聞論述分析的方式，分析國內四大報如何報導2003年花蓮縣長殺豬涉賄事件，研究結果發現，主流報紙媒介在爭議事件的報導上有些許異同，雖然論述當中可見對原住民族的關懷，但論述內容卻可見漢人的沙文邏輯與霸權心態，更加凸顯原住民族居於弱勢地位的媒介形象，使其成為新聞媒體論述中的「他者」。

上述研究點出主流媒體對原住民族的不當再現與詮釋，多出自於主流媒體對於原住民族先入為主的刻板印象、偏見與歧視，且在未了解的其文化內涵與社會中處境的狀態下，進行扭曲及不實的報導，甚至使原住民族在報導中被選擇性呈現亦或遭忽視。黃驛淵（2008）則在其〈當「Ta'ay」遇上「記者」—從多元文化觀點探討「paSta'ay」觀光化及其報導〉研究中以多元文化觀點切入，基於部落觀點及充權觀點，提出主流媒體報導原住民族新聞時的準則：（一）避免使用歧視性字眼與族群標籤：在新聞報導中，應去除族群標籤；（二）報導形式應多元：增加相關評論、特稿，以及分析報導，使新聞報導更加全面；（三）消息來源應多元並讓原住民族發聲：有別於主流觀點與論述，多呈現原住民族觀點；（四）關注原住民族歷史脈絡與處境：不以「去脈絡化」處理新聞報導，探究事件的背景脈絡與深層文化意涵；（五）讓「文化」回歸「文化」：不讓原住民族淪為被窺視商品、客體，其尊嚴與平等權利應受保障；（六）監督國家機器並挖掘真相：媒體應扮演「充權」的角色，對於社會結構所導致的不平等，積極挖掘真相與事實。

三、小結

由本節相關文獻回顧，可見臺灣原住民族在主流媒體中時常淪為「被報導者」、「被詮釋者」甚或「他者」，在主流媒體中的形象多為負面，其也關乎原住民族在臺灣整體社會結構中處於劣勢地位的緣故，若藉以反思西方國家所建構的主流新聞專業意理是否真能在原住民族群報導上體現所謂新聞專業？強調的「客觀」、「中立」、「公平」、「真實」報導原則是否真能彰顯於報導中？又真能在報導中看見弱勢族群的真實處境，並減少原住民族人做為消息來源時所造成的傷害？過去研究的確指出主流媒體對於原住民族群報導的偏誤，亦有助於本研究釐清過去主流媒體報導脈絡中，原住民族的定位何在？若要進一步討論原民臺記者如何報導原住民族相關新聞，這將會是一個重要的基礎，尤其在象徵著原住族人的電視臺—原住民族電視臺成立之後，在面對西方新聞專業意理的同時，全球另有一股勢力正在竄出以抵抗主流媒體對於原住民族的負面建構，力圖建構所謂的「原住民新聞學」，原民臺如何幫助原住民族群在主流媒體的建構當中拿回話語權，而在這樣的權利爭取的過程中又依循什麼樣的新聞學原則？便是在研究者探究原民臺記者報導阿美族豐年祭之前，需針對相關報導所進行釐清之處，亦做為後續進行原民臺記者訪談的基礎。

第三節 族群媒體與原住民新聞學

面對主流媒體對某一特定族群的媒體形象建構，甚或扭曲報導，為了滿足社會上明顯居於少數之特定族群的需求與權益，族群媒體應運而生，並且為少數族群近用，藉由族群媒體發聲，讓社會大眾得以聽見來自不同族群多元的聲音，而原住民媒體便是其中一種族群媒體概念的落實與展現，而身在西方所建構的新聞學歷史當中，原住民新聞學面對主流的新聞專業意理，逐漸發展出其新聞守則，本節將針對族群媒體相關論述進行回顧，此外，並就不同於主流媒體所操持的新聞專業意理—原住民新聞學觀點與原則，探看原住民族群媒體的新聞實踐。

一、族群媒體

從媒介的發展歷史來看，由平面媒體至電子媒體的演進，都能見族群媒體強調利用「草根式」的方式，為某一特定族群發聲（Fuller, 2007）。從族群本身出發，表現族群的文化、歷史、以及獨立的族群觀點。不過在與主流媒體角力的過程當中，可以發現在所謂「新科技」誕生之前，原住民族群的媒體形象幾乎都是由非原住民族群，亦即本文所指之主流媒體所描繪與刻劃，在當時大多需要透過主流媒體之眼才能看見原住民的存在。同時，新科技的出現使得原住民能夠透過更多不同的管道發聲，像是新聞媒體、影像、音樂等資訊科技發展下的產物（Alia, 2009）。

不可否認，媒介技術的演進讓全球原住民族群有了接近並使用媒體的權利，並透過該媒體自我實踐，為族群發聲。Ginsburg (2002) 道出傳播媒介在原住民傳播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也發揮了重要的功效。首先，原住民能夠在傳播媒介中加入自身族群的價值觀、語言，使傳播媒介成為一種「中子輻射武器」，以此破除主流媒體對原住民的刻板印象；再者，原住民得以創造一個談論的場域，用自己的方式回應來自主流媒體的聲音。然而這些族群媒體的出現讓原住民握有自我表述的機會，原住民更得以一同商議、發展自我論述、詮釋自我的認同與經驗，進而自主發聲，亦達到文化培力目的。

關於族群媒體的功能，國內外許多研究者皆針對此整理出許多族群媒體功用之論點。陸正誼（2004）以族群內部與外部社會區分族群媒體的功能，對原住民族群內部來說，族群媒體有傳遞文化與族群認同、凝聚社區共識、提供資訊、環境監測、社會教育、保障族群近用媒體權利等功能；對族群外部社會來說，則是保有原住民族群文化的解釋權、與外部社會的對話權、傳遞部落訊息、幫助族群融入與適應社會的作用。因此，可見族群媒體的功能，除了讓少數族群跨越族群內的鴻溝、凝聚族群內部認同，在社會不同群體間更是扮演了促進跨文化交流的角色，跨越少數族群與主流文化間的藩籬。

Levo-Henriksson (2007) 在美國原住民族群媒體歷史的研究中清楚地提到族群媒體有三大功能：（一）對抗主流文化的同化與主流媒體的建構；（二）保存語言、文化；（三）教育等功能，Brown (1996) 亦論及，原住民族群媒

體無疑具有教育社會大眾的功能，透過教育能讓主流大眾從族群媒體當中學習到何謂「傳統的價值觀」，並且了解到這樣的「傳統」並非「落後」（Levo-Henriksson, 2007）。因此，原住民族群媒體在對抗主流媒體論述的同時，發揚族群文化、教育不同族群的使命也更顯得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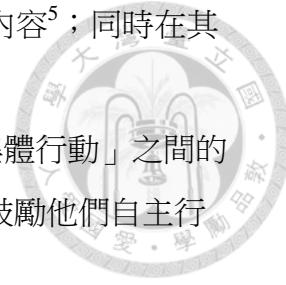
原住民族群媒體就如同一面鏡子，能夠反映自己的聲音之外，也能將這些聲音反射出去。國外學者 Rennie (2007) 界定原住民族群媒體是一個擁有特殊力量的媒介，能夠促進族群內部與族群間的相互理解，也能幫助改變閱聽眾與節目產製方之間的關係，把更多元的聲音及攸關族群利益的議題帶進「公共領域」討論。

原住民族群媒體的傳播行為背後有其目的與意義，Grixti (2011) 則巧妙地將其比喻為「一個啟示性的儀式」，可以再製強而有力的論述，並且在這一個充滿啟示性的情境當中，對抗主流媒體對某一特定族群的刻意遺忘與盲目印象。

身處在主流社會中，原住民族群媒體不僅要對抗主流媒體對特定族群不實的媒體建構，同時也有捍衛族群文化、防止被同化的重要功能，尤其在不同的國家與制度下，其所要擔負的責任也會有所不同。Brooten (2008) 認為原住民族群媒體反映了族群的多元面貌，且為保護自身不被國家政權所頒佈的同化政策所迫害因而產生的一種媒體。

在緬甸國內原住民族群媒體研究當中，Brooten (2008) 歸納出所謂原住民族群媒體對國家境內不同的原住民族人具備多項功能，其中即論及「人權價值」的落實：

- (一) 宣揚原住民的自決意識 (Promotion of Indigenous Self-Determination)：
保護族群的尊嚴，使他們免受忽視，不讓同化政策剝奪他們應該被尊重的權利。
- (二) 保存文化 (Cultural Survival)：原住民族群媒體擔負「文化傳承」的功能，復興文化、加強族群的自我認同，並將文化傳至下一代為其目的。



- (三) 教育 (Education)：傳遞與緬甸政治局勢相關的資訊內容⁵；同時在其中強調原住民族的傳統智慧⁶。
- (四) 號召行動 (Call to Action)：揭示「族群媒體」與「集體行動」之間的關係。原住民族群媒體使某一特定族群感受到歸屬，鼓勵他們自主行動，進一步改善族群處境。
- (五) 參與式的傳播型態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原住民族群媒體讓閱聽眾有提供想法的空間，藉媒體表達觀點。
- (六) 彰顯人權的價值 (Human Rights)：原住民族群媒體清楚展現了人權的價值；原住民族群媒體能告知閱聽眾如何去保護族群權利，提供資訊，利用這些資訊裝備自我。

族群媒體的興起確是為原住民族群帶來更多被看見的機會，且閱聽眾得以在參與族群媒體的實踐過程，彰顯人人皆有權接近並使用媒體的人權價值。不過，有學者提到，在整體社會框架下，面對有限的資源，原住民族群媒體的存在不免引人側目。Rennie (2007) 在分析澳洲原住民族群媒體的研究中提到，頻譜的「稀有性」與「有限性」時常被拒絕分配給原住民族電視臺使用，甚至將將頻譜的分享視為有利資源的浪費。

反觀加拿大公共傳播政策的與族群媒體的發展脈絡，從傳播的視野來看，加拿大極為強調每個人對媒體皆有平等的「近用權」，爾後，許多法律的制定進一步區別出傳播環境中特別需要被服務的群體，像是女性、原住民等群體。Roth (2000) 觀察發現，加拿大的傳播政策已從普遍的「每個人都有權接收媒體服務」的權利轉變為積極強調並重視社會中「需要特別傳播服務的族群」的權利。

⁵ 文中提到除了廣播電台，1990年，緬甸孟邦的人權基金會 HURFOM 開始出版獨立報紙 The Guiding Star，這是第一份專屬於緬甸境內孟高棉人的刊物，以孟高棉語 (Mon-Language) 為出版語，不僅將其他報刊中有關緬甸政治局勢的相關訊息翻譯成 Mon 語，也會針對讀者撰寫相關報導，讓孟高棉人能夠了解在大環境之下他們所面對的問題與困境。

⁶ Brooten 在文中提到，強調原住民智慧的價值是族群媒體的一個主要目標，讓原住民能夠看見在緬甸歷史演進當中，族群媒體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1999 年，加拿大原住民族電視網⁷（Aboriginal Peoples Television Network, 簡稱：APTN）的成立不僅肯認了加拿大國內原住民族群之多樣性，也落實了不同文化與族群得以被媒體表現的權利（Roth, 2007）。學者 Ignatieff (2007) 形容這個加拿大原住民電視網的成立，使得加拿大更接近所謂的「人權社會」。

觀諸族群媒體的興起，的確為少數族群傳播權落實的一大展現。傳播權被視為一種基本人權，早在 1948 年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就已經納入並揭示傳播權的重要性，宣言第十九條的主張：「人人有權享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此權利包括人均有主張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可以透過任何媒介，不分國界，尋求、接收，和傳遞消息和觀念的自由。」（U.N., 1948）。

儘管傳播權被劃分在普世人權的實踐範圍之內，但是卻不意味著少數族群的傳播權就得以受到保障。就如同學者筆下所述，臺灣原住民族長期以來一直被視為「他者」的身分與角色被再現，身處在無法呈現主體性的歷史邊緣處境（張錦華，2014）。當然，面臨這樣的困境不僅限於臺灣，而這是一個全球原住民族群所遭遇到的挑戰，且期待在國家政策的保護之下被平等對待、使原住民的傳播權更加確認。

當傳播權成為一種普世的價值，傳播權就如同水與空氣般重要，是個不可或缺的存在。而人類不分族群、不分你我，對媒體的接近與使用就是一種人權的落實，同時這樣的權利也應當被尊重，人們得以利用傳播媒介完善在經濟、社會、政治，以及文化場域中所追求的目標。傳播不僅使得某特定族群獨有的文化意義得以被交換、使人們自覺、自決、刺激他們採取行動改變現有處境，

⁷ 前身為北方加拿大電視網（Television Northern Canada, TVNC），1999 年 2 月 22 日由加拿大廣電主管機關（Canadian Radio-televis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CRTC）正式頒發執照，原住民頻道成立，並於同年 9 月 1 日開始向加拿大全國九百萬使用戶進行播送。

Lee (2010) 更以鞏固人的尊嚴⁸、使人類皆平等的理想做為傳播媒體於人權實踐的最終目標。而臺灣於2005開播的原住民族電視臺正是為此生、為傳達族群觀點而存在。



二、原住民新聞學

回顧過去文獻，原住民族群媒體發展至今已然有很長的歷史，觀諸原住民新聞學文化的演進，早在1828年，美國出現了第一份屬於當地印地安原住民的部落社區報紙，稱《Cherokee》⁹ (Littlefield and Parins, 1984; Levo-Henriksson, 2007)；澳洲於1836年出現了第一份由原住民族自辦的報紙 (Meadows and Molnar, 2002)；1842年，第一份毛利語報紙《Ko te Karere o Nui Tirenī》¹⁰ 出現 (Curnow, 2002; Hanusch, 2014b)，接著歐洲原住民Sami族更是在1906年創辦了第一份政治性的報紙。迄今全球各地已有許多原住民族群媒體，舉凡報紙、廣播，以及電視媒體皆用著自己的方式，為族群發聲。

原住民族群媒體的誕生其來有自，象徵著原住民族群本體的思考，在族群的文化基礎上，實踐所謂原住民族群的新聞價值。Hanusch (2014a)先是強調原住民新聞學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資源，其中保有了一族群的「文化思考」，能夠提供我們檢驗原住民新聞學文化如何集結，並做為認可原住民新聞在主流新聞環境中佔有主導地位的一個重要管道。無庸置疑地，全球原住民族群媒體的出現得以幫助研究者了解原住民新聞學文化的發展，並將其理論化 (Hanusch, 2007；轉引自 Hanusch, 2014a)。

⁸ Lee 於文章中提到，傳播權包含納入 / 排除、平等 / 不平等、近用 / 克制的議題，這些皆是關乎人類尊嚴的問題。

⁹ Levo-Henriksson (2007) 回顧美國原住民族群媒體的發展：1928年，第一份美國印地安人族群報紙《Cherokee》出現；1971年 - 1972年，原住民開始擁有自己的族群廣播電台。

¹⁰ 1842年1月1日，《Ke te Karere o Nui Tirenī》(The Messenger of New Zealand, 紐西蘭信差報)正式發行，該報目的在於讓毛利人能夠知曉歐洲人的生活方式語習俗，反之，歐洲人也能藉由此報了解毛利人的習俗，但是該報的實際目的還是在於幫助強化殖民 (Curnow, 2002; Hanusch, 2013; Hanusch, 2014)。

原住民族群媒體的發展讓許多研究檢視了不同國家的原住民族群媒體，更回溯其發展軌跡（Alia, 2010；Brown, 1996；Wilson & Stewar, 2008；Hanusch, 2014b）。Hanusch（2014b）試圖在原住民新聞學文化的探究當中，看見文化與原住民族群傳播的相關性與所呈現出來的特有面貌。



全球新聞學傳統的發展可追溯到由自身傳播給他人的口語傳播時期，在印刷術發明之前，大部分地區還是仰賴著說書人、演說家，及歌唱者來傳遞新聞。Hanusch（2014b）於研究中論及紐西蘭原住民新聞學的發展過程，發現過去 170 年來，新聞工作的實踐與毛利社會文化價值密切相關。

18 世紀末，歐裔白人落腳紐西蘭之前，毛利人已經建立起口傳歷史的傳統，有人相信毛利新聞和戲劇源自於他們說故事的傳統，傳統的演說家即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他們極具才華並經過嚴格的溝通藝術訓練，負責傳遞各樣的新聞給毛利族人部落，也可稱其為名符其實的知識庫，為了毛利族人的利益解釋著他們所感知、所觀察的世界，這也就是這些傳統演說家的重要性。而綜觀毛利新聞學的發展，可以發現在歐洲的殖民政權來到紐西蘭之前，毛利人已經有完善的新聞傳遞系統，且與毛利社會息息相關。

後因科技的發達，傳播媒介的演進，印刷、廣播、電視的技術出現，讓紐西蘭毛利人在面對歐洲殖民政權的壓迫有了反制的動能。毛利新聞學如同全球其他角落的原住民新聞學，在受到不斷鎮壓與控制的階段，為了專屬於自身族群的新聞媒體，紐西蘭毛利人不斷地抗爭，從歐裔白人手中爭取毛利族群媒體的控制權，用自己的方式產製新聞、訴說自己的故事。Hanusch（2014a & 2014b）強調，毛利「文化價值」使得毛利新聞學在殖民政權的支配下，讓毛利人不同於主流，同時也可以發現毛利人用以反制的手段當中，「培力」與「製造反面論述」便是原住民新聞學中最重要的面向，也是創造文化價值與政治目標之間對話的可能性。

在毛利新聞學的發展可見其與毛利「文化價值」緊扣，且見在整體社會變遷中，毛利人為反抗主流思維，所採取的新聞產製原則。Hanusch（2014a）在

另篇研究中，採用深度訪談，訪問 20 名分別於紐西蘭不同新聞機構服務之毛利新聞從業人員，其中包含新聞記者、新聞編輯、新聞節目導演、編劇，以及管理階層人員，在其所共同享有的毛利文化基礎上，探討毛利新聞從業人員的新聞實踐，並在與過去文獻的相佐之下，發現毛利新聞從業人員對於毛利電視臺所應具備的角色與功能，及自身新聞實踐的期待，可初步歸納出紐西蘭原住民新聞學主要彰顯的五個面向：（一）培力（empowerment）；（二）提供反論述（counter-narrative）；（三）語言復振（language revitalization）；（四）基於文化做適切性的報導（culturally appropriate reporting）；（五）看門狗（the watchdog function）。

由學者 Hanusch (2014a) 的研究可見，身為原住民族群電視、身為原住民新聞工作者，不僅要致力於報導具原住民族群觀點的新聞，在「培力」的面向上同時也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Pietikäinen (2008a) 在其研究中，透過與薩米族記者訪談發現，薩米記者相信自己在提供「另類公共空間」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亦表示原住民族群媒體是有別於主流媒體的場域，而在這樣的空間裡，原住民族人能切身討論自身議題，而這樣的空間甚至可以做為政治動員的工具。然而面對主流媒體論述，所謂的「培力」亦指，讓原住民有提出「反面論述」的能力，與主流媒體抗衡。

面對主流媒體對原住民刻板化、標籤化，甚至刻意扭曲族群形象的狀況，Pietikäinen (2003) 在其研究中提到，要反擊主流媒體負面論述的方式就是利用自己「正面」的文化故事去產製「反面」論述。Grixti (2011) 也強調，所謂的反面論述就是利用原住民族的文化傳統去反抗主流媒體中的不實陳述。而對毛利新聞記者來說，提供反面論述給主流媒體就是他們之所以投身新聞工作的重要動機，而鼓勵原住民新聞工作者提供「反論述」的過程亦是「培力」的過程 (Hanusch, 2014a)。

原住民族群媒體不僅肩負傳承族群文化、教育社會大眾以及傳達族群觀點的重責大任，其也被視為復興瀕臨滅絕語言的重要管道。Pietikäinen (2008b) 在薩米媒體與薩米語言相關政策的研究中談到，原住民族群一直在用自己的方

式接近媒體、生產媒體論述，媒體除了是建構身分政治、社群與國家的媒介，更是復振語言的重要工具。Hanusch (2014a) 也指出，「語言復振」是在許多以非原住民為主流的國家中皆需要面對的重要課題。過去一項研究訪問了十個歐洲少數語言社區的原住民族人，結果發現，超過三分之二的人認為專業的新聞學就是一個將語言功能納入新聞的實踐 (Zabaleta et al., 2010)。

要達到「語言復振」的理想，同時也考驗著新聞記者的語言能力，有些記者一進到原住民族群媒體便能夠操著一口流利的族語進行採訪與報導新聞，對有些記者來說卻有其困境，又加上了國內族群語言種類多寡的條件，著實又為此一目標的實現築起高牆。

臺灣目前官方認定的原住民族共有 16 族，方言別達 42 種，與其他國家相較之下，臺灣原住民族的語言豐富性高，要憑藉一個原住民族電視臺達到「語言復振」的確有其困難度，同時也挑戰著現今新聞工作者的族語能力。孫嘉穗 (2014) 針對原住民族電視臺族語新聞記者與主播如何在兼顧新聞準確性的同時，又能巧妙接合不同文化社會背景，以完成文化轉譯的研究發現，面對 16 族群間存在的文化差異，及 42 種方言別中分別存在詞彙以及意義的不對等，導致族語新聞難以做到即時又精確的翻譯。因此，「語言復振」不僅在國外是中所關心的議題，於國內亦是，且是原住民族電視臺盡心著力之處。

當談到「文化」與「原住民族群媒體」間關係，Pietikäinen (2008a) 確實指出，原住民族擁有自己的媒介，就能讓原住民新聞記者基於文化發展溝通的方式、促使理解經驗與觀點。且從原住民的觀點出發，就合法質疑、政治差異、歷史事件，以及經濟決策的詮釋來看，皆能夠使原住民的身分與文化更加具體可見 (Loew and Mella, 2005)。但在不同文化背景之下，新聞工作者該如何「基於文化做適切的報導」？Hanusch (2014a) 關心原住民族群議題是否在「文化」的基礎上被恰當地呈現，讓原住民族發聲、幫助與其他族群之間的溝通與理解，孫嘉穗 (2014) 則主要著眼於族群間「語言」的差異，來自不同族群的新聞工作者該如何完備不同族群文化間的轉譯，且強調族語主播的增能，強化記者對於不同族群的認識與理解。顯見原住民族群媒體做為建構族群文化

論述的平台，而報導原住民族群新聞時，應立基於「文化」的重要性，新聞記者應具備族群「文化」理解，才得以讓呈現出族群文化的意涵。

最後，「看門狗」一詞被看做是西方新聞學的同義詞，也就是監督政府之意，而此面向在原住民新聞當中亦是相當重要的一部分。在所有新聞組織當中，沒有人可以行之餘上，任何一個媒體組織都應肩負「監督」之職責，在紐西蘭，Hanusch (2014a) 提到，多數毛利記者強調媒體做為「看門狗」的重要性，但又有其矛盾之處，當毛利記者在報導爭議事件，且其爭議事件的主角是毛利族人的同時，要盡到「看門狗」責任是一件矛盾且令人沮喪的事情，族群身分與新聞實踐難以取得平衡。顯見，當記者面對自身族群身分、面對新聞專業、面對族人，對於族群內部爭議揭露與否？如何揭露？皆為記者的新聞實踐帶來矛盾與拉扯。

透過 Hanusch (2014a) 對毛利新聞學實踐研究歸納出，毛利新聞工作者應以身為一個「培力」的角色，提供「反論述」、主張「語言復振」、強調「基於文化做適切的報導」，同時扮演「看門狗」角色等五項原住民新聞學原則，為相對於主流媒體報導所發展出的原住民新聞學專業價值，提供研究者於原民臺記者如何報導新聞有初步概念。

反觀國內，早在 2012 年，學者張錦華針對 2010 年與 2011 年由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所舉辦的原住民族新聞報導獎項「雲豹新聞獎」的作品進行分析，探討入圍以及得獎的作品建構何種原住民觀點？研究基於傳播權相關文獻以，針對新聞獎的作品進行分析並歸納出五項原住民族新聞報導觀點（張錦華，2012）：

- (一) 原住民發聲：報導中主要的受訪對象為原住民。
- (二) 彰顯原住民文化特質：能藉由不同議題，彰顯原住民族深層的文化內涵。
- (三) 正向報導：於報導中彰顯原住民族的正向成就。
- (四) 原住民議題：在報導中能提出與原住民族相關之公共政策議題，此些議題具有強調反歧視、運動化、控訴化，與去中心化等特質。

(五) 跨文化對話：報導中能兼顧原住民族與其他族群（含漢族與其他國家）的不同看法，並且能以「平衡報導」的方式呈現。



除了利用內容分析法比較參賽作品所顯示的原住民觀點，張錦華（2012）經訪談參賽者後了解如何改善新聞獎中之不足面向，並從受訪者身上進一步確認，什麼樣的報導才是具備原住民觀點（張錦華，2012）：

- (一) 應反映當地問題：深入部落訪問，呈現部落聲音。
- (二) 應平衡報導與對話：針對爭議性議題，應找出正反意見，平衡報導。
- (三) 應具備反歧視觀點：報導原住民相關議題應不同於主流媒體，為原住民發聲。
- (四) 培力、正向報導：培力即是強調正向報導，幫助去除刻板印象。
- (五) 具自我反思的主體觀點：強調「從原住民角度出發的自我反思」，而非一味呈現原住民「被打壓」、「弱勢」的形象。

爾後，張錦華（2014）又以多元文化主義觀點為理論架構，從人權、傳播權的概念，分析族群傳播權的內涵與價值，並以加拿大、澳洲，與美國之族群媒體為分析之對象，進而提出多元文化新聞報導之原則：

- (一) 彰顯原住民主體及在地發聲。
- (二) 平衡報導及多面向再現。
- (三) 提供反論述、反歧視，並避免負面標籤。
- (四) 重視培力、正向觀點，但應避免觀光化、消費化。

洪貞玲（2014）則在其〈原住民新聞學：臺灣及全球觀點與實踐〉研究中整合了 Hanusch（2014a）與張錦華（2012）研究發現，將原住民新聞學歸納為七點原則：(一) 培力；(二) 提供反論述；(三) 語言復振；(四) 基於文化做適切性的報導；(五) 看門狗；(六) 彰顯原住民主體及在地發聲；(七) 平衡報導及多面向再現。

本研究進一步檢視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原住民族電視臺新聞製播自主公約（2018），所列原民臺製播新聞宗旨：

原視新聞部為原住民族電視臺之新聞編採、製作部門，以落實言論自由，提供公正、確實、客觀、多元化之新聞資訊為宗旨。原視新聞部同仁在製作各類型新聞節目時，誓言遵守尊重民主自由、族群平等及原住民族主體的原則。



其中揭示原民臺製播新聞的準則與核心價值，強調「公正」、「客觀」、「確實」與「多元化」的報導，且在製播新聞時應秉持尊重「民主自由」、「族群平等」及「原住民族主體」的原則。

此外，原民臺在其節目製播準則（2016）中明訂，報導各類新聞時應「尊重多元」、「秉持公正」、「保有理性」、「追求正確」、「審慎查證」，及「避免歧視與偏見」，實踐原民臺做為原住民族群媒體所擔負責任與角色：

- (一) 滿足原住民族於文化存續、政治參與、社會發展、教育服務，及娛樂休閒等需求。
- (二) 面對非原住民族群媒體訴諸刻板印象的報導，製播彰顯原住民族觀點報導，促進社會大眾理解，以做為原住民族發聲管道。
- (三) 以原住民族世界觀與知識體系做為節目製播內涵。
- (四) 鼓勵族人以族語發言，且尊重族群語言多樣性，及族群或族人對其語言的發言與詮釋，進行族語翻譯，以存續且活化族群語言。
- (五) 尊重各族群祭儀與文化活動禁忌與規範。
- (六) 尊重各族群社會慣習與組織。

初步可見原民臺所秉持新聞節目製播原則呼應洪貞玲（2014）所整合原住民新聞學原則中，「培力」、「提供反論述」、「語言復振」、「基於文化做適切性的報導」、「彰顯原住民主體及在地發聲」，與「平衡報導及多面向再現」等原則，唯有「看門狗」原則較難以從原民臺強調以「文化」為基底進行族群報導看出。反之，由原民臺所重視的報導主題與原則，及其所擔負的角色而論，可看出其所強調的原住民新聞製播觀點，大致符合張錦華（2012）針對「雲報新聞獎」作品進行分析所歸納出的五項報導觀點。



三、小結

本節透過「族群媒體」相關研究的耙梳，看見其所展現出能動性，扮演著對原住民族傳播權利爭取的重要角色；接續由紐西蘭毛利新聞學發展，看見「文化價值」對「新聞實踐」的影響；再由諸位學者的研究，界定何謂具原住民族報導原則？試圖建構所謂的原住民新聞學，而欲探看原民臺記者的文化價值如何影響其報導阿美族豐年祭，本研究須先進行原民臺阿美族豐年祭報導之分析，以做為後續訪談記者的依據。對照原民臺新聞製播自主公約及節目製播準則，與諸位學者對於原住民族報導觀點的定義，大致呼應張錦華（2012）研究所歸納出五項原住民族新聞報導觀點，且基於該研究涉及原住民族相關議題報導分析，因此，研究者於本研究採取該五項原住民族報導觀點檢視原民臺對於阿美族豐年祭報導的呈現。

第四節 「文化價值」與「新聞實踐」

於本研究中，研究者主要探討原民臺記者如何採訪與報導阿美族豐年祭新聞，其本身的「文化價值」如何影響新聞呈現的面貌？進一步理解原住民新聞記者所「做」為何？

一、「文化價值」指標

研究者耙梳相關文獻研究發現，早在過去，許多學者即試圖以價值系統做為分析取徑，試圖提出一完善「文化價值」取向研究模式，以了解一文化的內涵，增進文化間的了解與溝通（Kluckhohn & Strodtbeck, 1961；Condon & Yousef, 1975；E.T. Hall, 1976；Hofstede, 2001）。陳國明（2009）在其著作中論及，「文化價值」是評斷舉止行為的一套方法，文化價值無法經由感官直接察覺，必須從實際生活面向觀察並歸納，因此許多學者為了研究文化價值觀，進一步把文化價值具體化到文化價值取向，以利採取實證法進行觀察與研究。

直至荷蘭人類學家 Hofstede (2001) 的研究問世，其針對超過五十個國家中，數以千計的公司員工進行問卷調查，透過量化分析各國員工的「工作實踐」態度與觀點所反映出的社會整體「文化價值」，在了解社會整體文化對社會成員影響研究中，開創性地歸納出五項「文化價值」指標，亦做為研究者與本研究所欲採取的研究框架：

(一) 權力距離 (power distance) :

該文化價值指標涉及各國對於不平等 (inequality) 關係的展現，而這樣的不平等關係體現於人們生理與心理的特質、社會階級與聲望、財富、權力，及法律所涵蓋的權利概念。學者 Hofstede 藉以研究受試者接受不平等權力分配的程度高低，發現在權力距離小的組織與國家中，每個人相信平等 (equality) 一詞，認為人皆平等，皆有接近並握有權力的機會，較不注重僵化的社會階級、地位與頭銜，亦較不受性別與年齡的差異所限制，在此文化情境中，專業能力比層級結構重要，此類型文化情境得見於紐西蘭、奧地利、以色列與丹麥等國；反觀權力距離大的組織與國家則相對重視階層間的分野，有權力者與無權力者間的界線不容許遭僭越，此類型文化情境得見於菲律賓、墨西哥、印度與委內瑞拉等國。

(二) 個人主義 (individualism) 與集體主義 (collectivism) :

該文化價值指標涉及個人與集體間的關係，對於「個人」或「集體」重視的程度差異。學者 Hofstede 藉以檢視受試者間距離與團體目標達成的一致性，發現個人主義社會文化較崇尚民主作風，認為自己是一獨立個體，較重視自我、強調個人成就，身在組織中，即使不與他人建構社交與工作網絡亦能完成工作並達目標，具代表性的國家為美國、英國、澳洲、荷蘭等國；反觀集體主義社會文化則認為每個獨立的個體皆與所來自家族與群體有著緊密連結，以集體利益為首要考量，並以「保護 (protection)」與「無條件忠誠 (unconditional loyalty)」為核心價值，身在一組織中相對遵循組織的文化觀及價值觀，強調團隊合作，以組織所下指令為依歸，為所設定的目標努力，具代表性的國家為是委內瑞拉、厄瓜多、瓜地馬拉、巴拿馬等國。

(三) 陽剛 (masculinity) 與陰柔 (femininity) :

此文化價值指標涉及一組織與國家中「性別」差異所導致對於「工作目標（work goal）」之期待，根據學者 Hofstede 的研究顯示，女性員工偏向強調「社會目標（social goal）」，注重彼此間關係與幫助他人，反映細膩、善感的特質，男性員工則強調「自我目標（ego goal）」，關心事業與金錢，反映雄心、果斷的氣質，該指標所指涉的亦是一組織與社會文化的陽剛與陰柔氣質偏向。學者 Hofstede 發現，在偏重陽剛文化價值的社會脈絡中，組織與國家由所謂男性氣質所支配，偏重男性價值，具代表的國家為日本、匈牙利、奧地利、委內瑞拉等國；反觀偏重陰柔文化價值的社會脈絡，相對消弭對於男性價值的強調，將高度價值置於性別平等之上，具代表的國家為瑞典、挪威、荷蘭、丹麥等國。

（四）規避不確定性（uncertainty avoidance）：

該文化價值指標關乎組織中成員與組織「技術（technology）」、「規章（rules）」及「例行公事（rituals）」間的關係，「不確定性」意指，在組織中意外狀況發生的模糊性與不可預測性，「規避不確定性」則為組織成員在遭遇不確定性時，對於壓力的容忍程度，以及為避免突發事件與後果所採取的作為。學者 Hofstede 發現，在高度規避不確定性的文化情境當中，組織成員相信絕對的真理，依賴明確的律法、規章，以減少不確定性的發生，具代表的國家為希臘、葡萄牙、日本、比利時等國；反觀低度規避不確定性的文化情境中，組織成員相對能承受高度的焦慮與壓力，面對不同觀點與信念時所具備容忍度較高，且具有原創性與彈性的觀點與想法，並能輕易解決未知情況的發生，具代表的國家為新加坡、丹麥、美國與瑞典等國。

（五）長期／短期導向（long – versus short term orientation）：

該文化價值指標獨立於「權力距離」、「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陽剛與陰柔」以及「規避不確定性」四個文化價值指標，迥異於得出前四項文化價值指標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與研究樣本，Hofstede 早先在 1991 年援引跨文化心理學家 Bond (1988) 所發展出的中國人價值觀調查 (Chinese Value Survey) 研究模式，學者 Bond 則於其研究中初步揭示「儒家思想（Confucianism）」的影響，Hofstede 藉以調查來自 23 國學生樣本，發現偏向長期導向文化價值的國家主要為亞洲國家，奠基於對

於儒家思想的習得，強調堅持、節約、個人定性與尊重傳統等核心價值，西方國家及少數第三世界國家則較屬短期文化價值取向。後續 Hofstede 更確切地歸納出長期導向與短期導向文化價值的差異，長期導向文化價值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強調培育務實的美德、適應變動中的現況，並以取得長遠及宏大成就做為終身目標；反觀短期導向文化價值則較少考慮傳統及長遠的影響，反之專注於現狀、追求即時的成功與短期的利益，具代表的國家為英國、美國。陳國明（2009）在其著作中提到「儒家動力（Confucian dynamism）」一詞，指涉一套臺灣、香港、新加坡與南韓共享的文化價值觀，該價值觀以儒家思想做為基礎，在工作中強調對倫理與傳統的尊重，其中包含了對自制訓練、教育、學習技藝的重視，並且要求文化中成員以嚴肅的態度對待工作、家庭與個人義務。反觀上述規避不確定性文化價值指標以「真理」為信仰，而儒家動力所強調的便是「德行」。

二、「文化價值」指標與「新聞實踐」間的連結

欲探討各國文化價值差異性，學者 Hofstede（2001）所歸納的文化價值指標時常被援引做為研究理論架構，專注於紐西蘭原住民新聞學研究的學者 Hanusch（2009）便以 Hofstede（2001）跨國的文化價值研究結果進一步探究英國、美國與德國在基於文化的差異下，新聞學如何被付諸實踐，並且呈現何種差異。

根據 Hofstede（2001）的研究顯示，英美國家與德國之間的文化差異主要反映在「個人主義／集體主義」與「高／低度規避不確定性」兩指標中，因此 Hanusch（2009）採用文獻分析法進一步論證英國、美國與德國新聞學文化實踐的差異。

研究發現，從「言論自由」與「媒體所扮演的角色」來看，英美國家的媒體實踐情形反映出所有人皆能近用媒體，發表意見，而媒體即扮演促進公共討論的角色；德國媒體則以社會與文化菁英的服務為導向，主要以傳遞知識為首

要目的，Hanusch（2009）將英美國家歸納為偏向個人主義文化價值取向，德國則偏重集體主義文化價值取向。

就「新聞室內部運作」而言，英美國家多採取編輯與採訪分離之形式，使新聞的產製過程得以分層把關，呈現多元觀點，反觀德國則採取編採合一的方式進行新聞製播，不過在享有較高媒體自主性的情況下，偏袒的情形也較為嚴重。最後以「新聞道德守則」來看，德國的新聞道德守則較英美國家嚴謹，從報導相關原則的觀察便能發現德國有明確的新聞製播守則供遵循，由複雜的規則來監督語言呈現，避免造成錯誤。從 Hofstede（2001）的研究結果看來，便能發現高度規避不確定性的文化價值偏向如何影響德國新聞學的實踐，而再看英美國家的新聞實踐則對於不確定性的容忍程度相對高，屬於低度規避不確定性的文化價值偏向。

後續 Hanusch（2014a）因文化價值研究的應用，將「文化」因素的影響納進原住民新聞學的研究中，採取深度訪談的方式，訪問 20 名皆為紐西蘭毛利族，但分別來自不同新聞機構的新聞從業人員，分析其新如何進行新聞採訪與報導實踐，探看文化價值對其新聞實踐的影響。

Hanusch（2014a）的研究發現，紐西蘭當地原住民新聞學深受毛利族傳統文化價值影響，毛利語稱作「manakitanga」，待客之道（hospitality）、善意（kindness）、寬宏大量（generosity）、扶持（support）等內涵為其核心價值，強調對他人表示尊重、寬容與關心的過程。藉由 Hanusch 的研究可初步了解毛利族重視社會集體的價值、重視他人的感受，進一步可以看見在新聞採訪的實踐過程中，毛利記者重視與消息來源間關係，極力維繫彼此間誠信，也在採訪過程中表現尊重；當毛利記者進入部落採訪時，同樣身為毛利族的一員，自然而然地尊重部落、尊重傳統儀式，過程中展現誠意、遵守傳統習俗，強調在不傷及彼此間誠信關係與集體價值的前提下，完成採訪工作；另外，在其研究中亦可見毛利記者對於毛利族語的重視，強調語言復振是他們新聞實踐的最主要目的，認為使用母語可以更精確地傳達他們所想要表達的訊息與意義，並且認為在這樣的過程中，他們能更接近祖靈。

Hanusch (2014b) 論及過去 200 年來紐西蘭新聞媒介的演進歷程，綜觀毛利新聞學的發展，發現毛利新聞傳播者的新聞實踐與毛利傳統文化價值息息相關，新聞傳播者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實踐新聞工作，毛利文化價值已反映在毛利新聞學的歷史演進，毛利新聞學的實踐則是為傳遞消息與傳承文化。

由 Hanusch (2014a & 2014b) 的研究便可知，毛利文化價值對毛利記者的新聞實踐有著很大的影響。毛利新聞記者強調「集體價值」，毛利記者進入部落採訪，尊重傳統儀式、遵守傳統習俗，且注重與消息來源間的誠信關係，並關心攸關毛利族群文化存續的語言議題，顯出毛利記者對「集體福祉」的關注與「集體價值」的維護，反映出毛利文化價值呼應 Hofstede (2001) 所提「集體主義」文化價值指標。

若將目光轉至國內學者的族群新聞相關研究，可見孫嘉穗（2014）以雅美族主播與雅美族語新聞做為分析對象，研究原住民族電視臺族語新聞記者如何轉譯族群語言？原住民社會脈絡又如何影響新聞翻譯？面對可能發生的採訪與報導的困難，新聞工作者又採取何種方式克服限制？其研究論及雅美族社會文化中，男、女性別分工明確，海事活動是男性工作場域，主事造船及捕魚，女性工作場域則為芋頭田，以作物耕種與採收為主要工作，其中存在著因性別差異所衍生出的文化禁忌，研究發現，女性新聞主播認為「性別」差異與文化「禁忌」造成採訪困擾，此外，也因雅美族社會文化中男、女性別分工差異的緣故，有名的飛魚祭與造船相關工作主要由男性主導，因此在新聞呈現上多強調男性身影，女性則多退居幕後，或多以勞力慰勞男性的形象被再現，由該研究便初步看出原住民社會脈絡中，為了遵守文化禁忌，因「性別」差異而導致新聞實踐上的限制。確實，在臺灣有些原住民族祭典儀式並未允許女性參與其中，多時候導致女性記者在進行新聞採訪與報導時，因「性別」角色而造成新聞工作上的困難，體現出傳統文化中因「性別」的禁忌對於新聞實踐所造成的影響與限制。

除了「性別」對女性記者新聞實踐所造成的影響，孫嘉穗（2014）在其研究中提及原住民記者的「階級」亦為其採訪帶來的限制，研究中論及在階級分

明的排灣族社會中，當一名非屬排灣族頭目階級的女性記者欲採訪僅能由頭目階級配戴的琉璃珠文化時，基於族群階級制度，研究個案中的受訪頭目並未應允女性記者的拍攝要求，女性記者最後則請同屬排灣族頭目階級的丈夫出面解圍，才得以完成採訪工作。由前揭案例便可想像若要採訪部落頭目階級，新聞工作者極有可能因為與受訪者「階級」的差異而無法與其對話，進行報導前也必須預做足功課，並備有應對措施。

反觀 Hanusch (2014a) 的研究論及，在毛利社會文化中，毛利人極為尊敬由部族或部落所認可的耆老，或稱長老，毛利語稱做「Kaumātua」，而毛利記者在面對具備深厚毛利文化底蘊與智慧的長老僅能遵從，Hanusch 研究中個案提及：「毛利文化也可以是一種限制。」，耆老及其命令做為年輕毛利族人極為尊敬的標的，亦時常告誡其為毛利族的一份子，每當毛利記者完成新聞工作後則必須回到其部落，即使他們剛完成一則關於自身部落的爭議報導，毛利記者有時認為這使他們的態度分裂，但他們知道，新聞實踐就像一頂帽子，帽子戴上後仍保有毛利人的身分，可見毛利新聞記者的新聞實踐受這群因具備豐富文化涵養而被劃分出的「耆老」影響至深。

根據上述研究 (Hanusch, 2014a；孫嘉穗，2014) 發現，原住民新聞從業人員在採訪原住民新聞時所面臨真實處境與新聞採訪間的拉扯，及採訪手法的權衡，亦反映出新聞實踐皆圍繞「文化」此一概念。「性別」為男、女性劃分界線，並為遵循族群禁忌與慣俗，進而對雅美族女性記者與主播的新聞實踐造成限制，甚或影響族群中男、女性於媒體再現比例的多寡差異；「階級」則劃分出族群成員間位階差異，進而避免身處較低階級的成員越界，排灣族女性記者權衡採訪手段，由丈夫出面對話，以同階級間的對話消弭採訪者與消息來源間的距離；「文化底蘊」則象徵毛利族人對於毛利文化背景的理解程度，經過部族或部落所認可的耆老懷有深厚文化底蘊、握有聲望，做為年輕毛利新聞記者尊敬的對象，彼此間存在著不對等的權力關係，為彼此劃分出無形的距離，同樣遵循長者智慧與命令，但不否認對其新聞實踐帶來與自身族群認同上的矛盾；研究者認為，「性別」、「階級」與「文化底蘊」呼應 Hofstede (2001) 所提「權力距離」文化價值指標。

Hofstede (2001) 提道，「陽剛」與「陰柔」文化價值指標涉及一國家社會偏重男性價值與女性價值的高低程度，於此，研究者認為應從阿美族傳統社會的男、女性別脈絡談起，以釐清何謂阿美族男性價值與女性價值？孰重孰輕？初步從阿美族母系社會的傳統社會脈絡來看，其具備母系繼嗣、母系財產繼承及夫從妻居等文化特徵，整個家庭制度的運作仰賴母系親屬成員（許木柱，1987），且不可否認女性在家庭中享有較多的權利與自主性，但研究者卻認為，是否為「母系社會」無法直接論定阿美族傳統社會中社會對於男、女性價值的偏重，應當是各自彰顯。

在阿美族傳統社會中，女性主要做為農耕採集的生產者，男性則主事捕魚狩獵工作，性別的分工大致呈現出男主外、女主內的運作狀態，男性以「年齡組織」做為政治運作中心，女性則以「家庭」做為決策場域，劃分出「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兩區塊，而過去諸多研究便指出，男、女性別分工在其社會運作中呈現一種二元對立的關係。不過，黃宣衛（1989）於〈從歲時祭儀看見阿美族傳統社會組織的互補性與階序性〉一文中論及歲時祭儀中男（年齡階級組織）、女（家庭）性分工蘊含互補性及階序性概念，羅素攷（2005）延續其研究發現，並且在〈性別區辨、階序與社會：都蘭阿美族的小米週期儀式〉一文中，以小米週期祭儀的男、女性別分工與歸屬發現存有互補關係，並且透過性別區辨駁斥兩性二元對立的論述，彰顯祭儀週期中男、女間權力關係的可逆轉性。

蔡維庭（2012）更在其〈社會變遷中高寮阿美族的性別角色與社會認同〉研究中延續阿美族男、女性別分工具互補性的論述，並納入社會變遷影響因素，其研究發現，高寮部落阿美族人在變動中的社會脈絡中，兩性間分工仍存在互補性，且在權力變動的過程中，族人對女性的傳統認知轉變，女性得以藉由社會參與走出傳統女性管理家庭的場域，彰顯多元價值。由阿美族文化脈絡來看，男性價值彰顯於「年齡階級」、「公共領域」，女性價值則反映在「家庭」、「私人領域」，由阿美族社會性別二元對立至互補性的論述來看，兩者間並非決然無關，即使遭遇社會變遷、文化變動，男、女性價值皆扮演重要角色，且各司其職、相互補足。

不過研究者透過以往族群及祭典新聞研究分析看見，報導中往往不可見對於性別分工價值與意涵的解釋，報導所呈現的即是偏好以男性做為镁光燈的焦點，以主導者的形象再現男性角色，強調男性角色的重要性，而女性則多為勞動者與慰勞男性的角色形象，其文化底蘊與生命故事亦不可見，於本研究，研究者試圖以 Hofstede (2001) 「陽剛」與「陰柔」文化價值解釋之，多數族群報導偏重「陽剛」文化價值，強調男性價值，而少見女性價值，因此較難在報導中彰顯「陰柔」文化價值，不過這僅是報導所呈現出來的面貌，如前所述阿美族母系社會中的兩性分工實際存在互補性的概念，然在報導的呈現上，若難以兼顧則易形成報導對男、女性價值偏重的差異，所以研究者認為，新聞中強調「陽剛」或「陰柔」文化價值則取決於原民臺記者本身，該指標亦得以讓研究者檢視原民臺報導男、女性視野的多寡，進一步分析原民臺記者所秉持的文化價值偏向，並解釋該新聞實踐所因為何。

透過孫嘉穗（2014）與 Hanusch（2014a & 2014b）針對族群新聞與新聞記者的研究，及諸項論證阿美族傳統社會性別分工與文化祭儀間關係的研究（黃宣衛，1989；羅素攷，2005；蔡維庭，2012），對照 Hofstede (2001) 所提之五項文化價值指標，反映了「權力距離」、「個人／集體主義」及「陽剛／陰柔」等三項文化價值指標。

然而，欲探討原民臺與原民臺記者的新聞實踐，不單僅有新聞記者採訪與報導環節，新聞室則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為所有新聞報導進行把關。因此，在 Hanusch (2009) 筆下可見其延續 Hofstede 研究發現，進而探究英美國家與德國新聞媒體操作與新聞內容呈現之分析，發現「個人／集體主義」與「高／低度規避不確定性」等文化價值差異確實讓英美國家與德國在新聞媒體所扮演角色與新聞室內部運作面貌而有具體的分別，單看「高／低度規避不確定性」此文化價值指標，即具體反映在新聞從業人員將採訪取得資訊帶回新聞室內部經由審核的過程與結果，姑且不論新聞最終呈現為何，其中確實存在新聞記者觀點與新聞室觀點的拉鋸戰。

劉慧雯（2016）在〈客家電視臺駐地記者之研究：新聞選擇與組織團隊的角度〉一文中探討客家電視臺地方記者（駐地記者）在族群調中所扮演的角色，並試圖從「新聞多樣性」以及「記者與編輯視的新聞選擇」兩面向瞭解地方新聞的內容特色，並討論台北編輯中心（研究中指新聞室或編輯台）與駐地記者之間的組織磨合過程，發現駐地記者普遍來說側重個案與脈絡，在意個案的特殊情境，重視與消息來源間的關係；編輯台則強調結構與原則，傾向符合所謂的新聞專業意理，而當記者觀點與新聞室觀點相衝突時，「新聞室對抗」則隨之產生。

新聞室依著所謂的客觀、中立的新聞專業意理扮演文稿修正、新聞查證的角色，必要時為個人觀點過於鮮明的記者踩剎車，而駐地記者則依仗「現場知識」及「現場優勢」在新聞採訪（記者）與新聞審核（編輯台）的一端展現自主性，親身採訪成為了新聞判斷的依據，並以提供在地脈絡的方式尋求結構性的理解，記者的報導視野在採訪與審核的天秤上佔有一方重量，不可否認的，記者的報導視野一方面是組織馴化的結果，另一方面則為個人價值觀的影響（劉慧雯，2016）。眾所周知，新聞室與記者間互動屬於必然，原民臺記者必須面對新聞室的指令及對於新聞報導的指教，同時，原民臺記者也需要面對自「部落」與「族人」的要求，及「族群文化」的約束，因此原民臺記者新聞實踐不僅關乎「記者」與「新聞室」，更是與「部落」及「族人」三者間的角力關係。

學者 Hofstede (2001) 的文化價值研究以「規避不確定性」檢視跨國企業員工面對不可預測性事件的容忍程度，發現高度規避不確定性的員工需要具體的規範與準則予以遵循、避免犯錯。若將此一觀察視野轉為原民臺的新聞實踐，原民臺記者在面對原住民族傳統社會時，從過去文獻試想傳統文化使族人尊敬並謹遵，且人們重視集體主義，憂因一己之私損害集體權益；人們遵循男女分別，懼怕誤觸禁忌而天降責罰；人們明白長幼有序、尊卑有別，畏懼僭越本分而輕薄無禮。當原民臺記者必須面對新聞室的金科玉律，同時亦不可忽視「部落」與「族人」對其影響，如同面對傳統文化展現的集體，原民臺記者基

於身為原住民此一身分，在新聞實踐將面臨何種挑戰？對於兩場域的力量，或尊或違皆反映出原民臺記者價值偏重與新聞實踐準則的權衡狀態。

根據文獻的爬梳，研究者試圖將原住民新聞記者尊敬部落傳統文化，因而服從部落傳統慣俗與禁忌，進而權衡採訪手段此一行為解釋為對另種文化規範的尊崇而不願違背，其中亦包含記者與新聞室間的對話，因此，研究者亦試圖進一步勾勒出不同於新聞室的抽象文化概念與規範對新聞產製的影響，理解原民臺記者採訪自身或他族的祭典儀式時，對於不確定性的規避程度，原民臺記者在面對部落進行新聞實踐時，遵循傳統、權衡手段乃反映高度規避不確定性文化價值，挑戰傳統、不擇手段則反映低度規避不確定性文化價值；另，面對新聞室時，依循新聞製播守則顯現高度規避不確定性文化價值，勇於對抗製播守則顯現低度規避不確定性文化價值。

原民臺記者尊重傳統與否？研究者進一步思考學者 Hofstede (2001) 所提「長期／短期導向」文化價值指標及陳國明 (2009) 所論「儒家動力」概念，皆道出「儒家思想」是一套供亞洲國家所遵循的傳統規範與價值，其中強調「個人」與「家庭」的重要性，更要求文化成員應遵循「德行」。若進一步將視野轉移至紐西蘭，可見 Hanusch (2014a & 2014b) 筆下的毛利記者對於毛利族傳統文化價值「manakitanga」的遵從與推崇，亦能清楚看見該文化價值對新聞實踐的深刻影響；反觀國內原住民族群多達 16 族，各族群有其遵循的一套文化價值與規範，本文著眼於阿美族豐年祭，整體社會以男、女劃分權力場域，儀式中對男、女性分工與禁忌進行規範，從瓦古延續至今，不否認社會變遷導引的文化變動對傳統文化的鬆動與改變，阿美族傳統價值其來有自，讓族人在遵循傳統的同時，亦順應現代社會，延續文化內涵。因此本研究借用「長期／短期導向」指標檢視原民臺記者的文化價值偏向，強調阿美族傳統文化價值，倡導文化傳承重要性反映「長期導向」文化價值，較少考慮傳統，追求短期利益，於本研究解釋記者不顧傳統，以追求個人利益或其他短期利益的行為，反映「短期導向」文化價值，就研究者看來，某種程度上，原民臺記者面對部落呈現「高度規避不確定性」時，亦呼應「長期導向」文化價值，若呈現「低度規避不確定性」，則呼應「短期導向」文化價值。

三、小結

本文欲討論原民臺記者的「文化價值」與「阿美族豐年祭報導」產製間的關係，在學者 Hofstede (2001) 的文化價值研究基礎上，輔以諸位學者針對新聞組織、新聞從業人員所進行的相關研究 (Hanusch, 2014a & 2014b；孫嘉穗，2014；劉慧雯，2016)，企圖建構適用於檢視原民臺記者「文化價值」的指標，並且在諸項探究阿美族傳統社會男、女性別分工與文化祭儀間關係的研究中（黃宣衛，1989；羅素攷，2005；蔡維庭，2012），試圖加強「文化價值」指標與阿美族文化與相關報導間的連結，因此於本研究，研究者以「權力距離」、「個人／集體主義」、「陽剛／陰柔」、「規避不確定性」及「長期／短期導向」等文化價值指標做為分析架構，先行檢視阿美族豐年祭報導所反映出的文化價值，其中亦包含新聞觀點呈現的分析與歸納，並且在原民臺記者的新聞實踐中，針對針對其「文化價值」所影響新聞實踐面向進行研究。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方法



第一節 研究問題

本研究關切於原民臺記者「文化價值」如何影響其新聞實踐此核心問題，基於原民臺記者所屬（原住民）族群文化，試圖理解其於自身族群文化浸淫程度，及對自身族群及阿美族群祭典儀式的理解程度，釐清原民臺記者採訪與報導阿美族豐年祭新聞時所遵循的「文化價值」？並以學者 Hofstede (2001) 所提「文化價值」指標為分析依據，探看原民臺記者自身族群「文化價值」反映出何項指標？且研究者亦透過原民臺記者報導阿美族豐年祭新聞過程，探看「記者」與「新聞室」及「部落」所處狀態，亦說是彼此間角力關係，更深入理解原民臺記者「文化價值」影響的軌跡與力道，因此本研究首先提出一主要研究問題：「原民臺記者如何採訪與報導阿美族豐年祭典新聞？文化價值如何影響其新聞實踐？」

而欲探究原民臺記者所秉持「文化價值」與「阿美族豐年祭報導」間關係，必有所本，因此，本研究另一研究問題即是：「原住民族電視臺如何呈現阿美族豐年祭報導？」初步以阿美族豐年祭報導做為研究對象，以「區域分布特性」、「消息來源特性」與「報導著重面向」進行報導分析，而報導寫之於記者，故本研究以學者張錦華（2012）所提原住民族新聞報導觀點進行分析與歸納，試圖建構阿美族豐年祭報導原則與記者所持觀點，此外，並觀察報導彰顯出何種「文化價值」指標，以進行後續原民臺記者訪談。

本研究採取量化內容分析法及質化深度訪談法，以原民臺阿美族豐年祭報導與原民臺記者做為分析對象，並就以下兩研究問題展開本研究：

- 一、 原住民族電視臺如何呈現阿美族豐年祭報導？並彰顯何種原住民族新聞報導觀點？
- 二、 原民臺記者如何採訪與報導阿美族豐年祭典新聞？文化價值如何影響其新聞實踐？其中反映何種文化價值指標？

第二節 資料蒐集與分析



研究者為了解原民臺如何呈現阿美族豐年祭報導，採取量化研究方法的內容分析法，經由編碼與統計分析探看報導「區域分布特性」、「消息來源特性」與「報導著重面向」，歸納報導呈現之特質，後續為了解原民臺如何報導阿美族豐年祭，並探討其文化價值如何影響其新聞實踐，研究者於此基於內容分析結果，採取屬質化研究的深度訪談法，進行原民臺記者訪談。以上兩種研究法的操作方式、資料蒐集與分析方式分別敘述如下：

一、量化內容分析法

針對阿美族豐年祭報導文本，研究者使用內容分析法進行分析，以釐清阿美族豐年祭典新聞形塑來源及呈現面向。有關內容分析的定義與運用、分析對象與樣本選取方式、建構類目與資料處理的方式則分述如下：

（一）內容分析法的定義與運用：

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也稱為資訊分析（information an）或文獻分析（documentary analysis），而內容分析法的運用主要在解釋某特定時間某現象的狀態，或是某期間內，該現象的發展情形，它可以說是一種具有量化色彩的研究方法（王文科，2001）。

而 Zito (1975) 認為，內容分析是研究者針對書寫、口語、出版等形式的傳播內容進行系統性、客觀性、量化分析的方法。簡言之，內容分析法是一種注重客觀、系統的研究方法，也是定量描述傳播內容的一種方法（楊開煌，1998）。吳紹群（2002）則整合了內容分析法的定義與特色，表示內容分析法於「方法」上，其為注重客觀、系統與量化的研究方法；於「範圍」上，其分析傳播內容訊息，以及整體的傳播過程；於「價值」上，其針對傳播內容進行敘述性的解說與描述，更推論傳播內容對整體過程的影響；最後於「分析單位」上，其也能分析傳播內容中各種語言的特性。

也因此，內容分析法特別適用於傳播媒介方面的研究，以及回答傳播媒介研究中典型的問題：「誰說了什麼、對誰說、如何說、以及產生什麼效果？」（李美華、孔祥明、李明寰、林嘉娟、王婷玉、李承宇譯，2004）。當然，於傳播研究當中，內容分析法的使用範圍甚為廣泛，王石番（1996）在其專書中具體強調了內容分析法所應具備的五大功能：檢視傳播內容本質、探究內容表達形式、分析傳播來源特質、蠡測閱聽人特性，以及驗證傳播內容效果。簡言之，內容分析法可以說是一種將定性的資料轉換成定量資料的研究方法，予以分析、解釋的技術，以客觀的態度面對文本內容，並有系統地進行量化分析，推論該文本內容產生的環境與其意義（王玉民，1994）。

本研究試圖分析原民臺阿美族豐年祭報導，基於內容分析法於量化研究法中的功能與意義，本研究欲由祭典新聞的「區域分布特性」、「消息來源特性」與「報導著重面向」進行分析，進一步了解祭典新聞報導的特徵，因此，研究者認為內容分析法是在本研究進行報導分析時宜採取的研究方法。

（二）分析對象與樣本選取：

本研究以 2014 年至 2016 年為分析區間，以國內唯一的原住民族群電視—原住民族電視臺的阿美族豐年祭報導做為分析對象，因考量族語新聞多以《每日新聞》進行族語轉譯進行播出，並在研究者不熟習阿美族語的狀態下，進一步以原民臺《每日新聞》類別中的阿美族豐年祭做為分析樣本，且以一「則」完整新聞報導做為內容分析的基本單位。

研究者透過原民臺內部新聞片庫搜尋系統，以關鍵字搜尋阿美族豐年祭相關報導，於 2014 年至 2016 年間，發現共有 110 則報導，2014 年至 2016 年分別有 38 則、39 則，及 33 則報導。研究者進一步透過線上影音平台「Youtube」整理出相關報導¹¹，發現其中幾則僅是提及阿美族豐年祭字眼，並未以該祭典儀

¹¹ 因原民臺新聞部內部決議無法提供阿美族豐年祭報導之影音資料帶，且經該台表示，於線上影音平台「Youtube」已有相關影音資料帶，研究者轉由該平台取得相關報導影像。

式及相關議題做為報導重點，因此就重複及不相關的新聞報導進行刪減後，共取得 100 則與阿美族豐年祭相關報導，2014 年至 2016 年間，逐年分別有 37 則、36 則與 27 則的新聞文本，而這些報導則全數納為內容分析對象。



(三) 建構類目：

在確定分析的樣本數量之後，即針對分析樣本建構類目（category）系統，進一步分類媒介內容。而內容分析的成敗就決定於類目，類目建構越是周延、明確，運用於適合的研究問題與內容，則越有學術價值（王石番，1996）。類目建構則應當合乎互斥、詳盡，以及高信度的原則。王石番（1996）依其經驗並整合許多學者的看法進一步羅列出建構類目的原則，其中包含：符合研究目的、反映研究問題、窮盡、互斥、獨立、單一分類原則、功能性、可操縱性、合乎信度與效度等。

於本研究中，研究者欲分析 2014 年至 2016 年的阿美族豐年祭報導，針對報導「區域分布特性」、「消息來源特性」與「報導著重面向」進行分析。研究者參考鐘嘉順（2009）分析原住民族電視臺新聞報導所建構的類目，以及洪貞玲（2014）於臺灣與全球原住民族電視臺的新聞呈現研究中所使用的編碼表，進而依照本研究目的與需求，刪減以上兩研究中探究原住民新聞對「原住民整體形象」、「人格特質建構」的類目，修改並整合成適用於本研究之類目編碼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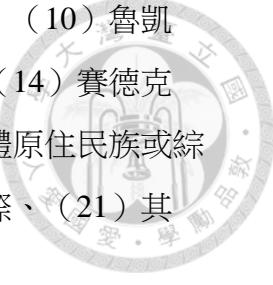
本研究所使用編碼表包含新聞基本資訊類目：報導日期、報導標題、報導長度、口語字數及報導記者等資訊，供研究者建立報導基本資訊，報導記者資訊則做為研究者選擇訪談對象之參考。後續則主要以報導「區域分布特性」、「消息來源特性」與「報導著重面向」三部分建構類目，可見報導「區域分布特性」部分包含報導所屬地區、事件所屬地區，及事件所屬族群等類目；報導「消息來源特性」部分含括消息來源身分、族群、語言、性別、人數等類目；而「報導著重面向」部分則包含報導立場，及報導所涉及各主題面向等類目，各類目之次類目及定義臚列如下：



1. 報導日期類目：以「年」、「月」、「日」分別標示。以西元年份末兩位數標示報導所屬年份，月份與日期則以數字直接標示。
2. 報導標題：直接剪貼報導標題，例：「港口部落宴靈祭 女性獻酒獻檳榔禮」。
3. 報導長度：依據單則新聞帶由主播開頭並進入新聞畫面至報導結束計算時間總長度，直接標示數量。
4. 口語字數：依據單則新聞帶由主播開頭並進入新聞畫面至報導結束計算總口語字數，直接標示數量。
5. 報導記者：依據每則新聞結束時，新聞字幕所標示的記者為主，直接標示名字。
6. 報導所屬地區：初步檢視原民臺 2014 年至 2016 年間阿美族豐年祭報導，阿美族豐年祭主要分為於原住民鄉鎮、部落舉辦之豐年祭，以及於都會地區舉辦的豐年祭，因此報導完成所在地也會因此有所差異，研究者將該類目簡單區分如下：（1）原住民鄉鎮市¹²、（2）都會地區¹³、（3）其他，三項次類目，依據新聞報導完成的地點標示編碼數字。
7. 事件所屬地區：初步檢視原民臺 2014 年至 2016 年間阿美族豐年祭報導，豐年祭有部落地區豐年祭與都會地區豐年祭之分，依照本研究目的，研究者將該類目簡單區分如下：（1）原住民鄉鎮市、（2）都會地區、（3）其他，等三項次類目，依據新聞報導所提的事件發生地點標示編碼數字。
8. 事件所屬族群：初步檢視原民臺 2014 年至 2016 年間阿美族豐年祭報導，都會地區豐年祭不僅以阿美族群為主要參與者，報導中議會強調其他族群的參與，因此研究者羅列出目前臺灣官方認定的 16 個原住民族群與「漢族」，且新增「全體原住民或綜合多族群」次類目，同時將非本國人士納入「國際」選項，並依照報導所提族群標示之。以下分別為：（1）阿美族、（2）達悟／雅美族、（3）排灣族、（4）卑南族、（5）布農族、

¹² 依照政府核定之 55 個原住民鄉鎮市，包含了山地原住民鄉鎮、平地原住民鄉鎮及離島蘭嶼。

¹³ 非屬於政府核定之 55 個原住民鄉鎮市之所有地方，並參考原住民族委員會「台閩地區各縣市鄉鎮市原鄉都市人口統計」之用詞稱之。



- (6) 泰雅族、(7) 太魯閣族、(8) 賽夏族、(9) 鄒族、(10) 魁凱族、(11) 邵族、(12) 噶瑪蘭族、(13) 撒奇萊雅族、(14) 賽德克族、(15) 拉阿魯哇族、(16) 卡那卡那富族、(17) 全體原住民族或綜合多族群、(18) 漢族、(19) 漢人加原住民、(20) 國際、(21) 其他。
9. 消息來源身分：以「原住民」與「漢人」之消息來源做為區隔每一次類目的依據，次類目中亦將非本國人士納入「外籍人士」次類目中，並依照報導所提族群標示之。以下分別為：(1) 原住民籍官方、(2) 漢人籍官方、(3) 原住民民間組織人士、(4) 漢人民間組織人士、(5) 原住民學者專家、(6) 漢人學者專家、(7) 原住民文化藝術人士、(8) 漢人文化藝術人士、(9) 原住民一般民眾、(10) 漢人一般民眾、(11) 部落傳統領袖、(12) 原住民其他、(13) 漢人其他、(14) 外籍人士。
10. 消息來源所屬族群：羅列出目前臺灣官方認定之原住民族群，加上「漢族」與「外籍人士」次類目，同時也為屬於跨族群之消息來源新增「綜合多族群」次類目，並依照報導所提族群標示之。以下分別為：(1) 阿美族、(2) 達悟／雅美族、(3) 排灣族、(4) 卑南族、(5) 布農族、(6) 泰雅族、(7) 太魯閣族、(8) 賽夏族、(9) 鄒族、(10) 魁凱族、(11) 邵族、(12) 噶瑪蘭族、(13) 撒奇萊雅、(14) 賽德克族、(15) 拉阿魯哇族、(16) 卡那卡那富族、(17) 綜合多族群、(18) 漢族、(19) 外籍人士、(20) 其他。
11. 消息來源使用語言：依據報導中受訪者所使用之語言標示。分別為：(1) 原住民族語、(2) 漢語、(3) 漢語加族語、(4) 外語、(5) 其他。
12. 消息來源性別：依據報導中受訪者之性別標示。以下分別為：(1) 男性、(2) 女性。
13. 消息來源人數：初步檢視原民臺 2014 年至 2016 年間阿美族豐年祭報導，單則新聞中平均至多出現 5 位受訪者，因此本研究以標示 5 位消息來源為編碼限制，並依據新聞中受訪者數量標示人數標示。若單則新聞中出現超過 5 位受訪者，於消息來源類目標示則以先後順序取前五位受訪者標示。
14. 報導立場：檢視報導內容對該祭典新聞採取的態度與立場。以下分別為：(1) 正面、(2) 負面、(3) 中立。

15. 報導主題：初步檢視原民臺 2014 年至 2016 年間阿美族豐年祭報導，研究者針對報導角度與面向將該祭典新聞所呈現的內容進行類目建構，並試圖達到類目間互斥且窮盡的原則，但因研究者意識到，阿美族豐年祭報導涉及「文化」多層概念，所呈現面向亦難以細緻切割，因此可能出現單則報導內容同時涵蓋兩個主題類目以上的情形，而就本研究目的而言，主要欲透過內容分析了解祭典報導著重主題與面向，不致影響本研究進行，更能看出報導產製較著重於何種主題面向。故研究者依據新聞所呈現的內容，當內容涵蓋兩個主題以上時，採複選的方式標示之，以滿足本研究所需。相關報導主題臚列如下：

- (1) 著重部落現今處境：以部落現今處境為報導主軸，以部落概況做為報導重點。例：部落簡介、部落經濟狀況、傳統文化流失、部落人口外流、部落災後重建等議題，並以祭典儀式做為陪襯帶出這些議題。
- (2) 著重傳統儀式呈現：報導專注於祭典與習俗由來的介紹、儀式過程之解說，並凸顯祭典中阿美族年齡階級與男女分工重要性等文化細節。
- (3) 著重文化傳承精神：報導中以祭典儀式帶出通篇報導核心，例：部落青年對傳統文化的重視、部落找回傳統並復振文化的成果、遭遇天災仍堅持文化實踐的過程，即使遇到困難也堅決落實傳承文化的精神。
- (4) 著重文化政策議題：以政府相關政策與祭典之間的影響為報導重點，並且關注族人觀點、政府說法，以及政策相關配套措施，例：祭典觀光化、祭典假、返鄉列車等政策議題。
- (5) 強調部落族人自主：面對部落所遭遇之處境，報導中帶出部落族人集結行動並且展現其自主性的過程，例：面對長期以來觀光客進入部落影響祭典進行而發展出的因應措施。
- (6) 強調跨文化的互動：報導中以祭典畫面舉行帶出跨族群、跨文化互動之面向，例：跨部落報信、聯合豐年祭。
- (7) 著重政治宣傳面向：祭典場合做為政治人物宣傳與原住民相關的政策，並以創造原住民福祉為報導重點。
- (8) 其他：以上類目無法登錄者。

二、質化深度訪談法



得出報導內容分析結果，做為原民臺記者訪談基本資訊，研究者續採取深度訪談法，並藉由訪談分析以了解原民臺記者如何報導阿美族豐年祭？並探文
化價值於新聞實踐的影響。

深度訪談即是研究者與受訪者間的互動，研究者為訪談設定了概括性之方向，藉由親身訪談，挖掘受訪者之答案（李美華、孔祥明、李明寰、林嘉娟、王婷玉、李承宇譯，2004）。訪談過程中，受訪者可以利用自己的聲音與語言，敘述他們所擁有的經歷，尤其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若能引導出受訪者在本研究主題中相關的認知與經驗，也能夠幫助研究者了解對於整體狀況之外的面向（江吟梓、蘇文賢譯，2010）。

而研究者於本研究中採取深度訪談法「半結構」式的訪談方式（顏寧譯，2011）。在訪談之前，研究者大致先設定訪談大綱的問題內容（訪談通用題綱參閱附錄一），所有問題的遣詞用字較屬隨意，且藉由綜合結構嚴謹與結構鬆散的問題，引導訪談的進行，彈性運用所有問題，亦不預先決定問題之順序，以輕鬆又不失主要結構的方式，從所有受訪者中獲得回答，這種形式讓研究者得以回應訪談的即時情況、受訪者的觀點，以及對主題的想法。

針對原民臺記者如何報導阿美族豐年祭此一研究動機，初步檢視原民臺2014年至2016年間阿美族豐年祭報導，由報導記者列表中挑選原民臺《每日新聞》記者與主播做為受訪者，且基於受訪意願進行訪談，本研究所有訪談對象皆於受訪前簽署訪談同意書，後續將訪談音檔轉打為逐字稿以利研究者分析；訪談時間多掌握在一小時至兩小時間，地點則以受訪記者方便受訪處為主，多半為辦公室、超商或咖啡廳；本研究總計訪問原民臺記者共5位，依照記者跑線地點區分為「北部」與「駐地」記者，分別為3位與2位，「駐地記者」則分別為花蓮及台東地區之記者；根據記者採訪路線則區分為「全路線」、「教育文化政治線」，受訪記者背景資訊如下表二，族群身分則以受訪者於訪談過程中所述逐一載明，於本研究中皆以英文代號方式呈現。

表 1：受訪記者與訪談資訊

編號	性別	族群	專職路線	訪談地點與時間
A	女	布農族 拉阿魯哇族	北區記者—全路線	2017/6/21 19:30-20:30 記者會議室
B	男	阿美族	駐地記者—全路線	2017/6/27 14:00-16:00 超商
C	女	魯凱族 卑南族	北區記者—教文政治線	2017/6/22 13:00-14:00 記者會議室
D	男	布農族	北區記者—教文政治線	2017/6/20 19:30-20:30 記者會議室
E	男	阿美族	駐地記者—全路線	2018/6/5 20:00-21:30 咖啡廳

第四章 原民臺《每日新聞》內容分析



本章聚焦於探看原民臺《每日新聞》如何呈現阿美族豐年祭報導，由「報導區域分布特性」了解豐年祭報導的區域操作面向，及原民臺就該類報導於各地的記者配置情形；由「報導消息來源特性」的分析，檢視「誰」掌握了發聲機會？誰是形塑豐年祭文化儀式面貌的來源？研究者亦針對該豐年祭進行「報導著重面向分析」，試圖了解原民臺在呈現原住民族群文化祭典新聞的同時，報導所著重的主題與核心為何？進一步檢視阿美族豐年祭典報導所呈現的報導觀點，而報導中又反映何種文化價值？

第一節 報導區域分布特性

本研究著眼於阿美族祭典的報導呈現，經檢視新聞帶，研究者將阿美族祭典分為：於都會地區舉辦的「都會區豐年祭」與在原住民鄉鎮市辦理的「部落豐年祭」兩大區域主題，並於類目建構的部份以「原住民鄉鎮市」與「都會地區」等次類目為報導完成地與事件所屬地進行區分，此一區域劃分亦做為與豐年祭相關文化政策議題報導及事件所屬地區分類之基礎，進一步探看整體祭典「報導所屬地區」以及「事件所屬地區」的分布，進一步了解該祭典文化報導的區域操作面向。

一、花東地區記者配置有限

表 2：報導所屬地區與則數

報導所屬地區	則數	比例
原住民鄉鎮市	61	61%
都會地區	39	39%
其他	0	0%
總數	100	100%

報導所屬地區，即原民臺記者完成該則報導的地區。統計結果發現，祭典相關報導達 61% 係於「原住民鄉鎮市」完成，多由原民臺駐地記者於部落進行

採訪、報導，整體而言，於當地完成之報導共計 61 則，而於都會地區完成之報導為 39 則。



由於阿美族人主要分布於花東地區，就都會地區與原鄉行政區之劃分，祭典的舉行多於原住民鄉鎮市，從報導所屬地區分布與新聞記者之統計，即能看出阿美族豐年祭典相關報導多為原民臺駐地記者親身採訪並進行報導，且根據報導的基本資訊亦可明顯看出花東地區的阿美族祭典報導多出自於 6 位原民臺駐地記者之手¹⁴，若細究報導則數，不含記者合力完成的報導則數，花東地區祭典新聞之採訪則主要由 3 位花東駐地記者完成，於此也能看出原民臺於地形狹長的花東地區，僅配置相當有限的駐地記者。

二、新聞著重部落族人觀點

統計發現，於都會地區完成的報導達 39%，其中包含了都會區豐年祭、都會跨族群聯合豐年祭的採訪報導，以及與豐年祭相關的文化政策議題報導，研究者發現，2014 年的報導當中有 5 則報導是於都會地區完成，但事件所屬地區則屬原住民鄉鎮市。

表 3：報導事件所屬地區與則數

報導事件所屬地區	則數	比例
原住民鄉鎮市	66	66%
都會地區	34	34%
其他	0	0%
總數	100	100%

經檢視新聞帶，研究者發現阿美族豐年祭報導除以傳統祭儀為報導重點之外，亦有與政府相關文化政策為主的報導，例祭典觀光化、祭典假與返鄉列車

¹⁴ 由新聞畫面所顯示完成報導之記者名稱加以統計，完成相關報導之花東地區駐地記者主要為「Kacaw」、「法物嘞」、「Yabung」、「Uliu」、「夫洛克」、「文傑格達德班」，在總數 100 則之新聞文本中，計有 25 則由記者法務嘞獨立完成，Kacaw 與文傑格達德班則分別獨立完成 16 則與 5 則之報導，係報導則數排名前三高的記者。

等議題，報導著重族人、部落觀點。由統計結果來看，該祭典報導中事件所屬地區，有高達 66% 的比例在原住民鄉鎮市，與報導所屬地區綜合看來，2014 年中有數則祭典新聞的報導完成地點是在都會地區完成，但卻報導關乎原住民鄉鎮市之觀點，報導名稱與時間排列依序如下：



標題：祭典開放觀光否？ 原住民族共同問題
(2014 年 7 月 3 日，原民臺)

標題：部落祭典觀光化 反彈聲浪起
(2014 年 7 月 7 日，原民臺)

標題：雇主忽視祭儀假 勞工盼增放假天數
(2014 年 7 月 13 日，原民臺)

標題：祭典官員致詞「犯規」 祭典規矩怎拿捏
(2014 年 7 月 18 日，原民臺)

標題：為部落而跑 10 天 達谷梵青年心路歷程
(2014 年 8 月 22 日，原民臺)

〈祭典開放觀光否？原住民族共同問題〉與〈部落祭典觀光化 反彈聲浪起〉此兩則報導皆關注在豐年祭舉行期間，祭典觀光化長期以來對部落造成的影響，並呈現出部落族人對於祭典觀光化的看法；此外，在報導中亦提到，官員參與部落豐年祭時，部落族人如何對豐年祭的舉行過程展現族人的自主性。

於〈雇主忽視祭儀假 勞工盼增放假天數〉該則報導中提到，自 2011 年以來，勞委會公告指定原住民「歲時祭儀」為勞基法所保障之法定假日，儘管如此，在外工作的阿美族人仍因現實工作狀況而無法順利回鄉參與豐年祭，同時也得面對工作得失的選擇，指涉的是阿美族部落族人所遇到的現實困境。

而在另篇報導〈祭典官員致詞「犯規」 祭典規矩怎拿捏？〉中就可以看出部落族人對豐年祭典神聖性的尊重，並且對政治人物往往將豐年祭做為政治宣傳的舞台此一行為進行批判。相較之下，較為軟性的新聞〈為部落而跑 10 天

達谷梵青年心路歷程〉報導中則是談到了部落青年在復振部落文化的路上所付出的努力，試圖傳達出文化傳承的主要精神。



由以上 5 則報導可看出，原民臺以祭典為主軸，進而發展不同報導角度。原民臺在呈現祭典所引發熱烈討論之議題報導時，不乏部落族人觀點，於祭典觀光化、祭典假的討論中加入族人觀察與感受，並關注族人在面對祭典因政治人物加入而遭受中斷的狀況所採取的對策，且將部落青年復振文化做為報導主題，進一步凸顯青年傳承文化的重要性，顯見報導試圖喚起青年的文化意識，進而返鄉傳承文化。

透過報導區域分布的特性，即可看出涉及祭典相關議題報導的完成主要仰賴花蓮、臺東駐地記者與台北地區記者之編採合作模式，台北地區記者因未能親身採訪花蓮與臺東地區阿美族人對祭典相關議題的觀點，故由駐地記者於原住民鄉鎮市完成新聞採訪後，並回傳至台北由北區記者與編輯整合後產出完整報導，由此亦能看出原民臺身為族群媒體，所呈現的不僅為祭典儀式本身，而更能關注祭典背後諸多議題與阿美族人的關係，試圖在報導中呈現部落阿美族人的現實處境，甚或現代原住民族人所共同面對的社會處境，透過原民臺為其發聲。

三、阿美族祭典新聞不乏他族觀點

從報導區域的分布進一步探看事件所屬族群的分布，意即豐年祭相關報導中所提及的族群概況。統計發現，報導阿美族豐年祭時談及阿美族群的比例為 70%，而談及其他族群的相關報導比例為 30%，其中多為原住民鄉鎮市部落聯合豐年祭、都會地區聯合豐年祭，以及文化政策議題相關報導。由此可看出，原民臺在以阿美族群為本位的報導模式中，著重阿美族人觀點，亦試圖於其他報導中納入其他族群觀點，顯出阿美族祭典報導中跨族群、跨文化互動的報導面向。

表 4：報導事件所屬族群與則數



報導事件所屬族群	則數	比例	報導事件所屬族群	則數	比例
阿美族	70	70%	噶瑪蘭族	0	0%
達悟／雅美族	0	0%	撒奇萊雅族	0	0%
排灣族	0	0%	賽德克族	0	0%
卑南族	0	0%	拉阿魯哇族	0	0%
布農族	0	0%	卡那卡那富族	0	0%
泰雅族	0	0%	全體原住民或綜合多族群	30	30%
太魯閣族	0	0%	漢族	0	0%
賽夏族	0	0%	漢族加原住民	0	0%
鄒族	0	0%	外籍人士	0	0%
魯凱族	0	0%	其他	0	0%
邵族	0	0%	總和	100	100%

報導中關於「祭典假」、「祭典返鄉列車」的報導，雖以阿美族豐年祭做為報導基調，但因祭典假天數過少而受到影響的並非僅有阿美族人，其他族群的族人同樣面臨了相同處境，因此報導祭典假報導指涉與採訪的族群也非僅為阿美族群；此外，近年來觀光化的影響，導致花東地區原住民族人返鄉車票難求，在祭典舉行期間要與大量觀光客搶售車票更是不易，因此報導中便可以看到為維護居住在花東地區阿美族、卑南族以及排灣族人回鄉參與族群文化祭典權利，於報導中有諸多討論，並納入阿美族群之外他族觀點。

而近年來，因為社會發展的關係，許多部落的原住民族人為工作而遷徙至都會地區，都會聯合豐年祭逐漸演變成讓不同族群得以相聚並交流情感的場合，因此，在豐年祭報導當中便可看到跨族群、跨文化互動之報導面向。

桃園都會區族人 savan (排灣族)

我看到不一樣的是，除了阿美族以外，看到其他族群，可以認識其他族群的朋友，所以我很高興參加這次豐年祭。

(原民臺，2015 年 10 月 24 日)

都會區聯合豐年祭也逐漸成為對於文化接觸的重要契機。透過聯合豐年祭能夠讓在都市求學的青年學子接觸到自身文化，不同族群的原住民青年也能夠透過這樣的場域接觸更多不同的文化，在其中認識到不同的文化歷史，報導中也一再傳達出文化傳承的重要性。



第二節 報導消息來源特性

於本研究當中，從消息來源的統計與分析可以看出在阿美族豐年祭典新聞的呈現當中，誰掌握了發聲的機會？於此也可看出哪些消息來源詮釋並形構了祭典的面貌。

一、有權力者成為新聞焦點的配角

經統計發現，阿美族豐年祭典相關報導當中所有消息人數共計 315 人，其中以消息來源身分來看，「原住民一般民眾」做為消息來源所佔比例最高，達 54%，人數計 169 人；而位居第二的為「部落傳統領袖」，所佔的比例為 16%，人數達 50 人；「原住民籍」官方消息來源則佔 9%，共 29 人，而「原住民民間組織」與「原住民文化藝術人士」所佔百分比皆為 6%，計 19 人與 17 人；「原住民學者專家」所佔人數為 4 人，以上六項「原住民」消息來源計 288 人，所佔消息來源整體比例達 91%，佔據相當高之比例，可見阿美族祭典新聞最主要的新聞來源為原住民人士，其於祭典新聞當中掌握主要話語權。

表 5：報導消息來源身分與人數

報導消息來源身份	人數	比例	報導消息來源身分	人數	比例
原住民籍官方人物	29	9%	原住民一般民眾	169	54%
漢人籍官方人物	15	5%	漢人一般民眾	7	2%
原住民民間組織人士	19	6%	部落傳統領袖	50	16%
漢人民間組織人士	0	0%	原住民其他	0	0%
原住民學者專家	4	1%	漢人其他	0	0%
漢人學者專家	0	0.0%	外籍人士	4	1%
原住民文化藝術人士	17	6%	總和	315	100%
漢人文化藝術人士	1	0%			

所佔比例較少的「漢人籍官方人物」於所有報導中佔 5%，計 15 人；「漢人一般民眾」以及「外籍人士」等消息來源則佔極少比例，分別為 7 人與 4 人，總佔 3% 之比例。



回顧以往消息來源相關研究，傳播學者羅文輝（1995）在其研究中指出，國內外新聞記者在選擇消息來源時都有明顯的偏向情況，其所指的就是，新聞記者在選擇消息來源時會系統性偏向於某些人物、團體或組織，而忽略其他人物、團體或組織。

羅文輝（1995）在其研究中發現，臺灣地區報紙與電視新聞中的消息來源向現象，主要反映在性別、職業、地區與職級方面。就職業此一面向來說，國內報紙與電視新聞都以政府官員、民意代表、學者專家以及社會工作人員為主要的消息來源（羅文輝，1995）。

而同樣研究祭典新聞報導的黃驛淵（2008）在其研究當中也針對消息來源偏向進行分析，結果發現，在巴斯達隘祭典期間的相關新聞文本當中，消息來源偏向大致符合羅文輝（1995）所得出之研究結果，以「行政機關首長、民意代表」、「專家學者、學術單位」、「部落組織、文化協會」與「警政相關公務人員」為主要消息來源。

而於本研究當中可以發現，消息來源偏向與前揭研究有所差異，以統計結果看來，本研究之消息來源偏向以「原住民／漢人一般民眾」所佔比例最高，達 56%，計 176 人；「部落傳統領袖」則位居第二，所佔比例為 16%，計 50 人；「原住民籍／漢人籍官方人物」與「原住民／漢人民間組織」所佔比例分別為 14% 與 6%，計 44 人與 19 人，「原住民／漢人文化藝術人士」所佔比例為 6%，但實際人數為 18 人，少於民間組織人數所佔比例；「原住民／漢人學者專家」與「外籍人士」所佔比例最少，同樣為 1%，計 4 人。

整體而言，本研究之消息來源偏向多寡依序為：「一般民眾」、「部落傳統領袖」、「官方人物」以及所佔比例相同的「原住民民間組織人士」、「原

住民文化藝術人士」，過去研究中受到仰賴之「官方人物」消息來源於本研究為位居前三，但仍遠少於「一般民眾」所佔比例，「專家學者」消息來源則不如以往研究所示受到倚重。



(一) 原住民一般民眾成為新聞焦點

經統計發現，消息來源身分「原住民一般民眾」在祭典報導中做為新聞消息來源的比例最高，人數多達 169 人。而原住民一般民眾在報導中通常扮演了祭典現場狀況的描述者、個人意見與觀點的提供者，以及面對事件採取自主行動的角色，針對祭典中某一事件提供描述性言語、意見與評論，並且實踐行動。

港口部落居民 Anu (阿美族)

就是你怎麼樣有正當性，我都是反對的，因為這是我的立場。我覺得，你來看是你有了攝影機，你一定是影響人在跳舞、唱歌，因為一個攝影機面對你的時候，就不對了、你的心態就不對了，所以男孩子在跳舞的時候，他應該是很認真在唱歌、在跳舞，然後在這個圓當中去完成跟祖靈的一種對話才對，那個場域是很神聖的，所以那是不容許被破壞的。

(原民臺，2014年7月25日)

福音部落居民 Dongi 徐采瑤 (阿美族)

很開心，因為第二天的情人之夜對有情人的人來講，其實是很特別的日子，在這三天的Ilisin裡面，我們都有期待這個第二天，不管怎麼樣都要回來部落參加今年的豐年祭。

(原民臺，2015年8月24日)

大橋部落居民 黃明進 (阿美族)

我們的家園被摧毀了，碰到這樣的颱風，我們也不能漠視部落的祭典，想法是這樣，一定要辦這個活動，我們做我們該做的，完成之後我們再修復受災的家園。

(原民臺，2016年7月15日)



不同於黃驛淵（2008）在其研究中所提到的，政治人物成為新聞追逐的焦點。在本研究當中卻明顯可看到，部落中非居於領導地位與耆老身分的一般族人成為報導中最主要的消息來源，與所謂的政治人物相較之下，政治人物在被選擇做為消息來源的比例則遠低於原住民一般民眾此消息來源身分。

於本研究中，政治人物分為「原住民籍官方」與「漢人官方」政治人物。在阿美族豐年祭典新聞當中，原住民籍官方政治人物主要扮演倡議的角色，針對祭典所受到的挑戰進行批判，並且提倡推動某政策的執行以改善現況。

前立法委員 Kolas Yotaka (阿美族)

為什麼我們的孩子每一年要重複記憶、被老師教導來自中國的屈原，這是我們吃粽子的由來，小朋友都知道，但是都不知道為什麼我們的祖先要划船出海，敬海神，我們海祭的由來到底是甚麼，因為海祭從來不放假。

(原民臺，2016年6月7日)

立法委員 陳瑩 (卑南族)

特別七、八月，你說台東、花蓮阿美族豐年祭時，光高雄就有上千個阿美族人在那邊，中部也有人來問住台中的怎麼辦，我們也有不少卑南族人住在那裡，所以南迴線的部份是不是也你們也可以研議一下。

(2016年6月22日)

宜蘭縣議員 孫湯玉惠 (阿美族)

因為我們居住在都會區，目前族人都對自己的文化式微，尤其第二、三代，所以我非常地擔心，所以想藉由一些文化的形式，讓我們族人更加認識。

(原民臺，2015年10月10日)



前原住民族委員會經濟發展處專門委員 舞賽・古拉斯（阿美族）

原民會與觀光局的角色，只是我們剛好看到了部落有這樣的需求，我們投入跟部落的族人一起做，可是我們秉持的一個重點就是，一定是尊重以部落為主體，要求在部落經營這個旅遊的族人朋友們，能夠維持不改變部落原始生態跟社會結構這樣的原則來操作。

(原民臺，2014年7月7日)

相對來說，漢人籍官方政治人物則扮演相關政策討論的回應者、原住民相關政策宣導的主角。

交通部觀光局副局長 張錫匆（漢人）

在過程裡面的確應該是要多注意由下而上，不是除了找部落族人的頭目、領導者溝通以外，盡量多跟我們在地族人充分做好深度跟廣度方面的溝通。

(原民臺，2014年7月3日)

內政部禮制行政科科長 簡鈺肆（漢人）

涉及我們原住民族的權益嘛，這個部分我們當然會會同原住民族委員會，那因為放假日增加的部分，可能會增加一些工商成本，那這個部分我們也會涉及到，譬如說勞動部經濟部，還有一些工商團體，再來審慎的研究這樣子。

(原民臺，2015年8月26日)

台鐵運務處營業科視察 劉雙火（漢人）

原本是規劃是由原民會統一來取票，原本是只有北部地區，現在範圍擴大了，那原民會那邊是沒辦法去處置這麼寬廣的一個地區，那就是由台鐵來協助來出售車票這樣子。

（原民臺，2016年6月28日）



桃園市長 鄭文燦（漢人）

保障社會住宅原住民族比例，在大園設置實驗高中，一年比一年熱鬧的豐年祭活動，長輩帶著青年，都踴躍參與。

（原民臺，2016年10月15日）

當報導角度著重在祭典進行中，政治人物所扮演的角色為何？經檢視新聞帶，多則報導提及以往政治人物多次干擾部落祭典進行，並將部落祭典的場域做為政治宣傳的舞台，故近年來些許部落採取相對措施，避免政治人物干擾祭典的進行，但研究發現，當原住民籍官方政治人物，或是漢人籍官方政治人物面對部落祭典時，與以往媒體建構的形象有所落差，做為消息來源時，在報導中，其認為自身在參與部落豐年祭是為安份守己的觀看角色，並呼籲大眾應確切落實尊重部落的原則。

前臺東縣長 黃健庭（漢人）

那我自己本身也會詢問部落，我可不可以站在台上講話？那自己也會盡量地不講話就不講話，打個招呼就好了。

（原民臺，2014年7月19日）

立法委員 劉櫂豪（漢人）

我們都只是一個被邀請的，甚至有時候也沒有被邀請，我們自己去參加，而不是想當然爾因為我們自己可以去主導，那豐年祭回歸它就是一個豐年祭。

（原民臺，2014年7月19日）

(二) 原住民籍傳統領袖為解釋祭典與歷史的重要消息來源



「部落傳統領袖」在報導中扮演了文化解釋的角色，其通常為部落頭目、部落領導者以及部落耆老，針對祭典本身解釋該文化細節與禁忌，在報導當中是為不可或缺的角色，也是建構祭典文化面貌的來源，是握有文化解釋權的消息來源。

比西里岸部落領導人 Raway (阿美族)

所稱獻源泉，會拿著傘，青年到溪裡杓水，也拿著竹壺，到了現代就一直這樣，有拿著傘，這樣走著一直到聚會所，那個就稱為獻源泉。

(原民臺，2014年7月5日)

奇美部落青年之父級長 蔣怡謀 (阿美族)

我們禁忌的部分就是女性月事來，不能觸碰我們的魚藤，還有老婆懷孕的也不能觸碰我們捕魚的物件，男性的老人家捕魚過後之時，才讓女性去捕。

(原民臺，2014年7月19日)

膽曼部落耆老 Lekal林德財 (阿美族)

部落祭典將落幕，如果婦女不跳舞。她們從一開始就沒有跳，從迎靈祭，所以長老就讓婦女進行 Mipihay (送靈祭)，她們所唱的歌，是她們互助換工種小米時的歌，而她們唱的歌，樹豆的樹蔭，pihay pihay 他們老人家的歌。

(原民臺，2016年7月21日)

除了解釋文化細節之外，「部落傳統領袖」同時也是部落歷史的訴說者，這些傳統領袖將這些口述史承襲，並且持續傳述部落過去的背景與歷史。新聞

開始以祭典畫面揭開報導序幕，多帶有部落面貌今非昔比之感嘆，「部落傳統領袖」以口述歷史道出部落遷移歷史與過去古今祭典樣貌。



僅那鹿角領導人 陳富貴（阿美族）

先祖Fowal是遷徙過來的，我所聽到的是從瑞穗富源來到東海岸，尋找泉源以及鄰近海、靠山的地方。以前老人家就是這樣，不會找平地，工作需要彎腰的，專門有山坡的地方，背才不會疼痛。以前老人家是這樣說的，所以就建立了部落，也辦了豐年祭。

（原民臺，2014年7月12日）

小臺東部落領袖 陽光福（阿美族）

從鹿野永安搬移到這個地方，因為在民國48年一場風災，讓我們搬到這裡小臺東，所以之後才遷移到我們這個部落，也將近有120位族人在外面工作的都回來了。

（原民臺，2016年8月15日）

以上所提的皆是「部落傳統領袖」在部落豐年祭點舉行時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與發言。但是若將視角移至都會區，傳統領袖帶出了部落族人遷移至都會區之後的生活樣貌、祭典儀式因何被挪移到都會地區，以及都會豐年祭做為一種固定習俗，持續帶給阿美族人豐年祭的精神意義。

前基隆市部落領袖聯誼會長 柯金生（阿美族）

15年前為了要傳承我們部落裡的文化，不管你在都會區也是一樣，一定要跟部落一樣，自己的文化要好好地傳承下來。

（原民臺，2015年9月28日）

靜浦旅北同鄉會 Kakita'an¹⁵ 楊福生（阿美族）

在新北市舉辦豐年祭行之有年，因為許多族人為了北上工作的關係，離開原鄉在都市生活，甚至是為了生養下一代，為了怕傳統無法延續才特地舉辦這個旅北豐年祭。

（原民臺，2016年9月25日）



新北市總頭目 陳雙榮（阿美族）

原住民阿美族的一個聯合豐年祭，所以在這裡我是希望我們每年都能像今天一樣，這麼的熱情、這麼的能夠生活在一起，來展現我們的活動。

（原民臺，2016年10月30日）

由報導可見，「部落傳統領袖」是一非常重要的消息來源，不僅解釋文化，更傳述文化。不管身在原鄉或是都會，能將部落歷史謹記，並透過祭典場合將這些歷史說與年輕族人，希望能繼續藉由他們將這些文化細節持續傳承下去。

而於黃驛淵（2009）研究所提到的「專家學者、學術單位」以及「部落組織、文化協會」是相對有權力的組織機關與人物，於報導中會發表評論、以自己的觀點解釋文化祭儀之展演行為，在新聞樣本當中為主要形構祭典樣貌的來源。

不過，在本研究中卻未反映出此特點。就「專家學者、學術單位」這一消息來源來看，在本研究當中「原住民學者專家」此一消息來源僅有 4 位，而「漢人學者專家」則未能出現。且經研究發現，「原住民專家學者」主要針對祭典觀光化發表其評論，也有學者專家針對都會聯合豐年祭長年以阿美族文化展演為主此一現象，提出疑慮並且提供改善的作法。

¹⁵ 阿美族語，意指掌管部落祭祀的望族。

屏東縣原住民部落大學校長 拉夫朗斯・卡拉雲漾（排灣族）
我們在面對部落要觀光化的時候，屬於我們的祭典，我們可以繼續走下去，但是那倒是要跟觀光是脫鉤的、是脫離的，因此如果他們一定要參加，那必須那個東西我們要像傳統一樣要有所限制啊，即便你要參加的話，你不是來觀光的，而是真的來參與那個祭典，參與那個年祭，而不是來好像是到動物園去看戲一樣。

（原民臺，2014年7月3日）



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助理教授 巴奈・母路（阿美族）
我們其實辦這個豐年祭跟別人期望的豐年祭是很大的落差，他們覺得是來尋找歡樂氛圍而已，可是他們不知道我們快樂的氛圍是跟很多無形的祖靈，我的Gaga、我的家人、我的祖靈在互動，他們看不到這個東西，問題是我們自己人也沒有這種資格，忙著應付世間事情，忘了去處理神聖的事情。

（原民臺，2014年7月3日）

義守大學助理教授 Kapi 尤天鳴（排灣族）
你一直辦下來之後，很多我們都會區的原住民青年，他根本沒有部落經驗，所以他怎麼樣在參加活動中，獲得他應該要學習，所謂的他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相反的他反而，會因為這樣一而再再而三的參加所謂的，阿美式的聯合豐年祭，搞不好他會認為自己是阿美族，這個是一個疑慮。

（原民臺，2015年7月21日）

義守大學助理教授 Kapi 尤天鳴（排灣族）
如果這樣的一個豐年祭要辦，並不是不好辦下去，倒不如就直接就冠於，它的民族的，本來就是以各個民族，來做一個祭典的區分。

（原民臺，2015年7月21日）



而就「部落組織、文化協會」此一消息來源看，「原住民民間組織人士」此一消息來源有 19 位，而來自「漢人民間組織人士」的消息來源同樣未能出現。「原住民民間組織人士」此消息來源大致為部落協進會、部落發展協會、部落旅北同鄉會，以及都會區聯誼會之成員，多針對部落祭典面對觀光化的現況發言；於部落祭典，以及都會豐年祭舉行過程發表意見。

比希里岸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Panay (阿美族)

以協會的立場來講，我們是一個窗口，就是部落的一個窗口，那其實很多的資訊都在協會這邊是比較多的，我們就會告訴他，哪一天有客人進來了，你的東西可以拿過來，或者是你可以在家裡等我們，我們會帶客人過去，是希望部落的人像這樣的向心力、凝聚力要再夠一點，我比較希望是這樣。

(原民臺，2014 年 7 月 7 日)

花蓮縣原住民塔古莫世耕地權益協進會理事長 林新平 (阿美族)：

我們為甚麼一年一次辦豐年祭，就是告訴大家我們的團結，也是讓政府看到我們真的在這裡，也請政府注視我們。

(原民臺，2015 年 9 月 26 日)

馬太鞍旅北同鄉會會長 蔡忠義 Futing (阿美族)

我們這一次，總共動員十個 Awid，就是年齡層，總共人數大概是 5 百多個人左右。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把我們馬太鞍固有的文化、固有的精神，能展現出來。

(原民臺，2015 年 10 月 26 日)

花蓮阿美族警察聯誼會長 余傳廣 (阿美族)：

為慰勞我們沒有參與部落豐年祭的同仁，所以我們選擇了這一天，讓全縣阿美族的警察同仁，通通都能夠參與，來回顧、分享我們的固有文化。

(原民臺，2016年9月25日)



綜上，在消息來源身分別的分析可以發現，「原住民一般民眾」成為阿美族豐年祭典新聞追逐的新聞焦點，而當祭典新聞中呈現祭典儀式之細節與意涵時，則極為仰賴「部落傳統領袖」此一消息來源，在多則報導當中可以看到其為形塑祭典樣貌，解釋部落遷移歷史的重要消息來源。

「原住民籍專家學者」主要針對某議題進行發言，提供個人觀點，未針對祭典細節進行解釋；而「原住民籍民間組織」主要描述部落與祭典進行現況，帶出祭典對部落族人影響深遠，有助凝聚族人向心力，並接續文化之意義；相對來看，「漢人籍專家學者」與「漢人籍民間組織」在報導中則未出現，可看出原民臺記者於此二類消息來源的選擇上，因為新聞主題之因素，未能將此消息來源身分納入報導中，而從整體統計數量看來，也能看出有權力者儼然成為新聞焦點下的配角。

二、自己的祭典、自己述說

表 6：報導消息來源所屬族群與人數

報導消息來源所屬族群	人數	比例	報導消息來源所屬族群	人數	比例
阿美族	267	85%	噶瑪蘭族	0	0%
達悟／雅美族	0	0%	撒奇萊雅族	1	0%
排灣族	9	3%	賽德克族	0	0%
卑南族	5	2%	拉阿魯哇族	0	0%
布農族	2	1%	卡那卡那富族	0	0%
泰雅族	2	1%	綜合多族群	0	0%
太魯閣族	0	0%	漢族	23	7%
賽夏族	1	0%	外籍人士	4	1%
鄒族	1	0%	其他	0	0%
魯凱族	0	0%	總和	315	100%
邵族	0	0%			

就「族群」別來看消息來源所屬族群分佈概況，統計結果發現消息來源所屬族群以阿美族、漢族、排灣族所佔的比例分別為 85%、7% 與 3% 的比例，其中可以明顯看出，來自阿美族的消息來源與其他族群所佔的比例懸殊，比例達 85%，計 267 人，位居第二的漢族人數則計 23 人，進一步從其他族群所佔的人數比也更能看出人數差異懸殊，有些族群僅佔 1 人，所佔比例不達 1%，如撒奇萊雅族、賽夏族與鄒族，其他族群甚至在報導中不可見。

研究者發現該祭典新聞當中，除了阿美族、漢族、排灣族做為報導主要的消息來源，其他族群如：卑南族、外籍人士、布農族、泰雅族、賽夏族、鄒族與撒奇萊雅族的身影在報導中也能被看見，雖以他族角度就阿美族文化祭典之參與陳述觀點，呈現該阿美族文化傳統與文化議題的同時，也透過他族的眼界關照該族群文化，達到多元觀點報導，也讓報導中能有更多元的聲音，研究者認為這樣的報導方式，也能讓更多不同族群的閱聽眾從不同的視角認識該祭典文化。

經檢視新聞帶，針對祭典相關政策討論的報導當中，多可見來自非阿美族群之消息來源，在報導當中主要針對該政策發表意見，由此可以見，關係到全體原住民權益的政策討論當中，研究者認為，原民臺記者試圖在這樣的報導呈現當中看見不同族群的聲音，如有關「祭典假」的報導中，帶出原住民族人因為祭典假天數少而未能全程參與祭典，進而影響工作權益，除了著眼於原住民鄉鎮市阿美族部落族人之觀點外，亦關照他族面臨相同議題時的看法。

旅北族人 根亞平（賽夏族）：

想說我要到（祭典）最後，但很多礙於工作的關係，有些會
跟老闆講：拜託拜託，可是有些人好像就算了，過完再說，
如果碰到祭典真的還蠻掙扎的，時間這一塊。

（2015年8月31日）

研究者也從新聞文本當中看見，於原鄉地區舉辦的豐年祭中主要還是以當地部落的阿美族人為主要消息來源，而都會地區聯合豐年祭相關報導則反映

出，如同祭典政策相關報導，都會聯合豐年祭報導，多有他族群參與阿美族都會聯合豐年祭之視角，該場域亦成多元族群聲音交會之處。



返鄉青年 Yukan (泰雅族)

因為我們長年都在外面讀書，所以參加這種活動是很不容易
可以參加的。

(原民臺，2015年10月10日)

桃園都會區族人 Savan (排灣族)：

我看到不一樣的是，除了阿美族以外，看到其他族群，可以
認識其他族群的朋友，所以我很高興參加這次豐年祭。

(原民臺，2015年10月24日)

桃園平鎮區排灣族貴族階級 黃蘭如 (排灣族)：

我們最希望是小朋友，有家長、有小朋友孫子，盡量來參加
我們的文化，讓小朋友知道我們以前過的生活。

(原民臺，2016年7月31日)

就「消息來源所屬族群」此一類目之統計，研究者臆測，記者選擇此類祭典報導之消息來源時多以「阿美族」族人為主，因為各族文化傳統的獨特性、以及考慮到對於該文化的理解程度與接近性，記者多偏向以該族群族人做為主要消息來源。

站在對於文化理解的角度來看，原民臺記者以「部落傳統領袖」做為解釋文化的消息來源，而該族群中非傳統領袖的「一般民眾」則同樣為採訪該祭典新聞的消息來源。因此，研究者也猜測原民臺新聞記者在進行其他族群文化祭典採訪的過程中也採取相同的模式，試圖完善對於該祭典文化的呈現，也讓該祭典能透過該族群族人進而發揚，但也在祭典報導中加入非該族群之消息來源

之意見與觀點，讓社會大眾在收看各族群祭典新聞的同時，也能看見不同族群的聲音。

從消息來源「身分」與「所屬族群」即可看出報導中，構築祭典文化面貌的來源主要為「阿美族」人，且從統計結果看來消息來源以「原住民一般民眾」與「部落傳統領袖」為大宗，是以部落族人做為發聲主體的方式呈現阿美族祭典新聞，對於該祭典文化的解釋權仍在於該族群本身。

由主要消息來源中所佔比例僅次於「原住民一般民眾」與「部落傳統領袖」的「原住民籍官方人士」、「原住民民間組織人士」、「原住民學者專家」、「原住民文化藝術人士」進一步對照整體消息來所屬族群分佈，更可以看出話語權仍掌握在阿美族人手中，也就是說原民臺新聞記者採訪祭典新聞時，除了訪問該部落之阿美族人外，在其他身分別之消息來源的挑選上仍以身為阿美族人的受訪者為主要訪問對象。

三、阿美族豐年祭報導中的女性形象逸失

在分析消息來源的過程中，經統計發現，報導受訪者為男性的比例相當高，達 75%，計 236 人，女性受訪者所佔的比例偏低，佔 25%，計 79 人，總數達 315 人，於此可看出男女間人數差異相當懸殊。

表 7：報導消息來源性別與人數

報導消息來源性別	人數	比例
男性	236	75%
女性	79	25%
總和	315	100%

在阿美族的傳統社會文化當中，男性年齡階級可以說是指標性的特色，年齡階級在阿美族部落中可說是一切公共政策與政治活動的基礎，其運作皆以部落為依歸，擔負了維護部落安全與文化延續等重要的任務，而顧名思義，年齡階級是以年齡長幼劃分為準則，依照年齡層的不同，在職務上的分配也會有所

不同（黃貴潮，1998）。年齡階級在豐年祭中所扮演角色是主導並確保祭典能夠順利進行，因此在阿美族祭典報導中，年齡階級常會是報導中不可缺少的重點之一。



在部落豐年祭的報導中，時常著眼於年齡階級的運作，除了訪問主要以男性為主的部落傳統領袖及年齡階級成員，針對部落傳統事宜、部落豐年祭舉行過程進行發言，道出豐年祭與年齡階級之間環環相扣的文化意義，以及年齡階級的重要性。

僅那鹿角部落Lokowi階級 Utal（阿美族）：

這是老人家傳承的切肉分食儀式，部落族人要吃的，這種木盤的從長老階級會依序分好，層層階級分明，像豬肝、豬頭肉、豬心都要先分給長老，晚輩不能優先享有。

（原民臺，2014年7月12日）

而在不同部落當中，年齡階級運作的方式不盡相同，在命名方面也有所不同，但是年齡階級存在的意義與目的卻是大致相同。

港口部落領導人 張書燒（阿美族）：

這個進級儀式是四年一次，青年階級進級是從公差組四年後就成為木頭組，木頭組四年後就成為開路組，四年滿了就進級，成為吠叫組，年齡階級就是這樣延續著，從吠叫組就升到白天組，然後遙望組、分配組，青年之父，青年之父畢業就成為長老階級，青年之父負責凝聚部落，如果發生火災、有溺水的、建房子的，由青年之父帶頭領導部落，火災被熄滅、救活溺水的，這是傳統的文化，進級的精神，年齡階級也不是一成不變，四年就進級，從進級儀式得知自己的生命成長，港口部落的豐年祭就是這樣。

（原民臺，2014年7月25日）

當然，在面對現代社會發展的局勢下，文化快速流失，儘管年齡階級不復從前，但可以看見擁有年齡階級的阿美族部落試圖努力維持該傳統，並傳承至下一代，報導中記者以畫面帶出口白，呼籲年輕一輩的阿美族人能夠返鄉參與部落豐年祭，並且學習遵守年齡階級的倫理，讓傳統文化得以承襲。



Takufan（台東德高）部落族人至今依然遵循傳統的Kiloma'an（豐年祭）以及Mikesi'（河祭）文化，不管在哪裡就學就業，部落族人每年一定都會回鄉參加，遵守年齡階級倫理，也學習傳承部落傳統文化，從祭典當中，也能看到阿美族年齡階層的重要性。

（原民臺，2016年8月23日）

男性年齡階級在部落中所扮演的角色固然重要，但是就消息來源性別分佈統計看來，女性發言的機會明顯低於男性。研究者在文本當中也看見了部落豐年祭典與都會區聯合豐年祭的報導當中，祭典儀式中的女性相較於男性而言，較少被看見。

孫嘉穗（2011）在其文章中提到，在族群媒介中，原住民女性身影逸失，如同許多無法參與的祭儀，同時在新聞與媒體呈現中處於邊緣處境或瀕臨消失。文章中點出族群媒介仍強調傳統性別角色分工，女性大多以煮菜、唱歌、跳舞的形象被再現著，隱而未見的是女性的其他角色面貌與生命史，且在部落當中，女性缺乏集結發聲並學習傳統知識的場域，無法藉由如男性聚會所般的空間得到培力，就在以禁忌為名，強化性別差異的分工模式下，男性成為媒介焦點，女性的勞動過程在鏡頭中被遺忘（孫嘉穗，2011）。

研究者在新聞文本當中確實發現女性角色逸失的現象。從報導數量來看，在100則新聞文本中，其中僅有5則報導標題直接點出「女性」，彰顯阿美族女性於祭典中角色與形象。而從報導內容來看，鏡頭中的女性角色被刻劃成「場外的勞動者」，報導中呈現豐年祭舉行中，男性完成「海祭」儀式時，回到豐年祭會場時，女性獻酒禮、歌舞慰勞的形象。

標題：馬蘭豐年祭 婦女「慰勞」青年「海祭」

內文：馬蘭部落的婦女們，在馬蘭聚會所裡跳著傳統歌舞，向隔著竹子線內的親人對話及送交物品，有香菸、酒、檳榔、飲料等，表達慰勞之意。

(原民臺，2014年7月8日)



而在祭典的進行過程中，有些環節的進行，女性並無法參與其中，但當女性進入祭典場域時，甚或成為祭儀中主導的角色時，從報導標題與前言就可以明顯看到報導所強調的重點，整體來看仍以男性為報導主軸，女性儼然成為報導配角。

標題：港口部落宴靈祭 女性獻酒、獻檳榔禮

導言：祭典進行到第四天，部落年齡階級傳唱傳統祭歌祭舞的最後一天，青年階級仍然精神抖擻，完成宴靈祭。而當中女性會表現獻酒及獻檳榔禮，收到禮的族人則會大聲高喊表示感恩。

(原民臺，2015年7月24日)

爾後，女性雖然由祭典場外走到場內，但是其與男性角色仍處於從屬地位，像是附屬於男性角色之下的勞動者，報導雖給予絲毫關注，卻未針對「女性獻酒禮」此一祭典儀式與勞動行為給予更多的解釋，鏡頭下強調的是傳統性別分工的視野，讓女性無法呈現更多面向的祭典文化底蘊。

標題：樂合 Ilisin 表揚優秀青年 婦女獻酒禮

內文：表揚大會 paketel 結束之後，在 kakita' an 的宣佈下，開始進行 palimo 獻酒禮，部落的女性一窩蜂進入會場，每人手持美酒依序從長者倒酒給部落年齡階層的每一位男性喝，敬上誠摯的感恩。

(原民臺，2014年8月23日)

在 5 則祭典新聞中，以上 3 則皆是試圖以女性做為報導主角，但以整篇報導結構來看，最後還是轉為以男性年齡階級為報導重點，以女性襯托出男性於祭典中的形象。不過，由另 2 則報導中還是可以看到豐年祭中由女性主導的「送靈祭」儀式的報導細節，試圖彰顯女性於祭典中重要角色。從標題就能看出報導著眼於女性角色，而內容中先是在報導首段強調，送靈祭是女性的祭典儀式，由婦女階層執行該祭儀的進行。

標題：Taeman 祭典落幕 女性主導送靈祭

導言：在婦女 Kakita' an 的牽領下，婦女階層隨著祭歌跳著祭舞。Taeman 膽曼部落的豐年祭儀依傳統一連舉行五天的迎靈、娛靈、宴靈及送靈祭，最後一天送靈祭特別為女性的祭儀。

（原民臺，2016 年 7 月 21 日）

後續解釋女性之所以主導送靈祭進行之原因，並且以祭儀進行帶出該部落社會組織面貌，除了有男性的年齡階級外，也有女性年齡階級。

內文：Taeman 膽曼部落的婦女，也跟男性一樣有傳統的年齡階級，並有婦女幹部來領導。

（原民臺，2016 年 7 月 21 日）

同樣的，從另一則報導中也能看到，在台東成功的宜灣部落也由婦女年齡階級執行送靈儀式。

標題：宜灣部落 Mipihay 送靈祭 祈求農作物豐收

導言：部落婦女年齡階級在領唱者引領下，傳唱 Mipihay 送靈祭的祭歌，由長者擔任領唱特定祭歌，所有人跟著呼應，有許多的祝福跟保佑親友平安。

（原民臺，2015 年 7 月 21 日）

報導中亦試圖凸顯男女於祭典中各司其職，強調男性嚴禁參與該儀式。



內文：宜灣部落豐年祭典進行到最後一天，就由部落婦女年齡階級舉行 Mipihay 送靈祭，大家圍繞歌舞歡送祖靈回到天界，表示宴靈結束，男性嚴禁參加。

（原民臺，2015 年 7 月 21 日）

經過報導分析發現祭典中男性、女性在報導中的比例失衡，女性的生命史鮮少受到重視，但是報導中仍帶出阿美族部落分工的樣態，讓社會大眾得以理解祭典的進行並非由男性獨立完成，同時也需要女性的角色才能讓祭典順利進行，只是在祭典新聞中，女性形象仍嫌不足，且無法具體彰顯出過去研究所指出，阿美族於祭典儀式中男、女性別分工的意義與智慧，兩性分工差異確實存在互補性（黃宣衛，1989；羅素攷，2005）。

孫嘉穗（2016）從性別的角度切入探討族群新聞的呈現，其中提到了，目前新聞的呈現，原住民女性形象不足，且常受到傳統性別角色框架限制。她認為，部落在隨著時代變遷的同時，女性蘊含豐富的報導題材，包含歷史、部落階級、青少女世代等多元面向的關照，因此，在祭典報導中，女性的參與也應當要有更多深入的介紹，讓女性的故事得以被看見，也讓女性得以發聲。

四、「部落傳統領袖」多使用阿美族語

研究者認為，完善地呈現出該祭典文化，不僅要在性別上多加關照女性於祭典中的角色，此外，要如何貼切地表達該祭典之意涵，在「語言」此一層面更是一應關注之處。因此，研究者在消息來源分析上也關注了消息來源所使用的語言狀況。由統計結果可以看到，在阿美族祭典新聞的報導當中共有 315 位的消息來源中，使用漢語應答的消息來源共計 244 人，佔 78%的比例；使用原住民族語回答的人數為 51 人，在此都是以阿美族語應答，其中多為「部落傳統

領袖」，其餘為「部落一般民眾」，共佔 16%，而以漢語加族語方式應答的消息來源共有 17 人，比使用外語回答的人數 3 人所佔比例，高出 4%。

表 8：報導消息來源使用語言與人數

報導消息來源使用語言	人數	比例
原住民族語	51	16%
漢語	244	78%
漢語加族語	17	5%
外語	3	1%
其他	0	0%
總和	315	100%

經過研究分析發現，使用阿美族語應答的消息來源主要是「部落傳統領袖」，其擅於使用族語表達意見、解釋文化細節。根據記者所翻譯的中文內容大致可以看出，「部落傳統領袖」多以族語解釋祭典由來與部落歷史，研究者認為利用族語應答對部落傳統領袖與少部分部落族人來說，更能直接並且貼切地表達該祭典之內涵與其個人的看法。

而觀看漢語與族語混用的狀況，大多為年輕一輩的阿美族人，或許就是與族語能力表達有關而夾雜漢語回答。而若是排除漢族與外籍人士使用的語言，相當高比例的原住民消息來源使用漢語應答的現象似乎反映出了阿美族語言文化流失的現況，或許這也關係到了原民臺記者採訪時所用的語言。

從新聞文本中可以發現，花東一帶部落豐年祭的採訪過程中，駐地記者具備之族語能力得以讓他們使用族語採訪，並且進行族語的轉譯，但是都會地區聯合豐年祭的報導幾乎都為漢語採訪，在此便也能看出，地方記者人力配置與族語能力的差異反映出了都會地區與部落豐年祭報導呈現的差異，都市豐年祭報導多以漢語呈現，而部落豐年祭相關報導中的消息來源則多以族語、漢語夾雜族語呈現，但其中仍有些族人用漢語回應記者的採訪。

語言復振做為族群媒體存在並且致力的目的之一，也是過去諸項研究所論及原住民新聞學所應具備的原則（Zabaleta et al., 2010；Hanusch, 2014a；洪貞

玲，2014）。而在本研究當中可以看到，對比原民臺族語新聞採取全族語的呈現方式，每日新聞當中主播的播報雖以漢語呈現為主，但也可見阿美族祭典新聞報導中，原民臺記者試圖在報導中讓族人以族語應答、呈現族語，並且加上中文字幕，讓阿美族人得以在收看原民臺祭典新聞的同時，能夠聽見自己的語言，讓族語在生活中被運用，同樣也讓社會大眾在觀看祭典新聞的同時，也能認識不同族群的語言，於整體傳播意義來說盡可能達到族語的復振。

五、阿美族祭典新聞廣納「消息來源」

除了對上述面向的關注，研究者從消息來源整體「人數」進一步探看各報導中消息來源人數的分佈狀況，發現報導中出現 3 位消息來源的則數佔最高比例，共有 34 則；報導中出現 2 位消息來源的則數有 26 則；出現 4 位消息來源的報導比例位居第三，共 20 則；少數 15 則報導中有 5 位消息來源；而僅有 1 位消息來源的報導則數則為 5 則，每一則報導中皆至少有 1 位消息來源。

表 9：報導消息來源人數與則數

報導消息來源人數	則數	比例
0 人	0	0%
1 人	5	5%
2 人	26	26%
3 人	34	34%
4 人	20	20%
5 人	15	15%
總數	100	100%

由統計結果來看，祭典報導主要以 3 位消息來源為基本採訪數量，報導中出現 3 位以上消息來源的報導則數比例佔 69%，報導涉及部落豐年祭、都會區豐年祭，以及豐年祭相關政策與時事新聞。在此，可以看出原民臺試圖針對報導主題，在報導中呈現更多元的觀點，讓更多消息來源能夠發言，尤其是阿美族人。



但研究者亦發現，身為一個族群媒體，原民臺多站在部落的角度，於報導中也試圖以消息來源所發表的言論支持該報導背後所支持的觀點，而這些觀點多為對部落有益的，因此，研究者認為，消息來源的多寡或許能呈現更多元的意見，但也可能集結起來支持某一報導觀點，研究者也臆測，那樣的報導觀點也有可能是記者本身所支持。

如同面對觀光化對部落祭典的影響的確有利有弊，在報導中可以看到原民臺記者試圖從部落人的角度呈現部落的聲音，有時便能看見部落的聲音在維護部落祭典傳統的同時，會希望觀光化的浪潮能夠不影響傳統祭典的進行，同時，回顧張錦華（2012）於其著作所提，於報導中反映部落當地問題就是試圖呈現原住民觀點的作法，而這也與原民臺記者如何「做」新聞息息相關。

整體來看，由消息來源的分析可以更進一步看出「誰」掌握了發聲的麥克風？「誰」在報導中扮演了何種角色？幫助研究者了解原民臺如何呈現祭典新聞？亦助於研究者進行後續的探究，知曉原住民記者如何報導祭典新聞。

第三節 報導著重面向分析

透過阿美族豐年祭典新聞的初步統計分析發現，該祭典新聞所報導的面向不僅著重於祭典中傳統儀式的呈現，在彰顯阿美族祭典文化脈絡與特質的同時，亦帶出部落現今處境，些許報導所呈現的更是這些祭典儀式背後所要強調的文化傳承精神，甚或祭典當中跨文化、跨族群的互動觀點，促成跨文化、跨族群之對話。

在面對祭典觀光化與文化政策相關議題時，報導中所呈現則是部落族人如何自主，展現其主體性，透過正向報導，彰顯阿美族人面對時代更迭、文化流失及觀光化影響的浪潮中，如何突破重圍，發展出與現代社會共存之文化祭典模式，相關報導則藉原住民新聞記者之手凸顯了去中心化報導特質，試圖在主流媒體當道的現今，提供反面論述，為阿美族人發聲。

近年來，都會區阿美族豐年祭與跨族群聯合豐年祭則時常與政治活動掛鉤，表面上為復振族群文化之祭儀活動，實則著重政治宣傳，以祭典場合做為政治人物宣傳原住民權益相關政策的場域，姑且不論政治人物是否以個人宣傳為立意，此篇研究也非研究現今祭典儀式中的政治宣傳策略，普遍看來都會區之阿美族祭典確實不少政治人物露出，本研究發現報導中之「政治宣傳」多為「政策宣導」，亦能看出原住民新聞記者所著重之報導觀點以關切與族人相關社會福利政策為重，採訪與原住民相關之公共政策議題，以原住民族人為主體，彰顯出原民臺具自主性之報導意識。

為了解阿美族祭典新聞所呈現之報導著重面向，研究者以「著重部落現今處境」、「著重傳統儀式呈現」、「著重文化傳承精神」、「著重文化政策議題」、「強調部落族人自主」、「強調跨文化的互動」與「著重政治宣傳面向」七項類目進行祭典報導著重面向歸類並分析，探看報導偏重角度之分布概況。且經統計發現，在總則數 100 則的新聞當中，「著重部落現今處境」、「著重文化傳承精神」與「著重傳統儀式呈現」此三項為祭典報導中所呈現最主要之報導面向，報導數量分別為 67 則、63 則與 33 則。

表 10：報導著重面向與則數

報導著重面向	則數
著重部落現今處境	67
著重傳統儀式呈現	33
著重文化傳承精神	63
著重文化政策議題	20
強調部落族人自主	28
強調跨文化的互動	15
著重政治宣傳面向	6
其他	0
複選題數	232

經檢視新聞文本，原民臺在報導阿美族豐年祭典新聞時，當報導以部落豐年祭為採訪主體時，多呈現傳統儀式與祭典意涵；當報導以都會區部落豐年祭與聯合豐年祭為主體時，有關傳統儀式之呈現較少，但部落豐年祭與都會地區豐年祭多同時具備「著重部落現今處境」與「著重文化傳承精神」之報導面

向，初步加總所佔則數較「著重傳統儀式呈現」此一面向來得多；若將以阿美族豐年祭做為報導引信之文化政策議題報導納入統計分析時，因報導中鮮少傳統儀式呈現，所談及的主要係部落現今狀況與儀式背後的文化精神，因此報導中加總「著重部落現今處境」與「著重文化傳承精神」之報導面向則遠超過「著重傳統儀式呈現」此一面向，逾 30 則以上。

另，報導中「強調部落族人自主」面向的報導數量則僅次於前三項最主要之報導面向，共有 28 則；「著重文化政策議題」與「著重政治宣傳面向」的報導則數則分別為 20 則、6 則；而「強調跨文化的互動」的報導則數則有 15 則。經檢視報導內容，祭典新聞在呈現祭典細節之外，亦呈現了部落當地所遭遇到的問題與困難，其中亦可見部落族人自主性與主體性的展現，而原民臺身為一個擔負文化復振大任的族群媒體，報導著重在文化傳承精神的發揚於本研究也就清楚可見了。

一、阿美族豐年祭報導最為強調「著重部落現今處境」

研究者發現，在「著重部落現今處境」報導面向中所談及的內容主要為：部落在面對觀光化浪潮下，部落的經濟與祭典舉行所受到的影響；因為現代社會的發展，人口外流，傳統文化流失的處境，隨之而來的是後續看到的部落傳統祭典因人口外流瀕於失傳，而都會區豐年祭成為另一個文化傳承、供族人一解鄉愁的祭典場域；部落所面臨的土地議題，同時也帶出部落原住民於都會區所面臨到的居住困難。

報導內容提到，2014 年，交通部觀光局將該年定為「原住民部落觀光元年」，也一如往年，將各族原住民族部落祭典納入觀光旅遊行程，推廣原住民族文化，而正值七、八月暑假熱潮的阿美族豐年祭便成為觀光行程安排的選擇之一，這於當時便引起熱烈討論，族人質疑觀光局是否依照原住民族基本法規定取得部落族人同意該觀光計畫，而長年以來的問題，「祭典是否應該開放？或開放到何種程度？」更在 2014 年引起許多阿美族部落族人在言論上的討論。



奇美部落居民 Kacaw (阿美族)

我覺得這樣的觀光流程，對於部落的經濟效益只是短暫性的，而且對部落是一種傷害，因為觀光客來只有幾個小時，了不起最多一天，對部落的效益不是很好，是造成一個傷害的。

(原民臺，2014 年 7 月 2 日)

站在部落的角度來看，部落觀光在沒有完善規劃之前並無法真正帶動部落經濟，且部落觀光對部落的經濟效益只是短暫性的，而觀光客進到部落走馬看花式的旅遊，對部落來說反而可能是一種傷害。報導中亦有族人直言，認為觀光化帶來的並非經濟效益而是環境汙染。

奇美部落居民 Lisin (阿美族)

沒有！沒有效益，因為我們部落做生意的人是少，我覺得對我們部落裡面一點好處都沒有，只是帶垃圾來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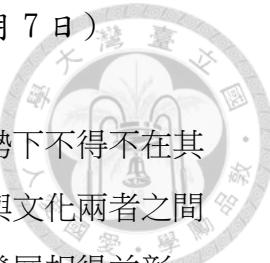
(原民臺，2014 年 7 月 3 日)。

從報導中所彰顯之部落消息來源意見可看出部落觀光似乎無法直接為部落帶來經濟收益，對部落來說可能反而是一種困擾，但從政府立意的面向來看，則是希望能夠將部落特色結合觀光旅遊行程，提高部落知名度進一步帶來商機，增加部落就業機會，但是在報導中可以看見原民臺記者透過與臺東比西里岸部落族人互動後取得之意見反映前揭之觀光規劃並非一蹴可及，隨之而來的是更多部落所面臨的挑戰。

內文：但在觀光局 8 個部落旅遊規劃中的比西里岸部落族人

認為，以往安靜的生活環境因為知名度漸增，大量遊客所帶來的吵雜聲、垃圾等問題也一併浮現，對於一般居民而言，也賺不到什麼錢，而在地協會則希望部落凝聚力要再集中，才能有效提升整體部落的經濟與生活環境。

(原民臺，2014年7月7日)



從政府觀光發展的目的導向部落自主發展，部落在觀光趨勢下不得不在其中學習凝聚部落共識，並且在觀光發展的潮流下思考觀光發展與文化兩者之間的平衡點，抑或能夠在兼顧部落主體與文化傳統之下，與觀光發展相得益彰，這對部落來說是好或是壞，研究者存疑。但在報導中除了經濟效益層面的討論之外，也可看見部落在面對觀光化衝擊後所面臨到祭典觀光化的問題，意即祭典淪為觀光客所觀看的表演。

部落青年（未標註姓名與族群別）

本來以前就是自己在辦豐年祭，沒有別人會來這樣子，然後因為時代的進步，導致變成觀光化，那這樣觀光會讓部落很多東西都流失掉，只為了表演給觀光客看，然後把很多東西都省略。

(原民臺，2014年7月2日)

新聞中一名「部落」青年道出了部落現今因觀光化影響所呈現出的祭典面貌。祭典因為時代的演進、因為觀光化的影響，儀式細節遭簡化，淪為一種表演的形式，祭典彷彿不屬於部落，而是為了歡迎觀光客進到部落所進行的展演活動，神聖的意義不再。後續，同篇報導內容談到部落祭典是否應該開放觀光時，部落青年則認為部落祭典應當與外界區隔，不與觀光化沾邊，文化就是在倡導觀光化的過程中流失了。

部落青年（未標註姓名與族群別）

部落的事是部落的事啊，跟觀光為什麼要扯上關係？因為觀光對部落也不是說很好，反而會流失很多傳統文化。

(原民臺，2014年7月3日)

對應年輕人的看法，老一輩的阿美族人則有不一樣的看法。因體會到了時代的變化，祭典的改變似乎是無可避免，展現出懷抱現代社會、順應現代社會

的胸襟，用阿美族語道出其看法，在傳統與現代的兩端呈現出對比，亦帶出了傳統與現代交會下祭典的演變。



太巴塱部落居民 萬中興（阿美族）：

關起門來做祭典儀式，我想那個時代過去了，時代的改變，
我們也應該跟外面有更多的接觸。

（原民臺，2014年7月11日）

或許是懷念過去豐年祭的盛況，也或許是部落現今人口外流嚴重、盛況不再，回想起過去豐年祭的面貌，老一輩的阿美族人不禁感慨，操著流利的阿美族語對著鏡頭表示，希望祭典能被看見，即使族人無法回鄉參與祭典，至少觀光客的在場能再次激起族人們牽起手、唱起歌、跳起舞的意願。

花蓮縣部落領袖聯誼會會長 王成發（阿美族）

如果部落祭典自己人在跳，沒有客人，你不會覺得心很孤單
嗎？若很多客人在看我們的祭典，我們的跳舞意願會更高，
我覺得是這樣，大家可以想想。

（原民臺，2014年7月11日）。

報導中世代間觀點的差異，可看見阿美族年輕人對於豐年祭典不應受觀光化影響、不應成為因觀光客而存在的表演此等捍衛言論，而年長者則對於祭典觀光化為部落帶來的低經濟效益及污染嗤之以鼻，另一方面又對祭典文化的傳承表現積極，期待能讓更多人看見阿美族豐年祭典的存在，儘管觀光客的在場並非過往族人團聚的實質意涵，但不可否認的，現代社會的影響卻使阿美族年長者願意順應社會，企圖在觀光客身上找到「與我族同在」之精神意義，甚至期待觀光客的參與能幫助整場祭典獲得更加鼓舞人心的元素，讓歌舞越發唱跳熱絡。

在面對祭典觀光化的影響，部落族人雖意見分歧，有人為了部落居住環境與祭典文化的保存而拒絕觀光發展，也有人同意觀光發展，但這樣的發展是以

部落祭典之傳承與延續為優先，從前述報導內容即可看出原住民新聞記者試圖在部落觀光化「支持」與「反對」的聲浪中，帶出新生代、中生代及老生代阿美族人在地觀點中，呈現更全面的報導觀點及論述，而這些觀點皆是基於部落與族人有感而生。



二、阿美族豐年祭報導慣於凸顯部落族人自主性與能動性

在面對祭典觀光化的同時，為了確保祭典能夠順利進行，部落族人也集結起來，針對觀光客進入部落觀看豐年祭與意圖攝影轉為營利所得之舉動訂出應對措施，而在報導中所呈現的便是「強調部落族人自主」報導特徵與觀點。經檢視報導內容，部落舉辦豐年祭之際，部落阿美族人訂下管理制機制讓祭典進行的過程能夠不受干擾。

臺東縣成功鎮都歷部落阿美族人為防止觀光客於祭典會場穿梭、拍照進而影響祭典之進行，因此於祭典會場採行「分區管理」措施，一旦遊客進入祭典現場，便請部落族人上前引導到適當的觀看位置。

都歷部落居民 Masaw (阿美族)

一般民眾要進來，可以，但是我們安排他們，來引導他們的路線，主要就是不要影響到我們整個節目的流暢性。

(原民臺，2014 年 7 月 17 日)

而在花蓮縣瑞穗鄉奇美部落則將觀光客於部落祭典進行過程中「拍照」一事視為禁忌，部落耆老言，相機的閃光燈閃爍瞬間會將人的靈魂帶走，甚有人言，攝影的干擾就像一道牆，阻隔了族人和祖靈的對話。

奇美部落居民 Lisin (阿美族)

不要拍啦，我的靈魂被你，全部我的靈魂被你帶走，所以不要一直拍照，老人家會罵，不要照相，靈魂被你帶走，老人

家會不高興，他講這句話的時候，老人家已經不高興了，不願意讓你拍。

(原民臺，2014年7月25日)



面對現代社會的演進，影像使文化得以被保留。研究者認為，現代科技發展使得部落族人在現代與傳統社會間嘗試取得平衡，攝影似乎也非應完全被禁止。攝影，記錄了祭典瞬間，讓文化得以具體地呈現予外界大眾，只是部落在意的是其主體性，以及影像紀錄的用途為何，若被拿來販售，即失了影像傳承文化之意義，甚至侵犯族人權益，尤其當這些在部落完成的影像紀錄被當做商品反賣給當地族人時，不僅破壞彼此間的信任，更是消費部落行為的體現。

奇美部落居民 Lisin (阿美族)

有一個婦女她要拍照，就跟婦女說我們來拍拍，那我會送你們照片，大家都很願意，20、50 幾個婦女一起拍，拍了以後，說會送我們，大家都很願意去拍，反正有個紀念，結果第二天就來賣，說一張一百塊，大家都反彈。為什麼你當初講說要送給我們，現在是要賣給我們，大家都不接受，後來把她趕走了，她從那時候就沒有再來部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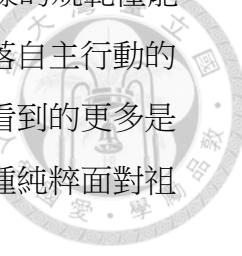
(原民臺，2014年7月25日)

因此奇美部落針對外來拍攝者訂定「攝影規範」，外來拍攝者需得認可才得以配戴攝影證，進行拍攝，而影像紀錄則被要求重新回饋部落，進一步強化部落的防衛機制。

奇美部落居民 Kacaw (阿美族)

那時候，部落的年輕人意識抬頭說，難道我們的文化就這樣被糟蹋了嗎？就開始集思廣益說到底要怎麼做？部落的人就說，乾脆我們來弄一個攝影規範，只要有一些攝影器材的人，就要簽下跟部落的一種協議。

(原民臺，2014年7月25日)



報導中提及，其他阿美族部落亦設立了相關攝影規範，但這樣的規範僅能治標而不能歸本，「拍」與「不拍」有賴觀光客自我的省思與部落自主行動的鼓吹，該如何具體規範與徹底落實亦有待商榷，只是在報導中能看到的更多是阿美族人對避免攝影干擾的期待，以及對於過去祭典的懷想，那種純粹面對祖靈的生命狀態。

港口部落居民 Anu (阿美族)

就是你怎麼樣有正當性，我都是反對的，因為這是我的立場，因為我覺得，你來看可以，但是你有了攝影機，你一定是影響到人在跳舞、唱歌，因為一個攝影機面對你的時候，你的磁場、心態就不對了，所以男孩子在跳舞的時候，他應該是很認真的在唱歌、跳舞，然後在這個圓的當中去完成跟祖靈的一種對話才對，那個場域是很神聖的，所以那是不容許被破壞的。

(原民臺，2014年7月25日)

對部落來說，攝影機就像「看不見的子彈」，而部落的攝影規範就像是一道擋箭牌，提供防禦機制，效果如何，有待觀察。

阿美族祭典的神聖性在族人眼中不容侵犯，為了讓文化純粹地活在部落，部落族人在這過程中的展現其自主性；即使面對長久以來政治人物將豐年祭場合當做政治宣傳場域的狀況，部落也對此採取積極的態度。

寧埔部落 青年之父 Laic (阿美族)

我覺得我們原住民的祭典，不應該讓外人進來去中斷我們活動的行程，如果說今天你來參觀我們的活動的話，我覺得說你可以用握手的方式，而不是說用這種方式來中斷我們的祭典，也不是讓你們這些民意代表壯大你們的聲勢或是你們的舞台。

(原民臺，2014年7月16日)

報導中形容，祭典進行的過程中因政治人物到訪而遭中斷，介紹官員的聲響不斷，但年齡階級的青年之父仍要大家繼續吟唱，不受影響。許多族人一再批評，政治人物利用各部落祭典宣傳個人政見，但平時卻鮮少踏訪、關心部落事務，豐年祭典淪為政治宣傳的舞台。



奇美部落居民 林玉成（阿美族）

我們都很歡迎外人來參加我們的祭典，只是說我們的祭典儀式當中是不允許來賓講話，或是干擾活動進行的。

（原民臺，2014年7月18日）

經檢視報導內容針對過去政治人物造訪部落祭典的經驗，確實不乏此類政治人物印象，而這樣的問題確實發生在許多部落祭典當中，報導中不斷強調外來者應當了解部落傳統禁忌、尊重部落規範，試圖建構部落主體性，並提醒外來者，特別是政治人物，勿將祭典場合做為「秀場」。

前臺東縣長 黃健庭（漢族）

會發生這樣的事情，都要讓我們以後更小心、更留意，其實完全不是我們的本意，但是有時候如果沒有做更好的溝通就會發生少數這樣的狀況。

（原民臺，2014年7月19日）

報導中，時任臺東縣長的黃健庭針對此一現象發言，表示進到部落應當更加注意，以免造成困擾。亦有立法委員表示，做為一名拜訪者，就不應該主導，而讓豐年祭回歸其傳統的意義，彰顯出部落應是祭典主導的主體此一重要概念。從報導中也能看見，不少政治人物在聽到部落族反抗的聲音之後，確實也針對這樣的現象提出改善對策，仍以尊重部落為首要。

在祭典新聞的呈現上，確實能夠看出原民臺記者以豐年祭本身襯托出部落族人的主體性，做為一種聲張，呼籲欲參加原住民族祭典應當入境隨俗，同時

也提醒政治人物在進到部落拜訪時，也應放低身段，有時無聲更是勝有聲，尊重部落才是最重要。



除了面對祭典觀光化的影響，觀察2014年至2016年間所有新聞文本，部落族人在面對「祭典假政策」、「返鄉列車政策」，「部落土地議題」時，亦共同集結起來，訴說族人需求，試圖讓政府聽到族人的聲音，在這樣的主體性展現上，無疑需回歸於原住民新聞記者與原住民族電視臺的媒體實踐，這也是研究者試圖在本研究中發現屬於原住民新聞所著重之報導觀點，並將原住民新聞記者之具體實踐與文本呈現加以對照，確實彰顯了原住民族電視臺為原住民發聲的報導觀點，並在與原住民族人相關的議題報導中，讓族人的主體性得以被看見。

三、阿美族豐年祭報導以「文化傳承」為重要宗旨

本研究中，關於「祭典觀光化」的討論不僅帶出部落中人口外流、文化流失的現實情況，亦帶出部落族人在面對政府文化公共政策時，如何自管理部落秩序；在面對文化流失的同時，本研究另一「著重文化傳承精神」的報導面向便於報導中可見，另經檢視相關報導，並經「報導立場」統計分析發現，「著重文化傳承精神」面向之報導多屬「正向報導」。

檢視總計 100 則的新聞報導後，發現未有負面報導立場的新聞，正向報導立場的新聞則有 33 則，其餘 67 則報導立場為中立。經檢視正向報導立場的新聞，主要有關部落豐年祭傳統的恢復與延續、部落豐年祭辦理的歡樂氣氛、都會區豐年祭中跨族群間互動融洽，以及文化復振等相關報導。

表 11：報導立場與則數

報導立場	則數
正面	33
負面	0
中立	67

在多數強調文化傳承精神的報導中不乏提及，部落受到現代社會發展影響，人口外流導致傳統文化無人承襲，使得文化瀕臨消失。



內文：部落產業貧瘠，因此人口嚴重外流，平時部落的人口就只有 30 多位，大部分是老弱婦孺在家，不過每年的豐年祭，旅外的族人都會相繼回鄉參與，傳承祭典文化，今年回鄉參與祭典的族人就超過了二百人。

（原民臺，2014 年 8 月 16 日）

自前段花蓮豐濱鄉八里灣部落豐年祭的報導內容即可看見部落現今處境，青壯年人口嚴重外流，每逢豐年祭時「青年返鄉」便反映出部落族人自都會區回部落傳承祭典文化的重要性；當我們將視角切換至花蓮瑞穗鄉的奇美部落便可見，青壯年人口的減少直接地影響部落祭典的運作，亦為部落祭典文化的傳承帶來挑戰。

奇美部落 第一階層青年 Fayō (阿美族)

因為少子化的關係，奇美部落青年人數逐年減少，相對地，人數少，傳統捕魚祭準備工作每個人工作跟著加重。

（原民臺，2014 年 7 月 18 日）

「少子化」確實為現今社會整體趨勢，但研究者認為，通篇報導點出「（青壯年）人口外流」至都會區求學、工作，難以回鄉，才是部落祭典文化傳承所面臨到最主要的挑戰。

瑞良部落 豐年祭大會總幹事 Calaw (阿美族)

像這次可能會斷掉了啦，人口沒有那麼多，下面沒有了，所以我很緊張的，當然，我希望我們的文化能傳承下去。

（原民臺，2016 年 8 月 11 日）

報導中提到，部落年齡階級因沒有新血加入，族人擔憂年齡階級之傳統文化無法延續。面對種種變化，祭典文化不得不順勢而為，「人口外流」使得部落中男、女性族人於祭典中所扮演之角色與禁忌也逐漸鬆動，所負責之工作亦愈趨繁雜與沉重；部落祭典參與人口減少，則使傳統祭典舉辦形式有所改變。



內文：宜灣部落傳統的 Mipihay（送靈祭），過去是每戶派出一名代表參加，但隨著人口外流嚴重，去（2014）年開始形式被迫有所改變，回鄉參加祭典的婦女，一律都要參加，好將 Mipihay（送靈祭）祭典儀式傳承下去。」

（原民臺，2015 年 7 月 21 日）

藉由阿美族豐年祭新聞報導可以看到「人口外流」導致傳統文化流失的危機，原住民新聞記者試圖在報導當中帶出部落所遭逢的挑戰與困境，企圖呼籲部落青年回鄉參與祭典、傳承文化，舉凡部落青年用行動表示對傳統文化的重視、部落找回傳統並且復振文化的成果、即使遭遇天災仍堅持文化實踐，甚或都會地區豐年祭中青年參與的狀況等相關報導，皆可以看出報導所要傳達的意義，皆圍繞在「文化傳承」四個字，整體而論，報導多以正面且積極的立場呈現文化傳承的重要性。

原民臺記者透過原住民青年投身「文化復振」的具體實踐，報導原住民青年對文化傳承之熱誠，彰顯其在振興文化工作上的正向成就。如：2014年8月12日一篇名為〈達谷梵旅北青年，路跑沿台九線返部落〉的報導，其中達谷梵旅北青年用路跑的方式，沿台九線返部落，期以阿美族傳統的報信方式，由部落中最小的年齡階級用跑的方式報訊息給部落各個族人，告訴他們豐年祭即將舉行，而時空轉換，該部落青年則是用跑的方式告訴旅居都市的阿美族人回鄉參加豐年祭。

達谷梵部落青年 Isawu（阿美族人）

很多像部落裡面的大事，像豐年祭這種活動，然後都沒有年輕人回來，越少年輕人回來，這樣會變成說，部落的文化、阿美族文化，豐年祭的東西就會越來越少人回來傳承，沒有傳承就會消失，所以我想要藉由這次的方式就是號召所有的阿美族的年輕人回來部落傳承我們自己的文化。」

(原民臺，2014年8月22日)



報導中的主跑人，同時也為部落青年的Isawu因意識到部落所面臨的處境，選擇用阿美族「報信息」的方式，讓雙腳實踐傳統，用阿美族人的方式，昭告旅區都會區之阿美族人，返鄉參加祭典、傳承文化，一來，讓達谷梵部落其他阿美族青年中途也加入路跑的行列，二來，也讓「報信」的阿美族傳統文化得以在他們雙腳踩踏土地的過程中傳承下去。

達谷梵部落青年 Masaw (阿美族)

一方面是呼籲我們旅北的青年朋友們阿，因為太久沒有回鄉下還是怎麼樣，怕他們忘記自己的傳統、自己的文化，所以幾位年輕人呼籲用這種方式、用跑的方式從北部這樣一路跑下來。

(原民臺，2014年8月22日)

隔年 2015 年 7 月 8 日一篇名為〈都蘭 Pakalungay，頂風雨為部落而跑〉的報導，主角是臺東都蘭部落最小年齡階級的 8 位青年，渠等以路跑的方式，自基隆港跑回臺東，為期五天的時間，期待能夠號召更多旅北青年能夠回鄉參加參與年齡階級、豐年祭。

都蘭部落青年 Mayaw (阿美族)

過程一開始很興奮，但是後來跑到中間的時候，覺得跑這個還是要做點心理準備，不是說跑就趕快跑，就是為了部落，然後也希望全部的年輕人可以回來，因為今年剛好升級，希望大家可以參與這個祭典。

(原民臺，2015年7月8日)



報導看來振奮人心，而在部落長者的眼裡，年輕人讓「路跑」被賦予另一層涵義，將文化重新接軌，步上傳承的道路，言辭間道出年長者對年輕人承接文化的熱切與期盼。

都蘭部落 Kakita'an (掌管部落祭祀之望族) Panay (姜清武) (阿美族)

路跑就是把文化也都要交給年輕人，我們有好幾個文化都失去了，所以希望能藉此能逐漸找回來。

(原民臺，2015年，7月8日)

由以上兩年間「路跑」的報導可以看出，年輕人與文化傳承對部落至關重要，原民臺記者以軟性的報導方式，呈現部落年齡階級中青年找回文化，試圖喚起族人對傳統文化的重視，此為阿美族祭典報導中常見的報導角度。

本著阿美族傳統文化，年輕人遵循過去阿美族人「報信息」的方式強調傳統文化的重要性，在報導中多可見族人依循著傳統文化，將豐年祭傳統傳承並再現。另外，在2014年8月16日一篇名為〈兄弟部落，奇美赴太巴塱報信息〉的報導中亦提及「報信息」儀式，花蓮奇美部落在過去與太巴塱部落為兄弟部落，至今仍遵循傳統「報信息」的方式，在豐年祭開始以前由奇美部落青年將祭典訊息帶到太巴塱部落，且將禮物贈予太巴塱部落，太巴塱部落亦進行回禮，並表示將赴奇美部落參與豐年祭。

內文：太巴塱頭目也遵循前輩所交代的話，不管太巴塱未來的環境好或壞，都不能忘記奇美部落是太巴塱的兄弟，也期待未來的Patakus (報信息) 儀式能經常性地永遠傳承下去，鞏固兩部落的友好關係。

(原民臺，2014年，8月16日)

「報信息」儀式象徵著傳統儀式與祖先精神的延續，而在其他報導中另可見阿美族傳統智慧的延續。在 2014 年 8 月 16 日一篇名為〈八里灣 Ilisin 最終日，青年上山 Pakelang¹⁶〉的報導中提到，每當到了豐年祭最後一天，花蓮八里灣部落即進行所謂 Pakelang 儀式，而部落的青年階級則必須上山以阿美族傳統集體捕魚的方式，過程中年齡階級青年之父用族語教導部落青年以「毒藤」汁液使魚、蝦暫時昏厥，以利捕撈，所用的乃是起源於祖先，符合永續生態的捕漁工法，反映了祖先古老的智慧。

八里灣部落青年之父 Panong (阿美族)

這是祖先傳承下來的智慧，利用這毒藤主要是教下一代如何使用。

(原民臺，2014 年，8 月 16 日)

透過報導可見「著重文化傳承精神」相關報導，以強調傳統文化、延續祖先智慧，肯定祖先所秉持文化價值，彰顯該報導主題核心思想。另經檢視其他報導，亦能看到另一種報導操作手法，即以部落為主角，報導部落「恢復」祭典儀式的過程，更能彰顯出部落集體對文化傳承的重視，呈現文化復振對於那些阿美族部落的重要性。

標題：白毛寮重建Pakarongay 復振傳統文化

導言：迎接一年一度豐年祭，白毛寮部落族人聚集在會所展現傳統歌舞，不只如此，部落今年特別集合 10 位青少年組成 Pakarongay，希望逐步重振部落年齡階級傳統制度。

(原民臺，2016 年 8 月 15 日)

¹⁶ Pakelang 做為阿美族慶祝儀式，在婚喪喜慶或其他事務及工作完成後，為答謝親友的幫忙，因此舉辦該儀式，也藉以讓家人從新調整心情繼續面對生活。網址：<http://titv.ipcf.org.tw/news-35983>，上網日期：2019 年 1 月 1 日。

白毛寮部落失傳以久的阿美族年齡階級制度，就在部落的鼓吹之下重新出現，將部落的文化透過年齡階級傳承下去；三民部落則是受到基督宗教的關係而無法延續傳統的祭典文化，但就在 2015 年，部落族人以教會起頭，帶領三民部落重振阿美族祭典文化。



標題：三民教會復振阿美文化 著傳統服敬拜

內文：Madawdaw，也就是三民部落豐年祭，年齡階級傳統文

化嚴重流失，三民部落基督老教會現在省思，不希望部
落的傳統服飾、歌謡、舞步繼續流失，所以希望教會先
起頭，將祖先的傳統文化知識，找回並傳承。

（原民臺，2015年7月27日）

著重部落對於文化找回、重建之路的角度進行報導，也成為原民臺呈現祭典新聞時所反映出的重要面向。從相關報導可看出，正向肯定傳統文化與祖先智慧、著重部落文化復振角度、彰顯文化傳承精神，在報導部落現今處境的同時，反映原住民族文化特質與部落主體，在基於文化的基礎之上進行報導，企圖傳達「文化傳承」的精神與報導宗旨，已然是原民臺呈現阿美族報導的原則。

四、「傳統儀式」面向多呈現於「部落豐年祭」報導

儘管是祭典新聞，研究者發現，阿美族豐年祭報導中對於傳統儀式的呈現，非如同對於「著重部落現今處境」與「著重文化傳承精神」兩報導面向般強調，傳統儀式的呈現多於原鄉地區部落豐年祭，大多時候為報導的配角，於報導前段深入解釋一部落祭典文化細節與意涵，旨在帶出其他報導面向。

內文：部落年齡階級迎靈歌舞至午夜進行夜餐，切肉分食是
祭儀中最嚴謹的過程，特別在會場中央進行，並由一
定的階級負責，長老階級的豬肉，一點都不能馬虎，

否則將受到指責，從最年長者依序必須享有豬肝、豬心等好吃的內臟，這主要是敬老尊賢及訓練族人成長過程中學會如何切肉分食。

(原民臺，2014年7月12日)



此篇日期為 2014 年 7 月 12 日，名為〈Kinanoka 阿美迎靈祭，Malikoda 揭序幕〉的報導一開始使用祭典畫面以及記者旁白帶出了部落豐年祭盛況，接著部落領導人解釋該祭典由來與儀式的意義，年齡階級成員深入解釋儀式的過程，報導結尾則帶出了部落現實狀況，強調時代的改變，傳統與現代交會重塑了祭典的形貌。

內文：部落的迎靈祭儀過去都是通宵達旦跳到天亮，越是清晨，年齡階級的歌聲展現越優美，非常吸引女士小姐們到場聆聽，而且到了清晨會進行部落優秀人員表揚，但隨著時代的變遷、人口外流、少子化現象，及體恤年輕人體力不足，吃完宵夜後再繼續跳到一兩點就結束，表揚儀式也不再舉行了。

(原民臺，2014年7月12日)

傳統儀式的呈現反映了阿美族人順應時代演進而做出的文化調適，但在另一則 2016 年 8 月 23 日，名為〈Takufan 部落年祭，Mikesi'河祭捕魚〉的報導中則可看到，臺東關山鎮德高部落豐年祭第二天的河祭傳統儀式中，訴說河祭在豐年祭中的意義、過程、過去面貌與現今樣貌，進一步帶出文末所要強調的文化傳承意義。

內文：德高部落族人，至今依然遵循傳統的豐年祭及河祭的傳統文化，不管在哪裡就學就業，部落族人每年一定會回鄉參加，遵守年齡階級倫理，也學習傳承部落傳

統文化，從祭典當中也能看到阿美族年齡階級的重要性。

(原民臺，2016年8月23日)



在豐年祭相關報導當中，傳統祭典儀式的呈現多於原鄉地區之阿美族部落，報導中基於傳統儀式的表現進而帶出新聞中多為「著重部落現今處境」與「著重文化傳承精神」等面向，強調傳統文化受到現代社會發展的影響而有了變形，人口外流讓文化傳承的工作更形重要。

相對於部落豐年祭報導，經檢視2014年至2016年都會區豐年祭報導顯示，報導慣於以阿美族傳統儀式開頭，但原民臺記者對於傳統儀式的呈現賦予較少著墨，重點在於其他祭典報導面向，大致呈現出，阿美族人與其他原住民族人於都會生活現況、族群融合的跨文化互動狀態，同時亦可發現都會區聯合豐年祭儼然成為一個重要的場域，在其中傳承文化的意義深遠，年輕族人藉以接觸文化、學習文化，於再現文化傳統的過程中，帶出文化流失的現況，呼籲族人傳承文化。整體看來，報導中傳統儀式的呈現僅稱得上通篇配角，讓報導得以奠基於文化基礎上，宣揚原民臺記者所認為重要的報導觀點。

五、「跨文化互動」面向多彰顯於「都會區豐年祭」報導

研究者大致歸納出，都會地區豐年祭報導主要呈現「著重文化傳承精神」、「強調跨文化的互動」與「著重政治宣傳面向」等報導面向，從新聞標題就能看出都會聯合豐年祭所強調文化傳承精神，就內容呈現也能發現，在感嘆現今社會處境對於文化傳承的窘境之外，現今聯合豐年祭實然成為阿美族人傳承文化的重要場域。

標題：新店舉辦豐年祭 都會族人傳承文化

內文：現場除了舞蹈表演，還有鋸木活動，就算下著小雨，族人們還是把握和親友相聚時刻，更希望都會地區青年學子參加豐年祭，能了解阿美族文化。

(原民臺2015年8月30日)



標題：基隆深澳聯合豐年祭 都會區傳承文化

內文：多年來，基隆市連續舉辦過多次聯合豐年祭，雖然無法將部落傳統祭典完整移植到都會地區，為了讓定居在基隆市阿美族人，能夠有機會接觸祭典文化，聯合豐年祭也成為都會地區維繫族群文化的重要場域。

(原民臺，2015年9月28日)

標題：桃園平鎮聯合豐年祭 力傳族群文化

內文：一年一度的原住民族豐年祭Ilisin，可以看到許多家長帶著小朋友一同參加，要讓傳統文化在都會地區扎根。

(原民臺，2016年7月31日)

此外，都會聯合豐年祭報導亦帶出其讓旅居在都市，來自不同部落的阿美族人，抑或是不同族群的族人能夠一同共襄盛舉，將聯合豐年祭的精神意義導向如同一個部落豐年祭，在這場祭儀當中不需分你我，彼此交流情感則讓都會區豐年祭典有了不同文化意義，而跨文化的互動則成了報導中所要凸顯的重點。

內文：手牽著手，大會舞中有太魯閣族、布農族、卑南族等不同族群族人，桃園市一年一次的聯合豐年祭活動，融合原住民族16族的文化特色，透過歌舞展演；或是阿美族成年禮，每一個族群，都是豐年祭活動的主角。

(原民臺，2015年10月24日)

從少數幾則報導中，也能發現原民臺記者試圖透過以不同的報導角度呈現阿美族祭典相關新聞，看見豐年祭在都會區的變形，阿美族人用另類的方式表現對於阿美族豐年祭典的獨有情感與精神意涵。



內文：族人穿著阿美族傳統服飾，跟著音樂擺動身體，並喊出我愛警察，因為每逢七八月花東地區舉辦豐年祭時間，許多族人警察都要前往部落或豐年祭典現場宣導禁止酒駕等勤務，根本無法休假，回鄉參與祭典儀式；為了讓族人警察也能夠感受豐年祭文化，花蓮阿美族警察聯誼會則舉辦警察豐年祭。

（原民臺，2016年9月25日）

2016年9月25日一篇名為〈執勤未能參加祭典，舉辦警察豐年祭活動〉的報導，其中提到警察因執行勤務無法返鄉參與豐年祭，而自辦豐年祭。

花蓮阿美族警察聯誼會長 余傳廣（阿美族）
慰勞我們沒有參與部落豐年祭的同仁，所以我們選擇了這一天，讓全縣阿美族的警察同仁，通通都能夠參與，來回顧、分享我們的固有文化。

（原民臺，2016年9月25日）

另外，在2015年8月16日，從一篇名為〈無法返鄉參與祭典，青年辦衝浪烤肉聚會〉的報導同樣以未能返鄉參加豐年祭的族人為報導主角，都會青年以「烤肉聚會」彌補無法回鄉參與豐年祭的缺憾，進而聚集其他青年，拉近彼此的距離，也試圖凝聚青年對文化傳統的向心力，由此可看出，豐年祭對於阿美族人來說，始終有著重要的精神意義。

內文：邊烤肉邊唱阿美族歌謡，看似以為在部落，約30位阿美族年輕人，在宜蘭知名的衝浪景點烏石港烤肉聚

會，為了讓無法回鄉參加豐年祭在外打拼的年輕人，可以聚集在一起。

(原民臺，2015年8月16日)



即使報導中所呈現的非如部落豐年祭般嚴肅的氣氛，但在此研究者認為，原民臺記者以報導不同的形式之「豐年祭」，試圖傳達阿美族豐年祭對於現今族人的意義，也企圖將對於文化傳承的積極態度，透過此類較屬軟性與生活化的報導風格，透過原民臺播送，達到鼓勵青年返鄉參加祭點以達傳承文化之目的。

六、阿美族豐年祭報導強調「政策宣導」

內文：在桃園市盛大舉行的原住民族聯合豐年祭活動，各族群朋友都熱情參與，市長鄭文燦更不忘在公開場合，向原民會主委毛遂自薦，表示桃園青埔才是原住民族博物館興建最佳選址。

(原民臺，2016年10月15日)

於該名為〈原民聯合豐年祭登場，市長盼原博館建桃〉的報導中，身為政治人物的桃園市長鄭文燦在都會聯合豐年祭的場合當中表示，希望在其任內完成原住民族博物館的興建，同時也在報導當中可以看到其強調與原住民相關之福利政策。

內文：市長鄭文燦也祭出多項安居樂業政策，包括保障社會住宅原住民族比例、設置原住民族實驗高中等，希望保障都會區族人安居權益。

(原民臺，2016年10月15日)

桃園市長鄭文燦透過聯合豐年祭的舞台宣傳任內的原住民族福利政策，若將視角轉至新北市政府，名為〈新北阿美歲時祭儀，青年報信息揭序幕〉的報導中，身穿阿美族傳統服飾的青年，進入新北市政府大廳進行阿美族傳統「報信息」儀式，為樹林區原住民主題部落公園揭幕並結合聯合豐年祭的活動進行宣傳，以阿美族傳統儀式昭告大眾一同參與該活動，而時任新北市長的朱立倫相同於桃園市長鄭文燦以此做為任內政策宣傳的舞台。

前新北市長 朱立倫 漢族

我們新北市的樹林原住民主題公園有舉辦今年的ilisin歲時祭的活動，也歡迎所有的原住民朋友還有我們所有的新北市民，都歡迎大家共同來參與這個具有文化以及原住民特色的活動。

（原民臺，2016年10月24日）

在所有阿美族豐年祭相關報導當中，「著重政治宣傳面向」的報導數量僅有6則，上述兩則報導為政治人物以宣傳任內相關政策為導向的政治宣傳，其他4則為著重部落豐年祭中談論到與部落現況相關的部落重建的相關政策，較為不同的是非以某政治人物出面宣導，也未刻意彰顯某政治人物事蹟的報導角度，而是呈現出部落問題與需要，並以政策宣導為主要報導目的。

在報導的分析當中，研究者發現，在2014年至2016年間的阿美族豐年祭典新聞中，原民臺記者並非任由政治人物握有自我宣傳的麥克風，而是透過與政治人物的對話當中，訴原住民族人處境，並交代相關政策背景脈絡，最終傳達出政策對原住民族群的權益利弊以及相關政策配套措施；而政治人物宣傳其任內事蹟，亦是試圖讓原住民族人知道此一政策之訊息，若就政治人物宣傳自身的目的與使族人知曉有該政策兩報導背後意圖來看，研究者認為原民臺記者是以後者為重。

研究發現「政治宣傳」以「政策宣導」的面貌呈現，於此便能看出原住民新聞記者所著重報導觀點是以關切與族人相關的社會福利政策，採訪與原住民相關之公共政策議題，以原住民族人為主體，彰顯出原民臺具自主性之報導視野。



七、「著重文化政策」面向彰顯「鼓吹者」新聞意理

在阿美族祭典新聞當中，可以發現「著重文化政策議題」的報導角度多以阿美族祭典做為引言，帶出阿美族人因為文化政策所遭遇的現實處境與挑戰，如 2014 年「部落觀光元年」此一推動觀光發展的政府計畫，後續於 2015 年至 2016 年間「返鄉列車」與「祭典假」等議題之相關報導，其中主要關注在於族人觀點、政府說法，以及相關政策配套措施。

經統計發現，「著重文化政策議題」面向的報導共計 20 則，於報導中能夠看到原民臺報導角度則針對原住民族權益切入，在消息來源的選擇以及訪問過程也能明顯看出，原民臺記者以原住民族所遭逢處境做為報導訪問的基礎，在身為族群媒體的角度看來，能夠嗅到原民臺試圖彰顯原住民主體、讓在地發聲，伸張原住民在文化上因為社會體制因素而消逝的文化權益，原民臺的報導如同「鼓吹者」角色，透過積極報導與原住民族政策相關議題，讓原民權益受到重視，更在政策上明顯的改善（李金銓，1988）。

每年七到八月，花東阿美族各部落舉辦豐年祭，但要在旅遊旺季搶到一張返鄉車票，對都會區族人來說，相當頭痛，為了解決都會區族人返鄉參與祭典的交通困境，經過立委陳瑩和中央多方協調，交通部預計今年七月開始；開放豐年祭周末，加掛列車讓族人順利返鄉。

（原民臺，2016年4月22日）

2016年4月22日，名為〈花東祭典返鄉票難買，台鐵擬加掛車廂〉的報導直言，臺灣原住民族群祭典假於現今尚未滿足各族群理想的要求，祭典假的天數不夠，讓族人難以返鄉參與祭典，原住民籍政治人物為原民權益力陳。



原住民籍立委 陳瑩（卑南族）

除了連續假期的問題，車票要解決，不然有了假期我們還是回不了家。

（原民臺，2016年6月7日）

報導中，原民臺記者試圖以採訪官方人物與部落族人，試圖達到彼此間對話的可能，臺灣鐵路局應該如何解決該問題？於後續相關報導中便呈現了阿美族人對此議題的看法，並力倡政策改善。

阿美族一般民眾 Sita（阿美族）

加掛的話變成說車廂的座位有限，返鄉的人潮一定比車廂的人數還要多，我覺得加掛的話，可能還是不夠，希望可以再多一點。

（原民臺，2016年4月22日）

阿美族一般民眾 Tango（阿美族）

我覺得應該要增加車次，因為每個部落豐年祭都不同，可能也會有人早點回家，有時候可能人多有時候人少，我覺得可以再觀察。

（原民臺，2016年4月22日）

臺鐵局後續針對族人所表達出的想法做出回應，並且經過全盤考量後，應允祭典列車於2016年7月上路。

臺鐵局視察 劉雙火（漢族）

從七月一號到九月這個期間，每個禮拜的周末我們都提供520個座位，供我們原民部落族人返鄉參加祭典。

原民臺，2016年6月22日



原住民花東祭典列車於2016年7月1日首次推行，而於正式營運前「購票事宜該由誰主則」同時亦成為報導討論的重點，起初是由原住民族委員會設計訂位系統，透過資料庫辨識訂位者是否具原住民身分，依照訂票網站的登記數量，將所需車票數量交由台鐵（原民臺，2016年4月22日）。不過，有立委卻認為，訂票事宜不能只讓原民會負責，台鐵局應當主責處理該事項，因此，臺鐵局後續也回應，自2016年7月1日花東祭典列車第一梯次開始，售票都由臺鐵局協助處理（原民臺，2016年6月28日）。

族人只要在網絡登記乘車地點，樹林搭車可以在宜蘭、基隆、臺北、樹林、桃園、中壢火車站取票，臺中搭車可以在高雄、臺南、臺中火車站取票，讓族人購票更加方便。

（原民臺，2016年6月28日）

而時至近日，根據蘋果日報（2017年3月16日）的報導指出，為配合花東地區原住民族人返鄉參與祭典，臺鐵局宣布增加6列指定車次自強號加掛車廂，族人得以於網路上登記購票。由此，可以看到政府部門對原住民族文化權益的立即重視，雖未能達到上述族人所提到的增加車次的作法，但是藉由其他媒體的報導卻能看到此一政策陸續的改善與進行，希望能夠滿足原住民族人的需求。

研究者認為，該政策雖為原住民籍政府人物所提倡，但是報導所能發揮的效果不僅僅只是讓族人藉此發聲，表達自身對該事件的觀點，同時，原民臺記者採訪的過程也是讓受訪的部門代表對此一事件的再度重視，並且對此一事件能夠進行更全面的思考與回應。站在原住民族群角度出發，在此類文化政策新聞的報導面向當中，可以看見原民臺具備「鼓吹者」的守門人新聞意理。

第四節 小結



在2014年至2016年間為數100則阿美族豐年相關報導中，從「報導區域分佈特性」來看，經統計發現，花東地區豐年祭相關報導佔多數，再者為都會區豐年祭之報導，一來反映出阿美族人於現今社會環境中的居住區域分布，二來可看出阿美族豐年祭主要於原鄉地區部落舉辦，原民臺則在花東駐地記者配置數量相當有限的狀況下，完成部落豐年祭的報導，而少數關於文化政策的報導則仰賴都會地區與部落地區記者的跨區編採合作，將部落族人對政策觀點納入報導中；研究者亦發現，原民臺在以阿美族豐年祭做為報導主體的同時，報導涉及阿美族群外，亦與其他族群有關，納入其他族群觀點，有如文化政策相關報導的呈現，經研究者初步針對「報導區域分佈特性」分析結果發現，報導特性呼應張錦華（2012）針對原住民族新聞報導獎項「雲豹新聞獎」作品進行分析後所歸納出五項原住民報導觀點中的「原住民發聲」與「跨文化對話」面向。

為了解祭典報導中誰握有發聲權？研究者進一步分析「報導消息來源特性」，主要從消息來源「身分」、「族群」、「性別」、「使用語言」及「人數」等面向進一步探看報導消息來源所呈現出的新聞操作原則。

從「消息來源身分」看來，回顧黃譯淵（2008）研究賽夏族巴斯達隘祭典觀光化報導的消息來源多偏向「行政機關首長、民意代表」、「專家學者、學術單位」、「部落組織、文化協會」與「警政相關公務人員」，但於本研究中卻能見明顯差異，以「原住民一般民眾」與「部落傳統領袖」佔所有消息來源人數達7成之多（70%），再來則是「原住民籍官方人物」、「原住民民間組織」、「原住民文化藝術人士」佔總人數2成多（21%），顯見「原住民一般民眾」為阿美族豐年祭報導焦點，「專家學者」消息來源則未受偏重，原住民籍傳統領袖則做為形塑祭典樣貌與解釋部落遷移歷史的重要消息來源。從「消息來源身分」的分析亦可初步得知，原住民族人握有報導的發聲權。

接著就「消息來源族群」進行統計，可以發現報導中消息來源「阿美族」做為消息來源的人數達總消息來源數8成多（85%），其餘依數量多寡依序為

「漢人」（23%）、「排灣族」（9%）、「卑南族」（2%）、「布農族與泰雅族」（各1%），主要出現於有關祭典觀光化、祭典假、返鄉列車及都會區聯合豐年祭相關報導，不過研究者亦發現有些族群則因所佔人數僅1人，故所佔比例不達1%，其他族群甚至不可見，但研究者於分析過程仍將其納入，發現原民臺的阿美族祭典文化與相關議題報導亦能關照其他族群，使其他族人也能藉報導發聲。由「消息來源族群」進行分析即能發現，原民臺記者考量各族文化傳統之獨特性，消息來源偏向以阿美族人做為採訪對象，同時又採納其他族人意見與觀點。

在阿美族的文化傳統中，男、女性別分工有所差異，男性年齡階級在部落社會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男性擔負了維護部落安全的任務，年齡階級層層分明，在豐年祭舉行過程中各司其職，女性則因傳統文化約定俗成及禁忌無法參與以男性為主的豐年祭，主要在豐年祭中扮演家務勞動者的角色。研究者針對報導進行「消息來源性別」的統計及分析即可明顯看出男性做為消息來源之比例遠高於女性，達總消息來源數之7成多（75%）。研究者試想，基於阿美族男、女性別分工差異，且在祭典文化與禁忌規範的養成，使得原民臺記者在由男性主導的豐年祭中，鏡頭多偏向以男性為報導主角，女性則多以「場外勞動者」的形象被再現，但不可否認女性在祭典中仍佔有重要的地位，沒有場外的女性勞動，何來男性的祭典實踐？就如過去學者研究發現，阿美族男、女性在辦理祭典儀式時，彼此分工具有互補性，而非二元對立（黃宣衛，1989；羅素玲，2005），只是基於傳統，讓男性在豐年祭中得到更多關注，而在少有看似以女性為主角的報導中，仍做為襯托男性重要性的配角，孫嘉穗（2016）則在其研究中發現，原民臺族群新聞中原住民族女性形象不足，且時常受傳統性別角色框架限制，鏡頭缺少對女性的關注，使女性形象逸失，與本研究所見相互呼應，也不由地讓研究者反思此現象，認為阿美族男、女性於豐年祭中的分工智慧應當言明於報導中，使大眾知其脈絡，讓女性在相對於男性所佔的媒體位置，能多被看見。

近年來，原住民族人提倡「文化復振」，原民臺做為肩負傳承族群文化的族群媒體，在如何落實族群「語言」復振有諸多討論與嘗試，儘管是以漢語播

報為主的每日新聞，在其中亦不乏阿美族語的使用。以「消息來源使用語言」看來，使用「漢語」的消息來源佔總人數近8成（78%）比例，使用「原住民族語」（阿美族語）的人數佔近2成比例（16%），其餘為「漢語加族語」及少數以「外語」回應之消息來源，而使用「族語」的消息來源多為「部落傳統領袖」；研究者亦發現，花東地區駐地記者採訪時，能憑藉著流利的阿美族語與「部落傳統領袖」互動，根據記者的翻譯即能見消息來源對祭典與歷史的詳細解釋，反觀都會區聯合豐年祭相關報導，北區原民臺記者多以漢語採訪，取得之資訊豐富程度則有別於前者，大多以描述祭典會場情形為報導重點，反映出都會區原民臺記者與原鄉地區駐地記者族語能力的差異。研究者試想，若「族語」成為與「部落傳統領袖」溝通的利器，接連影響的就是原民臺記者所能取得資訊的多寡與深淺。

本研究不僅試圖從所有豐年祭相關報導中釐清「誰握有發聲權？」亦透過統計分析探看單則報導中原民臺記者選擇消息來源的數量及操作的手法。就「消息來源人數」看來，單則報導出現3位以上消息來源的報導則數近7成（69%）比例，經檢視新聞報導，可看出原民臺記者試圖在涉及部落地區豐年祭、都會地區聯合豐年祭，及文化政策相關報導中，呈現更多元的觀點，依照報導屬性採納多方意見，讓更多消息來源得以發言表達意見，進而由「消息來源族群」一項的統計亦能反映報導中企圖讓阿美族人詮釋祭典文化、發表政策意見；此外，研究者發現，原民臺報導多與部落站在同一陣線，在諸多消息來源中多可見以部落為主體、以文化為基礎，呈現有利部落的陳述，如部落觀光化此一議題，發現原民臺與部落族人觀點趨於一致，報導論及部落祭典能不受干擾的期待，以維持純粹的樣貌。報導寫自記者之手，研究者試想，原民臺記者做為原住民族與原民臺的一份子，在採訪原住民族人時，報導所欲呈現的觀點已代表記者本身，研究者亦不免臆測，針對報導進行把關的原民臺新聞室與原民臺記者觀點磨合，造就研究者所見報導面貌，呈現記者、部落、新聞室間的平衡狀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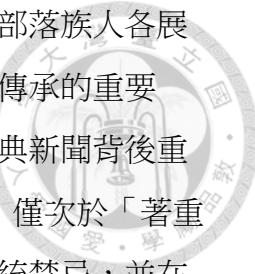
從消息來源相關指標的分析可以發現，報導中主要的受訪者為原住民族人，並以阿美族人所佔比例最多；藉由年齡階級與豐年祭間的關係帶出男、女

性別分工差異，彰顯出阿美族文化內涵，不可否認地，所報導面向宜多加關注女性，將阿美族豐年祭與性別分工的智慧帶出，將報導中文化內涵能更完善呈現；觀察都會區豐年祭相關報導中，原民臺記者採納多元族群的觀點，反映跨族群間文化交流的特質，並在文化政策相關議題中，採訪所佔少數的漢族及其他族群消息來源，藉由不同的議題，促進跨族群間的對話，有別於主流媒體報導框架，以原住民族人現今社會處境，顛覆以漢族為中心的單一框架，提供反論述，為原住民相關權益的爭取發聲；整體而言，「報導消息來源特性」分析一節，呼應了張錦華（2012）所提「原住民發聲」、「彰顯原住民族文化特質」、「原住民議題」及「跨文化對話」等原住民族報導觀點。

最後，研究者以「著重部落現今處境」、「著重傳統儀式呈現」、「著重文化傳承精神」、「著重文化政策議題」、「著重政治宣傳面向」、「強調部落族人自主」與「強調跨文化互動」等主題探看整體「報導著重面向」。

本研究探看2014年至2016年間的阿美族豐年祭相關報導著重面向，經統計發現，「著重部落現今處境」此一主題為阿美族豐年祭報導中最為強調的報導面向，佔近7成（69%）比例的報導中呈現此主題面向。2014年「祭典觀光化」、2015年「返鄉列車」、2016年「祭典假」，及3年間部落豐年祭與都會區聯合豐年祭相關報導無不帶出部落正面臨「部落人口外流」、「傳統文化流失」、「部落資源有限」等困境，隨之而來的是「祭典儀式變形」、「部落觀光發展」等影響層面。

原民臺做為一族群媒體，報導中不乏呈現阿美族人在面對前揭議題時所表現出的自主性與能動性，反映「強調部落族人自主」報導主題，近3成（28%）比例的報導呈現此一主題面向。如在文化政策相關議題中，面對祭典觀光化的影響，部落族人透過實際作為，如在祭典場域中進行分區管理及發放攝影證等應對措施，力使祭典不受外界干擾，無不強調祭典不可侵犯的神聖性，更在鏡頭前為與自身相關政策訴說看法，並為部落發聲，捍衛族人權益。



而在面對「部落人口外流」與「傳統文化流失」的困境下，部落族人各展身手，在擁抱現代社會發展的同時，亦保有其主體性，彰顯文化傳承的重要性。研究者發現，「著重文化傳承精神」此一報導主題往往為祭典新聞背後重要主旨，經報導統計逾6成（63%）比例報導呈現此一主題面向，僅次於「著重部落處境」報導面向。報導中族人遵循傳統辦理豐年祭，謹遵傳統禁忌，並在鏡頭下呈現族人在祭典儀式中如何延續祖先智慧與價值？儘管遭遇文化斷層與流失的窘境，原民臺記者鏡頭下的部落與族人並不悲觀，報導所反映出的是文化存續的光明面，透過正向報導肯定部落族人對振興文化的作為，帶出復振文化的希望，並藉由族人之口，在面對文化逐漸流逝的現今，進而道出文化傳承的急迫性與重要性。

既為阿美族豐年祭報導，應當不乏對於祭典儀式的報導呈現，但經研究發現，原民臺在阿美族豐年祭報導中「著重傳統儀式呈現」此一報導主題的則數較少，佔總報導則數3成（33%）比例。該主題面向報導多出現於部落地區豐年祭的報導，報導中傳統儀式的呈現深入並富有記者所做文化解釋，但經檢視通篇報導，研究者發現，部落豐年祭傳統儀式的呈現經常扮演配角，做為報導引信，旨在帶出「著重部落現今處境」與「著重文化傳承精神」報導主題面向，而反觀「都會區豐年祭」所呈現的傳統儀式細節相對更少，對於祭典文化意涵著墨為少，主要透過族群融合的報導視角帶出「強調跨文化互動」此報導面向。

經檢視都會區豐年祭相關報導可發現，聯合豐年祭已然成為都會區阿美族人學習並傳承文化的重要場域，甚至是其他族群接近原住民族群文化的一個管道，他們從中交流文化、情感，賦予聯合豐年祭嶄新的文化意義，在不到2成（15%）比例的報導中即反映「強調跨文化的互動」此一報導面向。該主題面向報導除了呈現阿美族與其他族群參與都會區豐年祭的融洽，更透過強調現今豐年祭不限地區、型式、參與人員等特質的軟性報導，帶出文化即生活的精神，有別於部落豐年祭報導所呈現的嚴肅氣氛，更多的是對於「豐年祭」文化意義於異地重生的面貌。豐年祭的變形儘管源自於現代社會發展的諸多影響，但不可否認地，順應時代而生的「豐年祭」象徵著重要的文化精神意涵，亦有

助於凝聚都會區阿美族人對文化傳統的向心力，藉由報導進一步宣揚鼓勵族人返鄉傳承文化的宗旨。

都會聯合豐年祭不僅具備文化傳承、凝聚族人的功能，對政治人物來說，其提供了政策宣導的場域。本研究以「著重政治宣傳面向」報導主題探看政治人物在祭典報導中所扮演的角色，研究發現，涉此一報導面向則數最少，數量不達總報導則數1成（6%）比例，政治人物的出現主要為宣傳其任內與原住民族權益相關政策，另一則是宣傳有關部落重建政策，經檢視所有報導可見，在原民臺與原民臺記者的把關之下，相關報導非但沒有成為政治人物的傳聲筒，還仍以部落與原住民族人為報導主體，關切與原住民族相關政策。

交通部觀光局訂2014年為「部落觀光元年」，推出部落遊程行銷部落文化，而於該年一系列部落觀光化相關報導湧現，2015年至2016年則以分別以「返鄉列車」與「祭典假」為主要文化政策報導的議題，於本研究反映「著重文化政策報導」此一主題面向，且經報導統計有2成（20%）比例報導呈現此一報導主題。經檢視相關報導，報導中不乏族人觀點、政府說辭，及相關政策配套措施，原民臺記者藉由採訪，試圖讓原住民發聲，並促進與政府間的溝通，研究者認為，原民臺如同「鼓吹者」角色，一方面透過積極報導與原住民族政策相關議題，讓原民權益受到重視，促成政策的改善，另一方面採納各方意見，完善且平衡報導。

研究者透過「報導著重面向分析」一節，由各報導主題面向加以對照張錦華（2012）所提原住民族報導觀點，「著重傳統儀式呈現」主題面向呼應「彰顯原住民族文化特質」觀點；「強調跨文化的互動」主題面向符合「跨文化對話」觀點；「著重文化傳承精神」主題面向則主要以「正向報導」觀點帶出文化傳承的希望與重要性；「著重部落現今處境」、「強調部落族人自主」、「著重政治宣傳面向」與「著重文化政策報導」主題面向則皆以部落與族人為主體，透過各種議題的報導，呈現部落處境、部落主體性相關論述，以原住民族為本，同時採納他族群之陳述，反映「原住民議題」與「跨文化對話」觀點。

整體而言，本章透過「報導區域分佈特性」、「報導消息來源特性」與「報導著重面向分析」三節，可見大致扣連張錦華（2012）所提五項原住民族報導觀點，初步歸納出原民臺如何呈現阿美族豐年祭報導，甚或說原民臺記者以何報導觀點呈現阿美族豐年祭。



第五章 原民臺「記者」訪談分析

研究者於前章以「報導區域分布特性」、「報導消息來源特性」與「報導著重面向」檢視原民臺如何呈現阿美族祭典新聞？具體彰顯出何種原住民族新聞報導觀點。本章則做以探討原民臺記者如何報導阿美族豐年祭？依據報導實踐區分為「採訪面」與「報導面」進行分析，探看記者文化價值如何影響新聞實踐？又反映何種文化價值指標？

本章第一節針對「原民臺記者如何『採訪』阿美族豐年祭？」進行分析。首先，透過「記者的族群身分與文化背景」此一分析層面，了解原民臺記者對於自身族群文化的認識，及其參與自身族群祭典的經驗，確認其所具備的族群文化價值，是為檢視「文化價值」形塑的面貌；接著，藉由「記者的阿美族豐年祭採訪經驗」及「記者與消息來源間的互動」等分析層面，探看原民臺記者所採取的採訪策略、釐清所採取的採訪手段本身與自身族群文化間關係，並確認當「記者」與「消息來源」間處於採訪關係時，何為記者採訪優勢？何為採訪限制？以知曉記者「文化價值」影響的面向。簡言之，研究者基於原民臺記者自身「文化價值」，探究其如何影響阿美族豐年祭報導的「採訪」實踐？

第一節 原民臺記者如何「採訪」阿美族豐年祭

表 12：受訪記者基本資料

編號	性別	族群	專職路線	資歷
A	女	布農族 拉阿魯哇族	北部記者—全路線	8 年
B	男	阿美族	駐地記者—全路線	12 年
C	女	魯凱族 卑南族	北部記者— 教文政治線	4 年
D	男	布農族	北部記者— 教文政治線	5 年
E	男	阿美族	駐地記者—全路線	12 年

根據本研究報導內容分析結果發現，阿美族豐年祭報導依報導發生地可以劃分為「都會區」與「原鄉地區」，「原鄉地區」之報導佔多數（達 66%），其中即包含了多則分布於花東地區的「部落豐年祭」報導，但就報導記者之統計發現，花東地區記者配置有限，多由少數幾（3）位駐地記者完成「部落豐年祭」之報導，反觀「都會聯合豐年祭」多發生於北部地區，相形之下北區記者配置數量較為充足；但若就祭典新聞呈現來說，仍能看出顯著差異，部落豐年祭報導多具備祭典儀式與文化解釋的呈現，內容且深且廣；而都會聯合豐年祭卻鮮有祭典文化意涵的呈現，多強調族群融合、文化傳承面向，報導之所以有此些差異，則關乎記者對於阿美族傳統文化與祭典儀式認識的深淺，亦即對於阿美族祭典理解的多寡，及其如何與消息來源互動，取得足夠的資訊；本研究訪談對象基本資料與擔任原民臺記者年資如表三。

一、記者的族群身分與文化背景

（一）駐地記者具備豐富阿美族文化知識

本研究受訪者中，原民臺 2 位花東地區駐地記者 B 與記者 E 皆進入原民臺逾 10 年，皆非新聞傳播科系出身，但都參與公共電視《原住民影像人才培訓計畫》¹⁷並結訓，當談到自己參與阿美族祭典的經驗時，記者 B 與記者 E 的部落經驗具有同工之妙。

記者 B 談道，由於自身部落對外交通系統於 80 年代才建設完備，部落始與外界聯繫，因此部落文化保存完善，至今仍保有傳統的年齡階級，而過去，部落阿美族男性自 13 歲開始便進入年齡階級，被訓練著成為真正的阿美族人，而

¹⁷ 1994 年，公共電視首創《原住民影像人才培訓計畫》，開先例招訓 24 名原住民族人投入影像的工作，依作品的優劣進行評選，晉用 11 名結訓學員為公視記者，這是臺灣有史以來，首支由原住民所組成的電視節目工作團隊，而該計畫後續於 2001 年與 2002 年分別又辦理了第二屆與第三屆原住民影像人才培訓課程。網址：

http://web.pts.org.tw/php/news/abori/exh/docu_1.htm，上網日期：2018 年 12 月 31 日。

他自己也是依循此路徑，深受阿美族文化薰陶，從低階級至高階級，年復一年，後來做為古調領唱者，扮演文化傳承的重要角色。



對！每一年都參與（指阿美族豐年祭），所以對土地、對文化、對部落很有感情，雖然現在的人都到都市，把小孩子帶到都市，因為在 76 年就開始實施休耕制度之後，休耕了之後，田就荒廢嘛！可以領那個休耕費，所以父母親都把小孩子帶到台北工作，工作之後就開始買房子，小孩子就在都市長大，所以現在的小孩子都跟部落離很遠，那講祭典我幾乎是在部落裡面參與得非常深入啦！而且我還是部落裡面的領唱員。

（記者 B，男，阿美族，訪談紀錄）

經檢視 2014 年至 2016 年間阿美族豐年祭報導確實不斷反映出，因著現代社會的發展，導致部落人口外流、部落傳統文化逐漸流失、男性年齡組織逐漸鬆動瓦解，部落更因現今體制帶動豐年祭典文化的變形等面向，而離鄉背井似乎成為多數部落阿美族人皆須面臨的關卡。然而雖身處異地，但那份對文化的「認同」卻根深蒂固於他的心中，記者 B 回憶道：「甚至我在當兵的時候，今天是豐年祭，今天晚上是第二天，我在站衛兵的時候就自己唱祭典的歌，好像我跟你們（指部落族人）同在一樣。」（記者 B，男，阿美族，訪談紀錄），顯見其對於自身文化的崇敬與渴求，並於服役期間藉祭典歌曲的吟唱一解無奈的思鄉之情。

退伍之後，記者 B 憑藉著流利的阿美族語，幫助紀錄片導演與祭典研究專家學者進行阿美族祭典的田野調查，並擔任部落與專家學者間溝通的橋梁，先後將部落祭典搬上國家戲劇院的舞台進而推廣，且協助專家學者進行其他族群之文化田野調查，過程中不僅更強化自身對阿美族祭典文化的了解，同時也培養對其他族群文化的理解與文化敏感度，後來的他又進到公視《原住民影像人才培訓計畫》，接受媒體實務訓練。

因為我們在公廣集團培訓的時候，他就叫我們單機跑啦！教我們單機，怎麼去寫稿、怎麼去剪接，因為那個時候老師還滿多的，孫大川、虞戡平他們那個時候都是我們的老師嘛！所以我們就學的比較完整。

(記者B，男，阿美族，訪談紀錄)



經過扎實的新聞採訪訓練後，地下電台與地方新聞台曾是他實踐媒體專業的場域，3年多後，他轉戰建築工程業與製造業，輾轉幾年後，適逢原民臺釋出駐地記者職缺，96年1月1日他正式回到原民臺，擔任駐地記者至今10餘年，累積豐富的祭典採訪經驗，每逢暑假期間，花東地區阿美族部落輪番舉辦豐年祭，其中皆能見其身影。

同樣的身為阿美族的記者E則也是自小就參與年齡階級，學習如何與年齡階級籌備阿美族豐年祭，並在多年過後，晉升成為青年之父¹⁸，甚至還有主導豐年祭的經驗，致力於文化傳統祭儀的復振工作。

研究者：所以你跟你的文化沒有脫離太久？

記者E：而且還主導過。

研究者：對阿！就是那個年齡階級的。

記者E：那時候在主導，一直在回復以前流逝掉的祭儀中的流程，在試著回復。

(記者E，男，阿美族，訪談紀錄)

回想起過去進入公共電視《原住民影像人才培訓計畫》的緣由，原本在鄉公所擔任職員的記者E說；「可能會覺得說這個（新任）首長，可能於未來的合作上或關係上可能沒有辦法那麼自然，所以就轉換一個工作方向！就剛好有一個培訓班（公視原住民影像人才培訓計畫），然後就報名參加了，那其實自

¹⁸ 阿美族語「mama nu kapah」譯做「青年之父」，負責管理祭典期間一切事務的進行。

己比較有把握的也是在文化的部分、部落。」（記者E，男，阿美族，訪談紀錄），顯示出，記者E所擁有的部落經驗、所具備的文化知識與背景成為他在志業選擇上最主要的關鍵。



訴說著自身部落祭典文化保存完善，且浸淫其中數十年，如今在年齡階級中已是長老階級，憑著多年的祭典及文化參與，對於自身族群文化的理解有相當大的信心，對於「採訪」阿美族祭典新聞也有充足把握，即使部落間文化具差異性，憑藉著多年與部落互動、接觸的經驗，總是能迎刃而解。

研究者：所以你在採訪阿美族的新聞，其實對你來說沒有特別困難？

記者E：算滿有把握啦！因為基本上都是我們阿美族的豐年祭文化，從我自己的部落去對照的時候，再去訪其他部落會覺得說基本上阿美族的整個架構結構來講，我最起碼還掌握得住，當然部落跟部落之間的豐年祭會有所不同，但是這部分就我到了現場，多接觸的時候才會去了解。

（記者E，男，阿美族，訪談紀錄）

在他的經驗可見，阿美族文化具有高度相似性，但因部落區域位置的不同，在祭典文化上亦有些許差異；也顯見，當記者E在採訪阿美族祭典時，自身長年積累的文化背景與知識在其進行「採訪」實踐過程中做為利基，並得以做為了解其他阿美族部落祭典文化時的脈絡知識，也為後續原民臺記者文化價值與新聞實踐的分析埋下伏筆。

（二）北區記者與其自身族群文化背景

本研究訪問3名於北部地區跑線的原民臺記者，其皆非來自阿美族群，各自皆具備族群祭典參與的經驗。

從記者 A 對於自身參與祭典的經驗描述中，可見布農族的《射耳祭》是一個屬於「男性」的祭典：「我小時候並沒有去參加祭典，原因是布農族的『射耳祭』就是男性的祭典，所以女生其實根本沒有機會真正參加這個祭儀的過程。」（記者 A，女，布農族與拉阿魯哇族，訪談紀錄），而這樣的祭典禁忌一直為記者 A 所遵守，直至如今仍未參與過她口中專屬於男性的祭典儀式，儘管她身為一名原民臺記者。

據記者 A 所述，布農族是不是要辦理「射耳祭」與其辦理時間取決於「夢占」結果，意即由部落祭司以「夢」中所見，確認祖靈的告示，進而籌備並辦理「射耳祭」。而記者 A 的祖父身為執掌夢占的祭司，於是在祭典辦理籌備期間，部落裡的布農族獵人們聚在家裡開會，因此其對布農族「射耳祭」與其他祭典的認識自小便而濡目染，並且在他眼中的祖父是堅守傳統祭典儀式的，儘管祭典受到現代社會影響，致使祭典儀式有所創新與簡化；即使因為部落資源分配的緣故，導致祭典觀光化與政治人物干擾的現象層出不窮；但從祖父的文化實踐與口述歷史中，依舊能見記者 A 對自身祭典文化背景與知識的認識與積累。

而且你知道嗎？傳統的祭典就是我說的小時候看到的祭典裡沒有報戰功，為什麼沒有報戰功？因為報戰功他是以前是獵人頭的時候才能喊出來的，然後他是因為後來受到日本教育影響，日本（人）說不要去獵頭啊！什麼什麼什麼的，可是布農族人只有在這個時候可以去展現說我這個男人是有地位的，只有在這個時候可以去表達我到底有多厲害，因為布農族男性是比較「沈悶」的，因為他可能在山上他要狩獵或他可能要躲很久，然後他才有機會獵到動物，所以他們話很少，他只有在那個祭典才可以，所以當不能獵頭的時候沒有辦法報戰功，所以當時才轉移變成說，那就用你的獵物報多少然後你去報（戰功）。

（記者 A，女，布農族與拉阿魯哇族，訪談紀錄）

從口述歷史中，記者 A 得以了解布農族人「報戰功」的歷史緣由、出現場合，及受到日本殖民後的限制與轉型，並進一步由布農族男性狩獵時的狀態彰顯布農族人「沈悶」的性格特質。不過在研究者看來，這樣的敘述並無法概括說明布農族男性的性格特質，研究者僅能以受訪者的說法得知布農族男性在狩獵時有其慣用模式，並可能影響性格展現，自記者 A 的觀察，布農族男性獵人是「沈悶」的，這樣的形容至今仍為他對於布農族男性獵人性格的想像，而在對他名記者來說似乎也有著同樣看法。

但是重點其實不是「射耳」這件事情，是他向祖靈啊，像 pasibutbut¹⁹嘛，向天神感謝，祈求小米豐收，祈求打獵能夠（滿載而歸），布農族比較「含蓄」，不能直接、不要直接講，不要講太明白，你透過旁邊的東西去引申，就像我們今天去打獵，不會說獵槍，會說樹枝；你不會說我去打獵，會說我去散步，類似這種東西，因為（布農族）相信靈的存在嘛，不要讓別的靈知道，不要讓動物知道你在做什麼事情，要不然牠就跑掉了呀！」

（記者 D，男，布農族，訪談紀錄）

在記者 D 的認知中，布農族是「含蓄」的，而「含蓄」一詞則是為了使狩獵能夠順利、能夠滿載獵物而歸，同時，亦是在布農族祭典進行過程當中，不願驚動神靈性格的展現，相對記者 A 所說布農族男性獵人的「沈悶」性格，記者 D 對布農族整體民族性展現則是用「含蓄」一詞，而這些形容皆來自於布農族狩獵文化與祭典文化對其如何看待布農族文化的養成。

經訪談記者 D 發現，在他過去參與的布農族祭典中所看見的多是曾被中斷後，而再次被復振後的成果。過去日本殖民政府來臺，部落居住範圍遭改變以方便日方管理，過去的聚落被打散，部落祭典被限制中斷，直至近 30 年前才逐

¹⁹ 布農族語，意指布農族的「小米豐收祭」。



漸復興，而從部落長者口中便可得知過去祭典與復振後樣貌已相去甚遠，然現今祭典經地方政府操作成兼具觀光與聯誼性質的活動，但他卻不否認這些祭典的改變與發展，反而肯定現今僅存傳統儀式的文化意義，甚至將現今不論是布農族或本研究所討論的阿美族祭典儀式的複製與場域置換視為對於年輕族人接近文化、學習文化的契機。

因為我覺得你任何一個動作，都有它的文化的意涵嘛！當然當時這個東西它本來應該不是在這個地方，或者說它不是在都市，它本來在部落，我們把它複製之後，就是你（研究者）說的再現，我們希望能夠讓自己的孩子即使在都市也能夠接觸到這個文化，所以它有一種象徵性的（意義）…。

（記者 D，男，布農族，訪談紀錄）

在記者 A 的敘述中，則能見自身部落祭典因政黨輪替後，國家政府開始重視「文化復振」，經費的挹注使得「社區發展協會」崛起，由協會從中主導，為了協會每一年的成果，「文化復振」的美意促使布農族「射耳祭」由原先為部落共同舉辦，演變成各村皆辦起了該祭典，甚至是由布農族鄉鎮輪番舉辦「全國布農族射耳祭暨傳統技能競賽」，自此，祭典樣貌與意義有了改變，傳統祭典儀式逐漸不受重視，多的是記者 A 口中「聯絡感情」的祭典意涵。

陳水扁（前總統）上任之後，開始提倡文化復振啊！所以開始有經費進駐（部落），然後（社區）發展協會就開始興起，開始有各村的射耳祭、全鄉的射耳祭，還有全國布農族的射耳祭，（射耳祭）就是變成比較像是聯絡感情的那種感覺。

（記者 A，女，布農族與拉阿魯哇族，訪談紀錄）

也許是從小受到身為祭司的祖父影響，對「傳統」總是有些堅持，儘管所謂「傳統」的定義並未被言明，但研究者認為記者 A 所說的「傳統」來自祖父的口述歷史與祖父的身體力行，而那份執著在於對於布農族狩獵文化的傳承，

認為由部落自主辦理的「射耳祭」富有傳統儀式，且能透過儀式呈現農族獵人狩獵文化的價值與核心，而因外界經費挹注所創立的社區發展協會辦理的「射耳祭」則主要關切教育層面，展演性質多過於傳統祭儀的呈現。



因為我必須還要回歸到傳統的（射耳祭），那個畢竟是我一直都沒有參與的，我們（女性）都是從遠觀，所以我對它（射耳祭）的喜好的程度其實我也不是很清楚，我可以知道的是說，傳統的它帶下來的是真正的狩獵文化是什麼？所以這些人會知道說，我去狩獵我可以怎麼樣，它是有狩獵倫理在的，他們（參與祭典的年輕男性）也比較可以理解說布農族真正的狩獵文化應該是什麼，但是非傳統的這些就是可能社區發展協會辦的，它（協會舉辦的射耳祭）就不會放出很多我們真正狩獵文化是什麼？而且它多半是給從外面回來的孩子參加的，那它比較沒有我們真正的布農族狩獵民族的價值的核心在裡面，兩邊的差別就是一個（過去由部落自主辦理的射耳祭）是有實質的文化面，而且是活出來的，然後另外一個（由社區發展協會主導的射耳祭）是教育性質的，它跟我們的生活可能是切割的，兩邊是不一樣的。

（記者 A，女，布農族與拉阿魯哇族，訪談紀錄）

與記者 A 與記者 D 的訪談過程中，研究者得以清楚看見他們透過親身參與布農族祭典而對自身族群文化有著深厚的認識，而其文化知識與背景則建構在口述歷史、長者知識與親身經歷。

經耙梳阿美族豐年祭相關文獻，可見布農族與阿美族文化慣習，甚至祭典儀式的呈現截然不同，但以整體臺灣社會框架而言，布農族群所面臨的文化處境與阿美族群無太大差異。腳踩著同一片土地，全臺灣原住民族群文化與歷史皆歷經歷來殖民政府與現今政府的政策影響，祭典因現代發展而逐漸變形，透過每一次的祭典參與，總能在祭典中看到不同的變化，從中領悟文化意義的轉

變與維持。此外，透過與其他族群祭典的接觸，最能明顯察覺到與自身族群文化間明顯的差異。

比方說像他們舞蹈動作有很多那種踏步，或者是手的擺動啊，或者是他們吟唱的方式，就是你會覺得好像他們在海邊踏浪的感覺。

(記者 C，女，魯凱族與卑南族，訪談紀錄)

記者 C 提到第一次參與阿美族的豐年祭的景象，那是位於花蓮縣壽豐鄉的光榮部落²⁰。在她的印象中，所見阿美族樂舞是不同於自身族群祭典時所呈現出的樣貌，其用「海浪」形容肢體所代表的意涵，指涉分布於沿海地區阿美族因著「海洋」而衍生出的樂舞面貌，記者 C 更提及，阿美族有著許多「與生活息息相關的祭儀」，與自身族群文化對比，身為魯凱族的她認為充滿著差異。

研究者在與記者 C 訪談過程中，發現其未能針對其自身祭典文化的認識進行論述，但從其參與阿美族豐年祭的敘述中，仍能見記者 C 可從阿美族舞蹈、歌謠與祭典等層面，彰顯出阿美族祭典文化與自身族群祭典文化的差異性，可見其對自身祭典文化有著某種程度上的了解，只是在訪談過程中未能被論述。

二、記者的阿美族豐年祭採訪經驗

(一) 駐地記者採訪阿美族豐年祭的策略

記者 E 因著自己長年與阿美族文化親近，並對阿美族豐年祭典儀式有著充分的了解，不否認各部落間豐年祭的差異，「採訪」阿美族豐年祭靠的全是他

²⁰ 光榮部落位於鯉魚山南端，舊名為「鯉魚尾」，據說是早期阿美族抵達花蓮縣壽豐鄉的佇足地，日治時期稱該部落為七腳川社，另有阿美族名稱為「Rinahem」，而七腳川人便是稱居住於該部落的阿美族人。網址：

http://www.tipp.org.tw/tribe_detail3.asp?City_No=19&TA_No=7&T_ID=313，上網日期：2018 年 12 月 19 日。

自身對該祭典文化所具備的背景知識，及現場與消息來源的互動，但在進到部落前，記者 E 先有心理準備，採訪部落祭典所需要的時間並非一時半刻，有時祭典的進行是一整天，有時祭典則是分天舉行，採訪時間則必須分天進行，記者 E 直說：「祭典很難拍。」



因為時間長，它（豐年祭）的內容不是全部呈現在同一個時間點，它是分散的，所以你要花時間阿，你可能要累積，可能要拍一天、兩天才能夠呈現那麼一則，或者是說你光是早上就要等，而且也可能說只有一點點（採訪成果）。

（記者 E，男，阿美族，訪談紀錄）

「很花時間！」儼然已是採訪祭典新聞的必要條件，要逐一掌握部落祭典舉辦時間與期程又是一項挑戰，且有時記者必須權衡，預先排定假日時間進行採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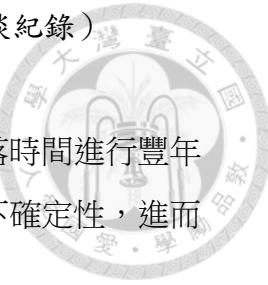
所以很花時間啦！而且它們（部落）原本是訂在這邊，原住民的時間還會往後嘛！還會有這種尷尬，所以說有時候豐年祭典的話，我會有一種做法啦，比如說我想拍這個部落，我要拍，我甚至排假來拍，我利用休假時間去拍它，我隔天上班的時候我再整理。

（記者 E，男，阿美族，訪談紀錄）

因此，「部落窗口」顯得重要，得以讓記者 E 聯繫、掌握部落祭典的最新資訊，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為記者 E 的到訪提供部落祭典的想像與事前準備工作的方向。

你就要花時間去調查，就像現在這個時候，下個月臺東就要豐年祭了，你就要去部落找人問，他們的豐年祭的流程怎麼樣？去判斷你要抓哪一個部分？就要先做調查、田調，要啊，有窗口、有特定的人那是最好，比較方便。

(記者E，男，阿美族，訪談紀錄)



經由訪談可知，每一次的採訪都為記者累積經驗，配合部落時間進行豐年祭採訪已成為記者習以為常的事情，也顯出記者為應對時間的不確定性，進而採取尋求「部落窗口」此一方式試圖讓採訪能更加順利。

此外，每一次的採訪，都使記者能夠從中分析出不同區域阿美族的樂舞風格、傳統服裝，並從祭典儀式的形式辨認阿美族群所屬地域²¹，且以自身祭典文化背景知識做為對照組，從自身部落豐年祭²²出發看各部落阿美族豐年祭典所發展出來的面貌。

對阿！有阿！馬上下個月就一連串的祭儀，我下個目標就是
想要挑戰（我們）這邊的族群（海岸阿美族）跟馬蘭阿美
(族)，還有包括縱谷阿美（族），因為馬蘭那邊的祭典文
化跟我們那邊祭典文化完全不同，我有分析過。

(記者E，男，阿美族，訪談資料)

由傳統服飾、祭儀文化、音樂歌舞，及年齡階級顯現出的特徵異同，記者E總能侃侃而談，長年的採訪經驗為記者E建立一個「資料庫」，每次採訪便得以提供分析比對的依據。

所謂的馬蘭阿美（群），海岸阿美（群），如果以臺東來
說，應該界定馬蘭跟這個縱谷線到海岸線的成功（鎮）這個
應該是屬於恆春阿美群的，恆春阿美群是從哪裡可以看，從
他們的傳統服飾可以理解，再來就是他們祭儀文化的進行方

²¹ 1899年，日本民族學者伊能嘉矩將臺灣東部地區阿美族群之分布，依據地域、語言、風俗及習慣的差異，將阿美族由北至南分為南勢阿美群、秀姑巒阿美群、海岸阿美群、馬蘭阿美群及恆春阿美群等5個地域群。

²² 記者E來自臺東縣長濱鄉南竹湖部落，依據阿美族群五地域之劃分屬於海岸阿美群。



式，跟我們海岸阿美群，比較北邊的海岸阿美群比較不一樣，跟我們長濱（鄉）還有豐濱（鄉）那邊的不一樣，像恆春阿美群的話，他們一般會有表演性，各階級會有表演比賽，他們也會有一種所謂的大會舞，然後他們就是會由各階級去表演、表現他們這個階級的比如說歌舞這樣子，這是一種在馬蘭恆春阿美群這樣的文化，可是像我們長濱那邊海岸阿美群是怎麼樣餒，我們祭典的進行，撇開其他祭儀，光是（樂）舞的部分，我們是持續性地在唱，沒有中斷的，比如說四天的祭典，只要是開始進行儀式到結束是一直唱跳沒有在休息的，領唱者一直領唱然後大家都一直合唱著這樣子，沒有那個階級的表演，沒有在表演的…。

（記者 E，男，阿美族，訪談紀錄）

對記者 E 來說，不同地域的阿美族群有著不同的祭典儀式與樂舞形式，從言談中亦可見其不斷以「我們」做為觀察其他地域阿美群祭典文化細節的基礎，強調與其自身族群祭典文化的差異，經年累月下來，豐富的採訪經驗養成其對於阿美族祭典文化的敏感度，且得以反思族群內部因地域差異而有所不同的文化細節，「自身文化」就成為記者 E 認識他群阿美族的基礎。

回想起過去參加公共電視《原住民影像人才培訓計畫》第一次出機採訪花蓮縣瑞穗鄉奇美部落豐年祭的經驗，奇美部落與地域群的劃分上屬於秀姑巒阿美群，記者 E 因為年齡階級的命名方式的不同而感到文化衝擊。

會有一種衝擊啦！原來阿美族不是只有像我們部落（南竹湖部落）這樣的一個呈現方式，其實跟我們完全不一樣，包括年齡階級，我們海線的話算是族名制，就是每一個年齡階級它自己有一個階級的名字，可是那個（奇美部落）是級名制，他們有八大階級就固定，完全不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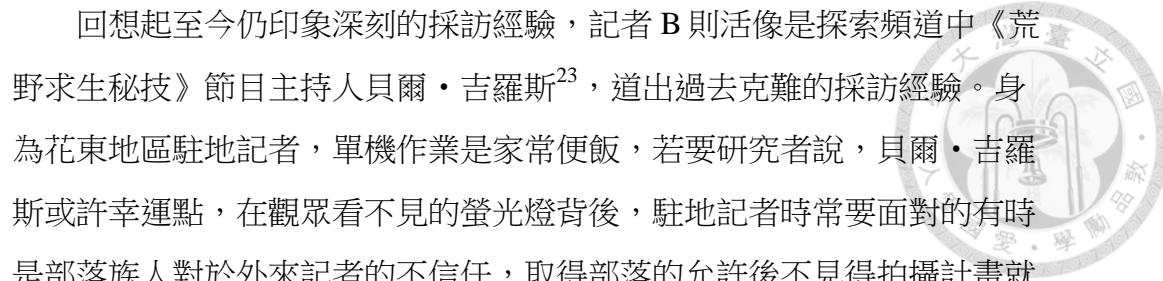
（記者 E，男，阿美族，訪談紀錄）

因為部落的不同，年齡階級命名方式也有所不同，音樂及舞蹈部分亦有些許差異，記者 E 說：「所以當我們（培訓學員）要去那邊的時候，就變成要就要非常的能夠分析說，我會用一種方式啦！用我部落的跟他的豐年祭對比。」（記者 E，男，阿美族，訪談紀錄），至今，「我們」與「他們」之分別仍為記者 E 在短時間認識他群阿美族的方式，記者 E 以「我群」去看待「他群」阿美族文化內容與細節，將將彼此間的差異鍵入資料庫，以供他日比對。

反觀記者 B 身於青年時期便加入部落年齡階級，參與年齡階級的運作，主導過部落豐年祭，並曾幫助過記錄片導演進行阿美族及其他族群文化祭典之田野調查工作，而至今從事駐地記者已 10 餘年，經手過的阿美族豐年祭報導無數，檢視其所做的報導，著眼於部落祭典觀光化、年齡階級於豐年祭中的角色等角度，其中當然不乏對於祭儀文化與族群歷史的報導，皆能看出記者 B 於部落祭典採訪上的豐富閱歷，其雖未言明如何建構出自身對於阿美族豐年祭典的背景知識，但從記者 B 侃侃而談過去經驗，便可知道其早已將阿美族文化知識內化於自身，並在採訪過程中，透過尊重當地文化、入境隨俗，且在取得採訪畫面之餘，跟隨當地族人於生活與報導中實踐文化。

像一般祭典就是，就跟他們用走的，像港口部落他們祭典前一天要到山上，去迎靈下來，半夜你就要跟著上去啊，而且怎麼辦，你要不要打燈？能不能打燈？會不會被罵？要不要拿火把？去那邊要爬山你要準備甚麼？雨鞋、刀子、然後鋸子，有時候你晚上不要睡覺陪他們、等他們，太魯閣族的感恩祭也是阿，凌晨兩點開始迎（靈）阿，一直到早上啊、一直到中午啊，你哪可以休息、睡覺，你沒有辦法休息睡覺，你要跟他們爬山、跟他們下來，那你要準備什麼？很多的電池、頭燈、你的器材、你的雨衣。

（記者 B，男，阿美族，訪談紀錄）



回想起至今仍印象深刻的採訪經驗，記者 B 則活像是探索頻道中《荒野求生秘技》節目主持人貝爾・吉羅斯²³，道出過去克難的採訪經驗。身為花東地區駐地記者，單機作業是家常便飯，若要研究者說，貝爾・吉羅斯或許幸運點，在觀眾看不見的螢光燈背後，駐地記者時常要面對的有時是部落族人對於外來記者的不信任，取得部落的允許後不見得拍攝計畫就能順利完成，夜間拍攝則使得採訪更加不易。記者 B 前進荒野採訪前，攝影器材與求生器具的準備一點也不能馬虎，單打獨鬥，只為完成一則豐年祭典新聞，「甚至有時候像大熱天這樣，怎麼辦？你要準備你的傘，你要保護什麼？保護機器，不是你的人，怕過熱，你人就要曬太陽啊，還有做活動的時候，你整個場停車位都沒有的時候，你就要提（攝影器材）到快一公里的地方，你就跑跑跑，而且有時候時間來不及的時候，你又跑跑跑進去，又跑跑跑回去趕新聞。」（記者 B，男，阿美族，訪談紀錄）。

多年下來，儘管走訪的阿美族部落無數，見識過的祭儀囊括不同阿美族地域群，記者 B 對進到部落前採訪阿美族豐年祭前的準備工作仍謹慎以待。

我大概會先去問，去看這個部落的狀況，上網查看這部落相關的資訊，這部落是怎樣的部落？大概多少人口？它的歌舞有哪些？曾經報導過什麼東西這樣。

（記者 B，男，阿美族，訪談紀錄）

顯見即使有著豐富的部落祭典採訪經驗，記者 B 赴部落採訪前仍會透過網路尋找與部落相關資料。此外，如同記者 E，記者 B 於採訪部落祭典前會試著尋找「部落窗口」詢問祭典相關資訊。

²³ 《荒野求生秘技》是 Discovery 頻道熱門節目，透過主持人 Edward Michael Grylls 經驗得知如何在險峻的環境與氣候下求生。網址：

<https://www.discoverychannel.com.tw/tvshows/manvswild/>，上網日期：2018 年 12 月 23 日。

對！會先問，所以平常會準備，就是會留電話，然後記得這個部落是誰，然後有時候會上網查某某村長或某某頭目，就上網查相關字，看能不能找到相關電話，就去問…。

(記者B，男，阿美族，訪談紀錄)



而因為各地豐年祭典有所差異，為求採訪過程順利、報導正確無虞，基於過去與消息來源互動的經驗，記者B慣於以熟識之人或部落耆老做為「部落窗口」，進一步詢問祭典儀式內容，初步建構對於祭典的背景知識。

那每年最大的祭典就是捕魚祭跟豐年祭，兩個最大的祭典，所以每個部落都會不一樣，那你要去的時候要先問，啊這次祭典的內容是怎樣？我都會先問，啊明天是怎麼樣？都會先問，會去找認識的人，甚至是會先找他們的頭目、耆老這樣，跟他聊一聊啊，因為原住民對原住民的記者會比較熱心，對，然後像那個時候比較沒有把握的話，就會說先找他，啊有沒有電話？我就去拜訪，很多事情都要先問，都要先做功課再去

(記者B，男，阿美族，訪談紀錄)

由訪談結果看來，因花東地區駐地記者屬阿美族群，擁有族群背景知識與部落經驗，且具備豐富採訪經驗，故採訪阿美族豐年祭報導時，面對各阿美族部落祭典儀式，對駐地記者來說並非難處，困難之處則在於掌握並配合各部落豐年祭舉辦時程，於是「部落窗口」就顯得重要；另外，就如同記者B所說，拔山涉水的單機拍攝亦是駐地記者所面臨的挑戰，在取得部落對外來記者的信任後，於祭典所在場合所需的裝備與勞力付出，皆為花東地區駐地記者在採訪過程中，增加採訪的困難度與挑戰性，但也彰顯出駐地記者因地制宜、剛柔並濟的採訪身段。

(二) 北區記者以自身族群祭典禁忌做為採訪準則

反觀其他非屬阿美族群的北區記者，普遍缺乏採訪部落阿美族豐年祭的經驗，多為都會地區豐年祭採訪經歷。記者 D 言道，能在原民臺擔任記者，對各族群祭典都會有基本的認識，姑且不論此話所因為何，其自身於過去參與阿美族豐年祭的經驗使建構對阿美族祭豐年祭的了解，「我覺得（阿美族豐年祭）祭典的樣子我大概都知道，就是說還沒有當記者我之前也有參加過（阿美族豐年祭）嘛。」（記者 D，男，布農族，訪談紀錄），並以此建構對阿美族豐年祭典的理解。

在參與豐年祭與採訪過程中得知祭典中有著不可觸犯的「禁忌」，便成為記者 D 採訪阿美族祭典時最主要的考量，加上祭典場域對外來者定位不明，對於「場域」的進入與退出，還有所處位置有所顧慮。

的確你會知道說它（祭典）有比較多明確的規範或禁忌，像假如說我今天是要去採訪阿美族好了，那我要了解我可不可以站在這個台上、台前，他（部落耆老）今天在講一些話，我能不能去到某個地方去拍攝，這就是我必須考慮的。

（記者 D，男，布農族，訪談紀錄）

具有布農族與拉阿魯哇族血統的記者 A 則因參與布農族「射耳祭」的切身經驗，了解族群祭典中因「性別」差異而衍生出的文化「禁忌」，因此當採訪他族祭典時，對於女性進入祭典「場域」的行為不免使其保持警戒：「我其實到不管任何一個祭典我都會習慣問說，我這個可以進去嗎？」（記者 A，女，布農族與拉阿魯哇族，訪談紀錄），深怕觸犯禁忌，同時，因「性別」而生的「禁忌」便成為採訪時避免觸犯的重要原則，「因為我自己從小就是在布農族明顯具有性別（禁忌）的（環境中成長），所以我知道不要去碰（禁忌）。」（記者 A，女，布農族與拉阿魯哇族，訪談紀錄）。

除了「性別」禁忌，具有魯凱族與卑南族血統的記者 C 則認為，祭典場域中存在著一條界線，那是神聖不可被侵犯的。

我以我自己部落來說好了，當我們魯凱族跳舞，如果你（外族人）真的要進來，他們會很清楚說：「請你不要」，我會覺得那個界線是他們覺得會被打擾的。

（記者 C，女，魯凱族與卑南族，訪談紀錄）



回想初次採訪都會區聯合豐年祭的經驗，記者 C 看見其他記者穿梭舞圈，身為魯凱族的她，因為祭典樂舞遭受打擾而感到緊張，同時因為意識到自己身為女性，促使她產生了自身在場的不確定性。

就算是去那個靜浦（旅北同鄉會）那個（都會聯合豐年祭），我自己也會很敏感，就是一個廣場、空地，大家開始跳起舞來，然後就開始有一些長者之類的，然後可能有一些（記者）他們就直接去（舞圈）中間拍，他們可能覺得都會區的豐年祭比較不會有那麼多的忌諱，可是我開始會躡手躡腳，就是那種扭扭捏捏。

（記者 C，女，魯凱族與卑南族，訪談紀錄）

初步看來，研究者認為，記者 C 基於自我的族群文化背景，並與阿美族祭典的「禁忌」產生衝突，而這樣的衝突是害怕觸犯祭典規範的表現，亦是記者期許自己不會觸犯祭典場域禁忌而有的反應。此外，在記者 C 的認知裡，神聖不可侵犯的場域不僅出現在自身族群祭典儀式中，而是在臺灣原住民族群祭典皆可見，她是這麼說的。

因為又會覺得說，應該不是說我自己的族群為什麼，我是會覺得原住民（族）都會有一個不可侵犯的領域啦！所以我覺得我就會好像躡手躡腳，然後我就會去問旁邊可以問的人這樣子，問說：「我現在可以怎麼做？」這樣子，或者是就是請教旁人就是這點蠻重要的，因為你有些真的不懂真的要還是要問。

（記者 C，女，魯凱族與卑南族，訪談紀錄）



雖然在訪談過程中，她無法明確指出之所以有此種想法是否是因為自身族群文化養成，但在研究者看來，記者以自身族群祭典禁忌、基於對阿美族祭典的認識，以及對祭典總是抱持著對各族群的普遍文化認識而衍生出進行採訪時所依循的原則，並且引導她小心翼翼地面對祭典，只為避免觸犯「禁忌」，詢問旁人便成為他為自己找到答案的方式。

此外，對記者 C 來說，阿美族各部落間祭典與禁忌存在著差異，記者應就「部落」所屬地區與文化脈絡了解其中阿美族群與祭典的意涵，而非以「阿美族」整體族群的想像與印象將各部落間的差異概括簡化，即使是都會聯合豐年祭，採訪前除了透過網路查詢與各豐年祭相關資訊外，亦將「尊重部落間差異」進而「遵守禁忌」做為採訪祭典的優先原則。

因為我會覺得我把部落放在前面，是因為大家都覺得阿美族都是一樣，但是其實各部落都有差異啦！所以你以那個部落為主的話，你比較不會觸犯到他們的禁忌這樣子。

（記者 C，女，魯凱族與卑南族，訪談紀錄）

反觀駐地記者觀察現代社會的演進，意識到文化鬆動的過程連帶「禁忌」的鬆綁，面對祭典「禁忌」，其進行採訪倒是處之泰然。經檢視 2014 至 2016 年間阿美族豐年祭相關報導，可見少數幾則報導提及「屬於女性的祭典」，以「性別」劃分男性、女性在祭典場域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婦女 Kakita' an 的牽領下，婦女階層隨著祭歌跳著祭舞，Taeman 膽曼部落的豐年祭儀依傳統一連舉行五天的迎靈、娛靈、宴靈及送靈祭，最後一天送靈祭特別為女性的祭儀。」

（原民臺，2016 年 7 月 21 日）

而男性在這一個屬於女性的祭典當中，則順應傳統，遵守禁忌，讓男性與女性的角色更加明確。

宜灣部落豐年祭典進行到最後一天，就由部落婦女年齡階級舉行 Mipihay（送靈祭），大家圍繞歌舞歡送祖靈回到天界，表示宴靈結束，男性嚴禁參加。」

（原民臺，2015 年 7 月 21 日）



對於身為阿美族的駐地記者來說，「送靈祭」對他們來說並不陌生，皆有志一同地自阿美族傳統母系社會說起，「我們是母系社會，但是我們部落的社會，制度來講是以男性為主，那女性的話，她是負責家，在這部落裡面的整個制度來講是男性在進行的。」（記者 E，男，阿美族，訪談紀錄），而女性的角色是繼承家族財產，男性的角色便是保護部落，負責「家庭」以外的一切事務，「所以在祭典的時候，都是男生開始做的，那甚麼時候會有女生呢？在送靈的時候，最後兩天或最後一天的時候女孩子才會進來。」（記者 B，男，阿美族，訪談紀錄），可見女性的角色在「送靈祭」以前皆是協助男性主導祭典的角色，在「海祭」結束時，赴會場以菸、酒、檳榔及飲料慰勞家中年輕男性（原民臺，2014 年 7 月 8 日）；在「宴靈祭」時，對男性年齡階級獻酒與檳榔，以示慰勞（原民臺，2014 年 7 月 24 日）。

記者 E 以自己的部落祭典訴說，每當女性主導進行送靈祭典時，男性則是自己進行所謂的 Pakelang 儀式，慶祝豐年祭一切事務與工作的完成，不去打擾女性送靈。

她們最後一天是女生自己做（送靈），那男性他們就是去做 Pakelang，那女生她們去做她們的（送靈），其實男生就不管她們，就很像迎靈的部分非常快樂這樣，然後她們自己就是說會希望每一個女性不要很避俗（台語：害羞彆扭），大家要非常的興奮快樂，然後讓祖靈快樂，祂才會高高興興的離開，所以女生最後一天的時候只有她們，我們男生是不管她們，我們男生的話就是做完 Pakelang，如果我們想要去看她們的話，我們頂多到外面看，是男生是絕對不會去…（打擾、參與）



不過，因為各部落風俗習慣差異，且受現代社會變遷影響，人口外流，男性與女性的界線漸趨模糊，有些部落可見男性一同參與送靈，但有些部落仍堅守傳統。

男生是坐在旁邊看，不過現在已經慢慢地破除這樣的一個限制了，只能說有的部落還是單獨（由女性主導）在進行，但有的部落就是說一開始是女性在送靈，但是過了一、兩個小時後，男生再共同參與，是怕說人口少，大家也覺得時間緊迫，因為這個現在的社會，我們年輕人放假，可能時間滿短的，他們會覺得很可惜，既然回來了大家就一起跳，所以有所改變嘛！

(記者E，男，阿美族，訪談紀錄)

甚至有的部落女性會「抱怨」（記者B用complain一詞）女性能夠跳舞的時間太少，希望能在「送靈祭」之外，也能有多一點時間參與樂舞，帶出過去傳統與現代間的磨合狀態，部落不得不面對來自女性的聲音並進行調適。

所以我們說像港口（部落）那樣，港口（部落）最後一天送靈就是女孩子啊，你不管到長光（部落）還是哪裡，很多最後一天都是女生啊，只是前面很多東西都是男生在做，都是男生來處理，最後送靈是由女生，部落有些女生還會complain啊，說「四天裡面只有最後一天是我們而已，那能不能提早一天下來跳舞？」，因為她們想跳嘛！那我們（部落）也開放阿，但是最重要的前面一兩天我們不能讓女孩子進來，那第三天妳們可以開始進來跳，後一天是妳們跳，因為到了最後一天，通常到了最後一天我們男生也沒有在領唱了，都是給女孩子領唱，就讓妳們唱唱唱到通霄都沒有關

係，因為最後一天了，已經送靈了，送完靈之後就是女孩子
的天下了，女孩子來跳了這樣。

（祭者 B，男，阿美族，訪談紀錄）



若細察原民臺於 2015 年 7 月 21 日與 2016 年 7 月 21 日與「送靈祭」相關報導，可見女性於祭典場域中由年齡長幼依序牽手圍圈，隨著祭歌的吟唱順時鐘前進，帶舞圈者通常為婦女階層中最年長者，舞圈中間則擺設長桌備有米酒，做為祭典所需祭品，有時年長的女性會坐於舞圈中央，從記者的掌鏡便能看出記者於整場祭典中的位置，皆在舞圈外，不時鏡頭還會帶到場外一隅，男性聚集觀看，皆呼應了訪談中所提及的送靈儀式面貌，亦能看出那條不容男性介入的範圍則以女性圍起的舞圈為界線，連男性記者也不例外，一來不打斷儀式進行，二來尊重祭典中女性的主導權與祭典禁忌。

在訪談過程中，記者 B 與記者 E 並未言及因身為男性而對採訪「送靈祭」造成困難或限制，反而能見他們了解祭典內涵，並擅於拿捏自己在祭典中的位置，也或許是祭典與時俱進，逐漸鬆綁男性與女性間禁忌的界線，也為他們開了一條能在祭典現場自由取材的道路，但更多的仍須依賴記者對於文化知識的掌握度與對祭典抱持尊敬的態度。

綜上，從受訪記者的各自論述中，可見阿美族記者採訪部落豐年祭時所遭遇的挑戰，因部落祭典時間難以掌握，記者慣於以熟識之人或部落耆老做為聯繫窗口，保持與部落間資訊流通，於採訪前取得祭典相關資訊，有利記者於進入部落採訪，另因豐年祭舉辦地點險峻，為記者增加採訪的困難度，於是採訪前必須做好萬全準備，不畏風雨，完成報導採訪；且在採訪豐年祭最後一天由女性主導的「送靈祭」時，於祭典場域中進退得宜，對於男性、女性的禁忌處之泰然，展現了對阿美族祭典文化的充分理解，掌握古往今來的祭典轉變脈絡，從自身部落出發，亦能見各部落間的差異，由研究者看來，這些禁忌並非因駐地記者皆身為阿美族有所差別待遇，而是記者將族群文化知識內化，進而轉化成採訪時的優勢。

而觀諸北區他族記者則因著自身族群祭典的參與建構出一套對「祭典」的理解價值，並做為認識阿美族祭典的知識背景。根據採訪經驗，研究者認為他族記者所道「禁忌」與「神聖性」或因著臺灣原住民族祭典文化的相似性，鑲嵌了記者自身族群祭典與阿美族祭典文化特質，在祭典場域中，他族記者因自身「性別」思考女性的在場是否觸犯禁忌？因祭典遭受干擾，擔憂「神聖性」遭破壞而備受緊張，他族記者自身的族群文化價值即在其進行採訪前做為依據，避免觸犯以「禁忌」、「神聖性」衍生成的採訪「原則」，因此所站「位置」對他族記者來說，則更顯得重要並須得謹慎處理。

三、記者與消息來源間的互動

(一) 駐地記者使用「族語」與部落族人建立關係

像有時候就是說其實你到一個陌生的部落，那可能大概感覺就是說被冷落，就怕會這樣，可能大概就是我們跟他（部落族人）的關係，因為我們也不熟悉啊！

（記者 E，男，阿美族，訪談紀錄）

當祭典發生，記者揹負著採訪的使命進到部落，「害怕被冷落」時常是記者 E 進到陌生部落時的心情寫照。從部落的角度來看，「記者」身為一個部落的「外來者」，同時又是時常被冠上干擾祭典儀式慣犯的「拍攝者」，這些預設立場不免為他欲進入部落採訪此一動機設下門檻，能否完成祭典的採訪與報導即取決於部落族人的意願。

走訪部落無數的記者 E 深知採訪部落新聞不易，尤其面對「祭典」如此神聖的儀式，為了與消息來源合力完成報導，多年下來的經驗告訴他必須看得長遠，「與部落建立關係」、「取得族人信任」是必經關卡，但並非一蹴可及，不過唯有如此才能與部落維持關係，而如何取得進入部落的門票？「族語」變成記者 E 的優勢與利器。

因為就是部落的東西、祭儀的東西，就變成說要打好關係，那最好就是說，能夠跟他們要有一定的認識，彼此的信任，所以通常像這個部分的話，我大概有一個心態啦！我今天來的時候，我會馬上先用族語（阿美族語）跟他們（部落族人）打招呼，我盡量用族語跟他對談，讓他就是把那道牆能夠就是去掉！去掉他就會認為說，原來是我們自己人，慢慢地再跟他聊，「你們有甚麼東西？」，然後再來就是說「當我在拍可不可以？」讓他慢慢地去突破，突破了以後，那就去了解他們到底還有什麼東西，然後那當然「在拍攝的時候有什麼樣的不可以侵犯到的？」就其實這一開始就是說，還是用族語這個部分來去拉近

（記者 E，男，阿美族，訪談紀錄）

記者 E 試圖用「阿美族語」展現自身文化背景，而其所蘊露出的背景知識對消息來源來說並不陌生，「語言即文化」，「阿美族語」為記者與消息來源間搭起橋樑、建立連結，使消息來源將記者視為「我群」，拉近彼此間距離，因此，當記者 E 進到部落時，先以「阿美族語打招呼」就變成為記者宣稱自身族群文化的工具，或做為鑑別消息來源是否具備族語能力的試金石，「如果發覺他不會的時候，再用國語跟他聊，就是要識破對方啦！就是要把那一道隔閡去掉這樣子，就趕快融入啊！就是說熟了之後，他恨不得你多拍了。」（記者 E，男，阿美族，訪談紀錄），研究者能理解其採訪策略，且呼應前一章報導分析結果，記者「族語」熟稔程度決定「記者」與「消息來源」間「權力距離」大小，族語能力得以象徵文化背景知識豐富程度，助於消彌兩者間距離；另經訪談分析發現，即使面對非具備族語能力的阿美族人，「族語」所帶出記者的族群歸屬有助於消除「我群」與「他群」間的藩籬，進一步建立關係，在彼此熟悉的狀態下，進入部落採訪的門檻亦順勢而降。

對啊！就會變成說，「你是我們的族人嘛！我們做的、我們講的，你聽得懂，可以理解，不管是不是會還是怎樣。」基本上都會取得信任啊。

(記者 E，男，阿美族，訪談紀錄)



記者 B 亦採取相同作法，以「族語」做為溝通媒介，如前所述，因區域分布不同，導致阿美族群在某些文化特徵上存在差異，即使皆為阿美族，各地域群所使用的阿美族語仍有些差距，因此「阿美族語」不僅做為建立關係、取得信任的關鍵，更是取得採訪資訊的同時，同時也是確認資訊的重要媒介。

訪問也是用族語問啊，像有些地方的語言不一樣，會有差異
嘛，我就會問那個什麼意思，就稍微問一下。

(記者 B，男，阿美族，訪談紀錄)

多年下來，回顧過去 2014 年至 2016 年間有關阿美族豐年祭的報導，輔以原民臺記者訪談，可見駐地記者在部落闖蕩的心路歷程，祭典新聞的完成須仰賴記者與部落消息來源間的和諧互動，而如何與部落消息來源間維持友善關係？便是一種智慧。

記者 B 回憶起有一次前往港口部落採訪「海祭」的新聞，而港口部落海祭並未開放記者進行拍攝，因記者 B 的採訪興趣，還有其長年採訪部落祭典的緣故，與部落建立起情誼，部落年齡階級的領袖因此同意了他的拍攝請求。

比如說有一次港口部落海祭，是不讓人拍的，不能拍怎麼辦？後來村長說可以去拍這樣，可是年輕人好像不能拍，要去問他們階級的頭，那因為我平常就有在跑新聞，「大家說你是○○，原民臺的記者！」我就去找他們的頭，他也知道，我說：「我是原民臺的○○，你們今年海祭可以拍嗎？」他說：「我想一想…好啊！」他就有點考慮了一下，後來他說好，我就去拍了！就盡量閃遠一點，就給他們好的這個印象。

(記者 B，男，阿美族，訪談紀錄)

顯然，記者於部落地人脈建立有助於採訪工作的完成，不過，雖與部落間面對部落的善意，記者仍不忘秉持尊重祭典的態度，以身作則，不讓部落認為記者的行為觸犯並干擾祭典地進行，儘管記者獲得部落族人授權、允許。

憶起另一個採訪豐年祭的經驗，記者 B 看著其他記者爭相跑進舞圈中間拍攝，但是他卻堅守崗位，寧可側拍，也不願為了拍到精彩的影像，效仿其他記者，而干擾了祭典的進行，即使頭目允許其進入拍攝，他仍顧及其他族人對他的觀感。

這是我的堅持，就算是頭目說好，我進去了，結果部落裡面的年輕人的說：「你看原民臺的也不尊重！」我回頭說：「頭目說好啊！」（我覺得）自己都不做榜樣的時候要怎麼說服別人？

（記者 B，男，阿美族，訪談紀錄）

尤其要面對許多年輕一輩阿美族人的文化意識崛起，強調部落主體性，記者 B 認為，原民臺記者不僅須善盡職責報導祭典儀式與文化意涵，但是採訪的過程亦是以身作則的榜樣。

族人在祭祖靈的時候，即使大家（媒體）都往中間拍，我也不會在那邊拍，我一定會在側邊拍，絕對側邊拍，這是你懂得你要尊重別人之前你要先尊重你自己，先尊重別人，人家才會尊重你，嘿啊！因為現在很多年輕人有想法，現在很多年輕人就是說他會懂得要文化的傳承，要尊重文化自主性，所以我們在做這個（報導）的時候要很小心。

（記者 B，男，阿美族，訪談紀錄）

對駐地記者來說，「族語」做為與部落互動時的最佳媒介，一來展現與部落族人於文化上的共通性，使「記者」與「消息來源」間產生親近性，消弭彼此間豎立的高牆，突破雙方「權力距離」，進而取得採訪的許可；二來有利於

部落傳統領袖在阿美族語言與文化脈絡中，訴說祭典儀式與部落歷史，取得豐富的資訊；而為延續「記者」與「消息來源」間關係，「尊重祭典場域」便是記者面對部落善意的回饋與採訪準則，不影響部落祭典進行，並彰顯原民臺記者不侵犯部落祭典神聖性的態度，以身作則。整體論之，記者的「族語」能力象徵其具備深厚的文化背景，懂得「尊重祭典場域」便展現其所抱持的族群文化價值與人際關係維持的考量，在基於對阿美族祭典文化的理解之上，駐地記者所採用的採訪策略確實有助其進入部落，謹守分寸亦使其與部落消息來於間保持一定程度的友好關係，讓族人認為記者即是「我群」之一。

（二）北區記者以「自身部落經驗」卸下族人心防

經訪談發現，北區記者皆未有赴花東地區採訪部落豐年祭之經驗，但都有過幾次採訪都會區豐年祭的經歷。

對記者 D 來說，因過去參加豐年祭的經驗，讓他有了對阿美族祭典的認識，當做為一名記者欲進行採訪時，不至於因文化衝擊而手足無措，「所以相較（未參與阿美族祭典）來說，我不會有覺得類似掙扎或者衝突，或者說不知道要做什麼事情的這種困擾。」（記者 D，男，布農族，訪談紀錄），更多的顧慮會是在於祭典進行中，記者所能夠活動的場域，「那我要了解我可不可以站在這個台上、台前，他（阿美族人）今天在講一些話，我能不能去到某個地方去拍攝，這就是我必須考慮的。」（記者 D，男，布農族，訪談紀錄），免於觸犯禁忌之餘，更強調所有考量皆為原民臺記者應具備的認知，並以此警惕自身，與消息來源間互動則以事前詢問，取得同意後進行採訪。

相較於記者 D 的理性曲徑，記者 A 回想起過去採訪都會地區阿美族豐年祭的經驗，面對部落耆老，她試著以自身的部落經驗與其達到共鳴，使受訪者更願意揭露。

當我看到那個老人家的時候，我就去跟他聊天，我就問說那
「你辦這個（祭典）你覺得怎樣？」他當然也是會回答你，



就是拿著麥克風，他當然說：「因為我們在臺北啊！然後我們很少回部落…」，可是我跟他分享我自己的部落經驗的時候，他就突然講說：「那你等一下結束的時候我帶你去一個地方。」，那就是他們（祭典）結束他們會去河邊撈魚，可是那不是任何媒體可以拍得到的，是他們整個祭典結束的時候會去 pakelang 的地方？他們就會去河邊撈魚，然後在那邊大家分工，就是按階級去，有的去要煮什麼什麼的…。

（記者 A，女，布農族與拉阿魯哇族，訪談紀錄）

別於搶快、講究即時新聞的採訪模式，記者 A 聽受訪者娓娓道來，並且採取感性曲徑，以自己的經驗取得對方信任，得到的是更多深層情感的饋贈，但也帶給記者 A 滿滿的無奈與傷感。

然後他說：「年輕人就喝醉了就走了啊！」但是老人家還是留在那個地方，隨便靠著一個河邊然後去撈，他其實有點是意思意思地去做那個撈魚的動作。

（記者 A，女，布農族與拉阿魯哇族，訪談紀錄）

經訪談可見，記者 A 並未因自身不屬於阿美族群而在採訪阿美族祭典報導時碰壁，但卻曾因自身「族群」別，而在採訪其他族群祭典時遭受排擠。記者 A 回顧當時她欲採訪鄒族戰祭 Mayasvi，戰祭舉行期間，女性不得接觸祭儀會所 Kuba（庫巴）²⁴，因此「性別」先是造成第一個採訪限制，因「性別」差異所衍生出來祭典「禁忌」，對她來說，便同於自身布農族群祭典禁忌般自然，要遵守並不難，但使她驚訝的是從未有過的，是消息來源以「族群」別訴諸歷史恩怨，使身上流有拉阿魯哇族與布農族血液的她深覺採訪限制已非「性別」差異禁忌般得以自我解釋，倒是因「族群」衍生出的歷史情仇，較難釋然。

²⁴ Kuba (音譯庫巴) 是鄒族舉辦戰祭之會所，做為鄒族政治、宗教及社會運作的核心，亦被稱作「男子會所」，只有部落內成年男子得以從正門進入，女人則從古至今不得觸摸、踏登，並視為禁忌。網址：<https://reurl.cc/y3EOq>，上網日期：2019 年 2 月 5 日。

…然後我記得我那時候去（採訪戰祭），然後他們問我是哪一族，因為他們覺得我有點像鄒族的，但我說我不是，我說我媽媽是拉阿魯哇族²⁵的，拉阿魯哇族以前是南鄒嘛，啊他們有一些人說：「你們是背叛的民族，就是你們自己獨立起來。」那就已經豎立了一個牆了嘛，對然後再聽到你是布農族，那布農族跟鄒族本來就是世仇…

（記者 A，女，布農族與拉阿魯哇族，訪談紀錄）

面對鄒族人對自身「族群」認同所下的評價，記者 A 只能無奈接受，權衡採訪手段，讓他族群男性記者進行拍攝，只是時至今日，她仍記得當時因身為拉阿魯哇族人而遭受的言語質疑。

綜觀之，除「族群」別帶來的文化衝擊，向來嚴守「性別」禁忌的記者 A，對過去採訪工作所帶來的限制，回溯文化背景知識養成，內化為採訪準則，採訪時不斷反問自己：「我這個可以進去嗎？」，也強調「因為我自己從小也就是在布農族很明顯那個性別（禁忌）的環境成長，所以我知道不要去碰。」（記者 A，女，布農族與拉阿魯哇族，訪談紀錄），轉而請攝影記者拍攝畫面，在不觸及禁忌的前提下，完成採訪工作。

四、以「文化價值」指標檢視原民臺記者的「採訪」實踐

本節著重於「花東地區駐地記者」與「北區記者」自身族群文化背景知識形塑歷程的回顧，進而在其對自身族群文化認識的基礎上，透過阿美族豐年祭「採訪」經驗與相關報導採訪實踐，探看其如何與消息來源互動？進一步了解原民臺記者的「文化價值」如何影響其進行阿美族豐年祭報導的「採訪」實踐？又反映出何種文化價值指標？

²⁵ 拉阿魯哇族過去被歸類於鄒族的一支，但其認為在語言、習俗上都與鄒族不同，因此發起正名運動及連署活動，政府最終於 2014 年 6 月 26 日承認其為臺灣原住民族的第 15 族。



首先，透過「記者的族群身分與文化背景」此層面分析發現，駐地記者 B 回想起過去當兵時期，不能回鄉參加豐年祭，仍想像著與族人們同在，唱著祭典的歌，紓解思鄉情怯，將思念訴諸族群認同與歸屬感，彰顯阿美族傳統文化對他影響至深，亦反映出族群集體的價值對他來說意義非凡。駐地記者 B 與記者 E 長年浸淫阿美族文化，憑藉多年族群祭典參與經驗，並且做為男性年齡階級資深角色，在組織中習得如何籌備、辦理部落豐年祭，雖然阿美族部落間存在文化差異，但透過訪談初步可見，各部落間文化的相似性、記者的文化底蘊，以及那份對於自己身為「阿美族人」的集體價值。

反觀北區記者皆非屬阿美族群，各自對自身祭典都有參與及認識，也帶出各自族群與阿美族群文化間的差異性。記者 A 以親身經歷道出所見布農族祭典的「性別」禁忌對女性的警告；記者 D 則對布農族群整體民族性的展現加以描述。透過布農族記者 A 與記者 D 對自身族群文化的認識，研究者亦清楚可見阿美族與布農族祭典儀式的明顯差異，但同樣受到現代化社會的影響有所變形，使他們在談及都會區阿美族聯合豐年祭與部落傳統豐年祭時，也能夠心領神會現代化對其他族群帶來的影響；反觀記者 C 則是藉由參與阿美族豐年祭的經驗帶出與自身祭典文化的差異性。

接者，藉由「記者的阿美族豐年祭採訪經驗」此層面分析可見，當駐地記者在進行阿美族祭典採訪工作前，其雖握有豐富的阿美族文化背景知識，但仍需透過「網上資料」與「部落窗口」了解各部落間差異。記者 B 與記者 E 藉由「部落窗口」掌握部落祭典最新資訊，避免採訪撲空，同時由熟識之人與部落耆老所扮演的「部落窗口」做為駐地記者對於該部落祭典文化知識再認識、再建構的重要途徑。

反觀北區記者雖皆有參與過阿美族豐年祭的經驗，不過在採訪阿美族豐年祭時，北區記者憑藉著自身族群祭典「禁忌」，及對於阿美族祭典的認識做為主要採訪準則。記者 A 根據其自身祭典參與所熟知的「性別」禁忌，做為採訪準則，進行阿美族祭典的採訪；記者 D 則認為各族群祭典場域皆有其不可觸犯的禁忌，因此小心翼翼，害怕站錯位置而有所顧慮；記者 C 則反思自身族群祭

典中舞圈行進中那「不可侵犯的界線」，做為採訪時不可跨越的神聖界線，並且認為部落間差異應當被予尊重，因此採訪前不忘針對差異進行採訪前了解。

於此初步顯出「族群」與「性別」差異，為「記者」與「消息來源」間劃分出權力距離，使北區記者在進行採訪前有諸多顧慮；反觀駐地記者在面對「性別」禁忌這部分倒是泰然，經報導檢視與訪談分析，駐地記者對於祭典禁忌瞭若指掌，在屬於母系社會的運作機制中順應現今祭典對「性別」禁忌規範的鬆綁，靈活穿梭於祭典場域，透過鏡頭視角，研究者亦能見記者巧妙進場與退場拿捏得當，以消弭權力距離。

最後，根據「記者與消息來源間的互動」此層面分析得出，欲順利完成採訪工作，駐地記者先以「族語」搏感情，強調身為阿美族人的「集體感」與「歸屬感」，順利取得部落認同。且前經報導分析發現，駐地記者面對做為形塑祭典樣貌與解釋部落遷移歷史的部落傳統領袖，多使用阿美族語進行採訪，可見駐地記者具備流利的族語能力，亦象徵駐地記者具備豐富阿美族文化背景知識。因此，研究者認為，「族語」得以消除「記者」與「消息來源」間因尚未熟識而產生的權力距離，更進一步看來，因為「說族語」所帶出屬同一族群的集體價值亦是駐地記者得以順利完成採訪的關鍵。

反觀北區記者皆只有採訪都會區聯合豐年祭的報導經驗，記者 D 自認了解阿美族祭典與場域禁忌，在採訪過程中與消息來源的互動未曾緊張；記者 A 則向來將自身族群文化禁忌的作為採訪他族祭典之提醒，但有別於講究即時的採訪模式，記者 A 以「自身經驗」做為藥引子，進而與消息來源對談，卻意外獲得消息來源訴諸情感且深具感性的儀式回饋，帶出現代社會祭典樣貌以及背後深層無奈；但從其採訪阿美族以外之祭典經驗來看，記者 A 藉自我族群身分認同的揭露反倒掀開歷史情仇，面對「族群」差異所產生的權力距離，則如同面對「性別」差異所帶來的採訪限制，記者 A 則權衡採訪手段，由男性攝影記者完成採訪工作，消彌權力距離所帶來的緊張關係，但也進一步看出記者為完成採訪，選擇尊重部落傳統與祭典禁忌。



經本節訪談分析，大致可勾勒出原民臺駐地記者與北區記者對於自身族群文化理解的版圖，研究者並立基於原民臺記者的族群文化背景，進一步探看「文化價值」對其「採訪」實踐的影響。分析初步彰顯出「集體主義」、「權力距離」、「高度規避不確定性」及「長期導向」文化價值，「陽剛／陰柔」文化價值則未能於本節分析中被彰顯。

駐地記者由自身族群認同凸顯阿美族集體文化，就其對阿美族年齡階級的參與，彰顯集體價值，並以「族語」強調自身與消息來源間的共同歸屬感；北區記者則由自身族群祭典參與經驗出發，訴說族群文化面貌與禁忌，且將歸屬於自身集體價值實踐於他族祭典的採訪實踐，彰顯原民臺記者「集體主義」文化價值。

另外，從原民臺記者採訪策略，及其與消息來源的互動看來，可歸納出「性別」、「族群」的差異，及「族語」能力有無為「記者」與「消息來源」間劃分出權力距離，使彼此處在權力不對等的關係中，持續導引記者的新聞實踐，前揭致使雙方權力發展出不對等狀態的因素則彰顯出「記者」與「消息來源」間「權力距離」文化價值。

駐地記者在阿美族母系社會的性別分工與祭典禁忌中，憑藉其對於文化的理解，順應禁忌的鬆綁，於祭典場域中自由進對，並以「族語」做為「採訪」阿美族消息來源的優勢，消弭與消息來源間的權力距離；北區記者面對「性別」禁忌與「族群」紛爭則權衡採訪手段，消除與消息來源間緊張關係，進一步解釋記者於「採訪」過程中遇到限制時所採取的手段，記者選擇尊重部落傳統與祭典禁忌，不採取有違部落意志與文化慣習的手段完成採訪，彰顯出記者「高度規避不確定性」文化價值。

而在面對部落傳統與祭典禁忌等不確定性，記者仍選擇服從部落價值、順應文化傳統、兼顧其與消息來源間關係，象徵記者對傳統文化與長遠影響的重視，高過於對即時成功與短期利益的追求，於此，某種層面上，記者「高度規避不確定性」文化價值也反映了記者的「長期導向」文化價值。

第二節 原民臺記者如何「報導」阿美族豐年祭



前經報導內容分析結果發現，阿美族豐年祭典報導大致反映了「原住民發聲」、「彰顯原住民族文化特質」、「正向報導」、「原住民議題」與「跨文化對話」等原住民族報導觀點（張錦華，2012），且進一步檢視報導內容亦可發現，阿美族豐年祭報導反映 Hofstede (2001) 所提 5 項文化價值指標，分別為「集體主義」、「權力距離」、「陽剛」、「高度規避不確定性」，及「長期導向」等文化價值。

本節基於前一章阿美族豐年祭報導內容分析，及前一節原民臺記者於「採訪面」訪談分析結果，針對「原民臺記者如何『報導』阿美族豐年祭？」進行分析，探看原民臺記者所秉持的「文化價值」如何影響報導呈現？並以「文化價值指標」檢視記者「文化價值」於阿美族豐年祭「報導面」實踐的軌跡。

首先，透過「原民臺記者報導阿美族豐年祭新聞」此一分析層面，討論都會區豐年祭與部落豐年祭相關報導呈現面向的差異，並論報導深度與記者文化內涵；接著，藉由「當原民臺記者遇上爭議報導」此一分析層面，探看原民臺「記者」與「部落」因報導產生不確定性時，其如何抉擇？而「原民臺」象徵「新聞室」又如何影響其報導？是否真為報導內容分析所呈現，本於原民臺設立宗旨，基於尊重部落文化傳統，「原民臺」傾向與「部落」站在同一陣線，原民臺「記者」則順服於「新聞室」抉擇，與「原民臺」站在同一立場，為部落發聲，提供反論述，同時亦反思原民臺做為族群電視臺，是否具備了「看門狗」此一媒體功能；最後，憑藉「祭典報導中的女性角色」此一分析層面，釐清原民臺記者強調祭典中男性形象、鮮於報導女性角色與故事的原因，以回應阿美族豐年祭報導所呈現女性遭逸失的現象。

一、原民臺記者報導阿美族豐年祭新聞

經檢視報導，由「報導區域分布特性」分析結果發現，阿美族祭典新聞報導可大致分為「部落豐年祭」與「都會區豐年祭」，「部落豐年祭」多於花東地區辦理，「都會區豐年祭」則因阿美族人口多遷居北部都會區，而多舉辦於北部地區，且多以聯合豐年祭型式呈現，容納各都會地區、各族群的參與，少有都會區因阿美族人聚集於社區所辦的小型都會區豐年祭。

(一) 都會區豐年祭相關報導

諸多報導帶出，早期部落阿美族人為尋求工作機會而遷居北部都會區，導致部落人口嚴重外流，鑑於部落祭典儀式有其特殊歷史脈絡與空間背景，且阿美族有其年齡階級制度，現代化社會的影響破壞年齡階級制度的運作，部落祭典儀式首當其衝，為因應參與人數減少，多數部落傳統祭典儀式簡化，時空遞嬗，不禁使部落族人心生感嘆；而觀察都會區族人旅居異地，如何在工作及祭典間做出抉擇？至今，因豐年祭辦理時程長達數天，族人為參加祭典而選擇辭職的故事不勝枚舉，而許多都會區聯合豐年祭亦相繼於每年暑期間展開，旅北族人得以透過以都會區豐年祭的一解相思，但政治化與觀光化目的伴隨祭典的舉辦而越發興盛。

經研究者分析整體「報導著重面向」發現，「著重傳統儀式呈現」此報導主題多出現於花東地區豐年祭報導，「強調跨文化的互動」主題則多出現於都會區豐年祭，而研究者認為這也是兩報導間最主要的差異。

藉由原民臺駐地記者的報導即可看出，部分花東地區部落豐年祭仍保有其所認為具備傳統特色的祭典儀式，記者不分晝夜進行採訪報導，帶出部落祭典儀式畫面，透過採訪部落傳統領袖，補充祭典儀式歷史緣由，呈現大量文化細節，並藉由採訪其他消息來源，試圖呈現祭典周邊概況，雖然部落豐年祭傳統儀式的呈現時常做為報導的引信，祭典儀式背後往往所要凸顯的重點為「部落現今處境」與「文化傳承精神」，相較北部都會區豐年祭相關報導，所能見文化細節與底蘊較為豐厚。

旅居北部都會區的阿美族人雖遠離母土，部落祭典儀式翻山越嶺來到都會區，置換時空，少數幾則報導帶出簡化的儀式行為，在部落傳統領袖與祭司的主導之下完成，報導則是草草帶過。如今，常見的是都會區聯合豐年祭相關報導，參與者透過樂舞展演，競相展現身手，但透過服飾與樂舞可看出祭典仍以阿美族文化為基調，其他族人亦參與其中，都會區聯合豐年祭儼然成為跨族群進行互動與交流的場合，且經檢視報導亦可見報導消息來源的現身說法，不可否認，都會區聯合豐年祭成為年輕一代旅北阿美族人接觸並學習文化的場域，並可能做為尋找自我認同的起點，促使年輕族人回部落傳承文化的第一關，長久下來，都會區聯合豐年祭在多年的實踐過程中，嶄新的文化意義也被確認。

記者 A 從過去報導都會聯合豐年祭的經驗發現，受訪的都會區原住民族人未必了解自身文化，但透過都會聯合豐年祭，大家有接觸文化的機會，同時也得以聯絡情感，祭典場域裡強調的是大家聚在一起的情感意義，正如報導分析所呈現，都會區聯合豐年祭在北區記者 A 看來，宛如一大型的「嘉年華會」，所謂「豐年祭」不僅可供旅北阿美族人參與，他族群亦參與其中，豐富了祭典多元性。

看到的就是它的那個多元啦，就都會區它很難單一就是阿美族的祭典，因為它一定會穿插其他的族（群）來參加你的嘉年華會那種感覺。

（記者 A，女，布農族與拉阿魯哇族，訪談紀錄）

聯合豐年祭看似歡樂，實際上卻也成為地方政府透過經費挹注，進而操作成兼具觀光與聯誼性質的活動，在暑假期間緊鑼密鼓上場，經由訪談發現，鑑於聯合豐年祭辦理場次眾多，且舉辦目的同質性高，原民臺記者如何報導聯合豐年祭往往取決於「主辦單位」，亦就是新聞稿的「發稿單位」，依據主辦單位辦理聯合豐年祭的目的決定報導所採取的觀點，基於部落現今處境衍生出著重觀光面向的報導，或凸顯文化傳承的意義。



我覺得首先是看主辦單位是誰來決定新聞走向，如果今天是花蓮縣政府辦的，是走觀光路線，你可能報導的就是周邊有什麼，然後帶來什麼，吸引了多少人這樣，但如果它只是一個社區發展協會，或是一個部落自己來辦理的話，它的報導的走向可能就是「你們為什麼要辦這件事情？」、「你們的目的希望是什麼？」、「今年有什麼比較不一樣的東西出現？」，可能就會盡量挖他可能是文化傳承或者什麼，就是我們會以主辦單位是誰來決定那個新聞的走向是什麼。

（記者A，女，布農族與拉阿魯哇族，訪談紀錄）

駐地記者E同樣提到「主辦單位」與其辦理豐年祭的「目的」，而在他過去的報導經驗中，與記者A較為不同的地方在於，記者E在報導中納入「主辦單位」與其「目的」，儘管主辦單位的重點在於「觀光化」本身，記者E則認為，都會區聯合豐年祭報導中不能缺少的應當是「族人」本身，以及豐年祭現場的文化元素，包含音樂、舞蹈，在諸多外在條件下，報導應彰顯的便是族人的主體性與文化內涵。

這個部分就是，順著主辦單位的心態做，那我們（記者）的想法就是分享這個活動，那活動裡面大概一個想法就是說，有我們部落的族人們參加，這個美的地方在哪裡？就是這個歌，族群文化在裡面！

（記者E，男，阿美族，訪談紀錄）

而記者B則偏好聯合豐年祭周邊軟性題材，喜愛將鏡頭邁向某一攤販，透過身為原住民族攤販老闆的故事或極具原住民族文化特色的商品，將聯合豐年祭做為報導配角，主要凸顯出原住民族文化，並讓報導充滿了人情味。

對原民臺記者來說，都會聯合豐年祭報導方式歸於千篇一律，所能呈現的不外乎流於活動介紹、凸顯參加人員等必要元素，能夠有所不同的報導角度則取決於記者欲強調祭典中音樂、舞蹈，及鮮少出現祭儀的文化內涵，或是欲宣

傳部落文創產品等報導角度，但也因聯合豐年祭缺乏傳統祭典儀式，使聯合豐年祭總是少了那麼一點「原」味。



而就在面對缺少傳統祭典儀式，或為順境空間環境經簡化而失去「原」味的儀式表現，身為布農族的記者 A 則便提到，在報導都會區聯合豐年祭時，有時會特別加入族人面對文化流失的「辛酸」，強調現實處境，也因著自身對於文化的看見，儘管不是身為阿美族的一員，亦清楚了解現代化社會對原住民族的影響不分你我，整體文化皆面臨解體的困境，因此記者 A 採取一報導手法，即是訴諸感性，將離鄉的無奈藉「年長者」之口說出，企圖讓社會大眾意識到文化流失的窘境，找回「原」味，研究者則認為原民臺記者欲強調文化傳承與文化復振的急迫性。

…所以通常會把那個辛酸放進來，會找比較老一點的人，那他們通常都是說離開部落多久了，然後有多久沒有回部落參加我們的豐年祭，所以我們只能在這邊濃縮什麼什麼的（祭典儀式）。我覺得都會區聯合豐年祭會呈現的就是我的文化正在面臨一個解體的一個現狀，就是可能還會呈現的是一個這樣的狀況，比較像是搶救（文化）…。

（記者 A，女，布農族與拉阿魯哇族，訪談紀錄）

（二）部落豐年祭相關報導

前經報導消息來源分析發現，花東地區部落豐年祭相關報導中，以阿美族傳統領袖做為解釋祭儀、還原部落歷史最主要的消息來源，且透過駐地記者的鏡頭可以看到祭典儀式的過程，搭配部落傳統領袖、祭司與記者旁白，原民臺將每年暑假期間相繼舉辦的部落豐年祭呈現於電視機前。整體來看，相較於都會區豐年祭相關報導而言，部落豐年祭報導可見大量阿美族豐年祭典儀式的呈現，駐地記者透過採訪、報導針對祭典儀式與意義進行解釋，並與部落現今狀況等面向進行串接，報導所呈現祭典細節及所賦予儀式解釋較都會區豐年祭報導來得豐富且深厚。



談到如何呈現部落豐年祭，駐地記者 B 偏好使用多點現場畫面，回想過去採訪花蓮縣瑞穗鄉奇美部落豐年祭「抓級長」儀式時，駐地記者 B 於報導一開始就使用該儀式中情緒與氣氛最為高漲的現場畫面，以族人相互拉扯、推擠的畫面為新聞揭開序幕，並接續就儀式本身進行旁白描述，且對於用字遣詞保有謹慎。

大部分像這個祭典盡量會用多一點的現場（畫面），一開始就現場（畫面），就像我們在做那個「抓級長」一樣…然後就那些現場拉扯的那個狀況這樣，一到現場拉扯不，現場似乎看起來很像打了一場架，事實上不是，他是一個什麼什麼什麼這樣，也不能講說奇美（部落）獨一無二，我們盡量不要講說只有他們有，不能這樣講，除非他們自己講。

（記者 B，男，阿美族，訪談紀錄）

且經研究者檢視所有部落豐年祭報導發現，駐地記者皆針對祭典儀式帶出背後文化意涵，因此觀眾得以隨著報導認識祭典儀式，亦跟著報導的呈現理解背後的文化內涵。

通常我比較喜歡拍攝祭典的時候，我會抓他們當地的文化最具有內涵的部分，有時候這個部分是最難拍，也是最花時間的…。

（記者 E，男，阿美族，訪談紀錄）

駐地記者 E 談到自己報導部落豐年祭的經驗，就研究者理解，其通常會先判斷並呈現該部落最具特色的儀式，並強調其「文化意涵」。另外，記者 E 亦坦言，因為阿美族各部落間音樂、舞蹈呈現的差異性小，加上，希望本於消除外界對於原住民所持每逢祭典只有「唱歌」、「跳舞」的刻板印象，因此，對駐地記者 E 本身來說，樂舞部分是其較少著墨之處，除非歌舞於各部落間相較甚具獨特性與差異性。

所以我比較會拍他們的祭儀流程、譬如說上山下海這個部分，然後（祭儀）信念這個部分，或者說有一些敬老尊賢（儀節）怎麼做？這個部分，然後在這些流程之外再帶入歌舞…

（記者 E，男，阿美族，訪談紀錄）



駐地記者 E 報導部落豐年祭的經驗，著重於祭典儀式，亦強調為消除大眾對阿美族豐年祭的刻板印象，更應彰顯祭典儀式與其背後的「文化意涵」，認為祭典儀式與樂舞的呈現有其優先順序，報導則應伴隨文化內涵，帶出阿美族文化的深度。反觀駐地記者 B 則與駐地記者 E 持有不同觀點，同樣是著重「文化意涵」的呈現，但因逐年採訪的賡續性，其偏好於每年於祭典中會抓不同的角度進行報導，像是歌謠、舞蹈、服裝、人及儀式等祭典元素，並進一步帶出背後的「文化意涵」。

每個角度的歌謠、舞蹈、服裝、人，你就可以重複三、四次一直拍，如果祭典很多，比如說遇到殺牛，甚麼要殺牛？以前牛是工作用的？那以前是殺什麼？也是殺牛嗎？殺一頭牛可以夠大家吃？那誰煮？哪個階級煮？那怎麼分肉？為什麼要串起來？為什麼要這樣？就可以講那個殺牛的部分，隔年再來拍祭典的部分，那歌舞的部分也有，服裝的部分也有。

（記者 B，男，阿美族，訪談紀錄）

在祭典中，「部落傳統領袖」多握有對於祭典文化的詮釋權，且經報導分析，「部落傳統領袖」多以「阿美族語」解釋祭典儀式意涵及說明部落歷史由來。透過訪談可發現，駐地記者於「採訪」實踐過程中，透過「阿美族語」展現自身族群文化背景及其所具備的文化知識，亦是宣告其與消息來源同屬一族群，打破與部落消息來源間的藩籬，取得族人信任，以進行採訪；且「阿美族語」亦做為一最佳溝通媒介，利於駐地記者與「部落傳統領袖」互動，取得採訪資訊並確認資訊內容，其中包含祭典儀式「歷史脈絡」與「文化意涵」，此時所謂「族語」便成為取得長者智慧的工具。



…所以有時候像這個部分（詢問祭典儀式歷史脈絡與文化意涵），族語就很重要啊！因為你歷史脈絡要問到老人家啊？

你不會族語你怎麼問得到？所以就常常這樣啊！然後我們都到那邊去，有哪位老人家知道？除了年輕人的介紹之外，他們在呈現之外，那歷史脈絡的部分應該就是找老人家嘛！智者，如果找到這個智者的話，哇！滔滔不絕…

（記者 E，男，阿美族，訪談紀錄）

由駐地記者經驗可發現，「阿美族語」有助於進行「採訪」進行，對駐地記者而言也是好的，總能為其「報導」呈現更深入的文化內涵。反觀現今年輕記者已不會自己的族語，用漢語進行「採訪」，取得的資訊亦有限，「那個味道不一樣！」記者 E 這麼說，但他沒有說出來的是：「沒有了『原』味！」。

你要用國語去問傳統的東西，你怎麼問得到？我們光是用國語去講述，那個味道就不一樣了啊！

（記者 E，男，阿美族，訪談紀錄）

駐地記者 E 從自身經驗道出語重心長地表示，「族語」是他的優勢，一來，可幫助其消除與部落消息來源間權力距離，進而與部落建立關係；二來，可與部落傳統領袖對話，取得更多深入的資訊，且對駐地記者 E 來說，所謂「傳統」難以用「國語」探詢。

因此，當研究者問到：「做祭典新聞應該要具備什麼樣的條件？」時，駐地記者 E 直言；「其實我覺得還是要族語啦！族語突破啦！」（記者 E，男，阿美族，訪談紀錄），一語道盡現代化社會對原住民族群文化的影響，當族人一窩蜂往都市移動與遷徙，阿美族文化結構日漸鬆動、文化逐漸流失，年輕世代族人生長在都市裡，不再說自己的族語，北區年輕記者本身缺少駐地記者言談中所隱涉的「原味」，因此，也就難以要求北區記者在報導中能夠呈現阿美族群深度的文化內涵，亦道出報導所具備的文化深度則取決於記者「族語」能力的有無。

(三) 綜論「部落豐年祭」與「都會區豐年祭」報導



研究者於本研究報導內容分析中，以「著重部落現今處境」、「著重傳統儀式呈現」、「著重文化傳承精神」、「著重文化政策議題」、「強調部落族人自主」、「強調跨文化的互動」及「著重政治宣傳面向」等七項主題，就所有豐年祭報導進行歸類、統計及描述性分析，結果發現，前三項為阿美族豐年祭典報導中最常被呈現的主題。

研究者進一步以花東地區「部落豐年祭」與北部地區「都會區豐年祭」兩相關報導探看其所呼應的報導主題，發現「著重傳統儀式呈現」與「強調跨文化的互動」主題為兩類報導最主要的差異。「部落豐年祭」時常著重於傳統儀式的呈現；「都會區豐年祭」則強調跨族群、跨文化的互動。另因報導基於祭典文化衍生，所涵蓋的主題無法切割成獨立一塊，因此「部落豐年祭」與「都會區豐年祭」皆具備「著重部落現今處境」、「著重文化傳承精神」與「著重文化政策議題」報導主題之外，「部落豐年祭」報導凸顯「著重傳統儀式呈現」與「強調部落族人自主」等報導主題，「都會區豐年祭」則另彰顯「強調跨文化互動」與「著重政治宣傳面向」等主題面向。

整體而言，「部落豐年祭」報導中所呈現祭典儀式較「都會區豐年祭」豐富，歸因於「都會區豐年祭」鮮少如同部落中富有傳統特色的祭典儀式，多為強調樂舞展演以及主辦單位所要求凸顯的核心，報導亦顯示出北區記者所關注的重點確實少有祭典儀式本身，儘管儀式遭簡化，但記者所能著力之處尚有祭典儀式的歷史脈絡與文化意涵，但根據駐地記者所言能知其多年來的觀察，年輕一輩的原民臺記者普遍缺乏「族語能力」，導致心有餘而力不足，難以針對祭典儀式帶出文化意涵，彰顯祭典報導的深度。

本研究訪談數位北區記者，研究者認為，北區記者因非屬阿美族人，所具備阿美族文化知識有限，文化敏感度不足，在豐年祭現場無法以「阿美族語」進行採訪，並針對祭儀妥善解釋，產出報導，另因「族群」、「性別」差異與「族語」能力為其與「消息來源」間劃分出權力距離，對於報導來說亦是一限

制，「族語」能力的有無即可在報導中見真章；而相對於駐地記者報導部落豐年祭，「族語」能力象徵文化背景與知識的養成，且因多年的族群文化浸淫，駐地記者甚為熟知阿美族豐年祭相關意涵與禁忌，雖然偶爾還會遭遇進入部落的困難，但就其報導來看，祭典儀式與文化意涵兼具，同時帶出部落正面臨的現況，強調文化傳承的重要性。

由「部落豐年祭」相關報導即可看出，多呈現傳統祭典面相，且駐地記者多仰賴「部落傳統領袖」，基於部落傳統文化，以彰顯報導的「文化深度」，駐地記者亦認為所謂的「文化深度」則是來自於部落長者的歷史傳述與智慧展現，在報導呈現上，藉由部落耆老與傳統領袖的現身說法，希望帶給觀眾「原味！」。

記者E：而且在你的影像畫面，如果今天是老人家來敘述的時候，是不是覺得說很有東西

研究者：對。

記者E：因為你請一個年輕人、中年人（回應祭典儀式相關問題），其實觀眾看了，嘖！到底適不適合的話，還質疑。

研究者：對啊！

記者E：所以通常我們都會找，如果說找不到部落老人家，最起碼找部落的領導人，頭目來解說（祭典儀式）。

（記者E，男，阿美族，訪談紀錄）

因此於本階段的討論可由「部落豐年祭」與「都會區豐年祭」報導的差異，進一步推敲「駐地記者」與「北區記者」因所職掌的報導區域與標的所衍生出「報導方式」，其中因「族群」差異，對文化的敏感度有別；因「族語」能力差異，採訪及報導呈現的文化深度有別。而研究者認為，如何消除因文化差異而產生的「權力距離」，順利完成採訪，呈現報導深度，便是原民臺記者

各展身手的舞台，而大致可見相應的「文化知識」與「族語」能力就是解答，「族語」能力便象徵著駐地記者背後深厚的文化底蘊。



二、當原民臺記者遇上爭議報導

本研究經報導內容分析發現，報導大致彰顯出張錦華（2012）所提「原住民發聲」、「彰顯原住民文化特質」、「正向報導」、「原住民議題」，以及「跨文化對話」等原住民新聞報導觀點。進一步對照 Hanusch (2014a) 及後續洪貞玲（2014）整合前述兩位學者研究，歸納出「培力」、「提供反論述」、「語言復振」、「基於文化做適切性的報導」、「看門狗」、「彰顯原住民主體及在地發聲」，及「平衡報導及多面向再現」等原住民新聞學報導原則，研究者認為，原民臺阿美族豐年祭報導並未彰顯出「看門狗」報導原則，進一步反思原民臺做為一族群媒體，並面對「爭議報導」時，未徹底實踐「看門狗」的功能。

Hanusch (2014a) 在探究紐西蘭毛利原住民新聞學時論及，紐西蘭毛利記者如何在「看門狗」此一源自西方對新聞學原則的期待，及記者本身的「族群」與「文化認同」間取得平衡，同時也預示了毛利記者為滿足媒體所應具備「看門狗」所面臨的挑戰與拉扯。

透過 Hanusch (2014a) 研究所進行的訪談可以發現，當紐西蘭原住民媒體欲報導攸關部落利益衝突的事件時，組織與單位內與事發部落親近的毛利新聞記者通常優先被選為報導該事件的記者，只因為其具備部落內部知識，並擁有當地的聯繫管道，但也有可能因記者與該部落文化太過接近，並發現自己「不願意報導」而被取消任務，另一方面也是來自毛利政府官員的施壓所致，認為身為毛利記者應當報導「好的故事」。

對於一名毛利記者來說，原民媒體的「看門狗」功能對於毛利族整體社會脈絡非常重要，原住民媒體得以檢視由「部落」或「政黨領袖」為部落整體所

做的「決策」，意味著除了監督政府之外，原民媒體亦當為了毛利族人群體利益，監督毛利社會內部決策，且在紐西蘭沒有任何一個政府組織、毛利組織，及領導階層可以凌駕於相關「審查」機制之上，儘管他們所做都為毛利族人（Hanusch, 2014）。



要落實「看門狗」的功能，面對可能損及族群整體利益的事件，記者必須要勇於提出足以「正中下懷」的問題，揭發弊端，不過當實際面對某些案例時，有些記者反被要求暫時將「看門狗」的角色擱置一旁，引起矛盾。一名毛利記者分享了一則兒童霸凌的新聞，記者訪問的方式遭批評流於主流媒體一貫的報導風格，以堅硬的問題（研究中受訪者用 *hard question* 一詞）進行採訪；另一毛利記者則沮喪地表示，當記者被要求藉由堅硬的問題，公正不阿地實現媒體「看門狗」的功能時，同時又因記者的毛利族身分而要求他們不該問 *hard question*，其中原則確實難以拿捏。

由上述可見紐西蘭毛利記者的文化背景知識與當地人脈可做為新聞報導優勢，但欲報導爭議議題時，過程便開始多方角力，多方的力量可能就來自「政府」、「部落」（或整個部族）、「新聞室」，以及自身族群文化認同，亦即「文化價值」，且毛利記者也在這樣的新聞實踐過程中自相矛盾、產生拉扯。

因此，基於本研究報導內容分析結果發現，原民臺阿美族豐年祭報導無法彰顯出「看門狗」原住民新聞學報導原則，研究者據以爭議報導與記者訪談進行對話，選取「2014年—『祭典觀光化』相關報導」，並納入前一年因政治人物進入阿美族部落，因而中斷祭典進行的著名案例「2013年—《祭典交互蹲跳事件》報導」，探看原民臺記者在面對爭議事件時，如何「報導」之？「文化價值」又在原民臺是否扮演「看門狗」角色、原民臺記者是否實踐「看門狗」新聞學原則的抉擇中，為「記者」與「部落」及「新聞室」間帶來何種影響？

（一）2014年—「祭典觀光化」相關報導

經檢視 2014 年至 2016 年豐年祭相關報導，原民臺於 2014 年多著眼於「祭典觀光化」報導，源於交通部觀光局將 2014 年定為「原住民部落觀光元年」，使「部落觀光化」、「祭典觀光化」伴隨著部落祭典的舉辦而再次受熱議，且是由政府主導，並倡導部落祭典觀光一系列遊程，因此於當時引起不少年輕族人反彈，並採取行動「觀光」交通部觀光局²⁶。

不過有關「祭典觀光化」的討論已持續多年，透過報導分析可發現部落族人從「祭典開放與否？」、「是否為部落創造收益？」到「部落族人如何自主規劃祭典現場動線？」等討論，有關此議題的相關報導分析結果發現，儘管族人對此各有所見，原民臺記者亦嘗試呈現族人多元觀點。而對研究者來說，原民臺記者如何看待此爭議議題？如何呈現該議題之報導？是否包含記者本身文化價值觀點於其中所產生的作用力？以上為研究者欲著眼之處，因此成為本研究進行訪談的重要論題。

回顧過去報導，多數強調觀光客因不熟悉祭典文化，常因好奇，誤闖祭典場域，以獵奇式的目光追逐，影響祭典舉行；有些觀光客則是有備而來，攜帶相機擅自穿梭攝影、拍照，嚴重干擾祭典進行。經檢視相關報導，所呈現的多半為部落多年來受觀光客「無心」或「有心」的干擾而衍生出的無奈，部落亦非不歡迎觀光客進入進入部落參與祭典，而是外來者若能尊重部落文化習俗，遵守祭典儀式規範，便能減少祭典受干擾的情形發生，甚至避免族人與觀光客間的衝突與摩擦，透過報導即能看見臺東縣都歷部落與花蓮縣奇美部落為防止觀光客影響祭典進行，進一步規劃「分區管理」，以及採登記制，發放「攝影證」等措施。

相關報導中，面對「祭典觀光化」現象，部落族人各持己見。新生代阿美族人認為祭典順應時代變化逐漸觀光化，然祭典儀式無形中成為一種「為別人而唱、為別人而跳」的文化展演，祭典文化也在這樣的過程中遭簡化、流逝，

²⁶ 見原住民族電視台 2014 年 7 月 3 日報導《青年動員"觀光"觀光局 反祭典淪為觀光》。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mtaXJI36iU>，上網日期：2019 年 6 月 9 日。

不過為讓大眾認識阿美族祭典文化，仍歡迎參與祭典，不過得建立在「尊重」的基礎之上，切勿干擾祭典舉行；中生代阿美族人則認為祭典觀光化帶來祭典周邊攤位林立的景象，為部落族人帶來經濟收益實則是短暫的，也為部落帶來大量的垃圾，其中亦有人強調外來觀光客的進入無疑對祭典來說無疑是一種干擾，一次次按下的閃光燈在神聖祭典中，阻斷族人與祖靈之間的對話。

該完全禁止觀光客進入部落？讓部落能夠不受任何干擾舉辦祭典？部分中生代及老生代阿美族人對於祭典觀光化卻是持相對開放的態度，希望能藉觀光客的加入，找回過去祭典那般熱鬧景象，並且認為在成群的觀光客凝視下，能激勵舞圈的族人們保持熱情，繼續唱跳，此也帶出部落人口外流現況，觀光客的祭典參與行為似乎象徵族人回鄉，欣賞的或獵奇的「凝視」成為老生代阿美族人積極唱跳的催化劑。

有時候問族人要不要觀光客？其實我覺得重點在現在年輕人大部分都不希望，不希望有觀光，可是喜歡觀光的偏偏是這個五十、六十及七十歲以上的（部落長者）喜歡觀光。

（記者B，男，阿美族，訪談紀錄）

長期蹲點部落的駐地記者B便坦言其在部落所聽見的聲音，而對主導過部落豐年祭的駐地記者E來說，其能夠理解部落長者歡迎觀光客進入部落的心態，也能夠迎合他們的想法，但是前提是不應影響部落祭典的進行。

其實今天人來，就分析我們自己族人的心態，喜歡嗎？還是不喜歡？其實是喜歡的，因為越多人我們越興奮，可是有一個原則就是說，你來看沒有關係，但當我沒有要求你來的時候，你就乖乖地在外面看，你不要侵犯到我，你來欣賞沒有關係，你不要破壞我的部落，其實部落是這樣的一個想法。因為我自己也當過mama nokapah（譯作阿美族年齡階級中的青年之父），我主導過（豐年祭），我很清楚，我也盡量迎合部落的心態及想法，讓這個祭典能夠非常熱鬧、快樂，甚

至是說有人要來跟我接觸，我歡迎！甚至於我解說，在解說的同時，禁忌部分很重要，我一定要告訴他們…。

(記者 E，男，阿美族，訪談紀錄)



言談間可見記者 E 對部落長者看法甚為了解，但基於其自身辦理過阿美族豐年祭的經驗，對於祭典中觀光客的進入有其堅持，禁忌部分亦不容忽視與觸犯。

祭典觀光化的聲浪持續席捲部落，且經檢視報導，大致提到了祭典觀光化為部落族人帶來的影響。研究者認為，相較於祭典觀光化的「正面」效益，報導則多凸顯對部落、對族人產生的「負面」影響。

就是我會找一些贊成的人，然後覺得反對的人，如果你找不到反對的人，你就想辦法講說其實也有一些反對的聲音，你可以增加文字這樣。

(記者 B，男，阿美族，訪談紀錄)

面對族人對「祭典觀光化」眾說紛紜之時，報導應當如何呈現？族人觀點如何被看見？駐地記者 B 則強調「正反並陳」是其作法，言談中嗅出其認為呈現族人「反對」聲音的重要性，甚至自生反面觀點，於報導中提醒大眾祭典觀光化為部落帶來的影響。此外，報導中除了族人正、反意見外，也應加入觀光客的觀點，了解觀光客到訪動機與目的，促進彼此觀點對話，此部分於報導呈現上亦可見。

就研究者看來，駐地記者 B 本身對「祭典觀光化」報導的處理較偏向呈現該議題的「負面」影響，並認為應採取相關措施避免觀光客干擾的現象加劇，於報導中對「祭典觀光化」一詞秉持「反對」立場，彰顯部落祭典神聖性，並提醒大眾應入境隨俗。

透過訪談，研究者發現駐地記者皆強調在「祭典觀光化」議題的報導中應將正、反意見並陳，但在試圖呈現多元觀點的報導中，卻還是能看出記者在於報導呈現「祭典觀光化」所導引出的危機意識，少有肯定祭典為族人帶來利益現況的鏡頭，凸顯祭典觀光化為部落帶來的「負面」影響。或許原因即在於部落至今因「祭典觀光化」受傷太多，站在部落的角度，原民臺記者能做的就是呈現部落現況，將此議題拋出引人省思。

但原民臺新聞記者所能做得實然有限。就研究者觀察，部落現今因「祭典觀光化」帶來成群的觀光客，演變成每逢祭典大家便競相設攤的情景，導致部落祭典失焦，且逐年越演越烈，研究者好奇的是原民臺記者未察覺此現象？是何原因讓原民臺記者不就場外情景進行報導並揭開謎團？是因害怕造成部落傷害而不選擇報導？或是原民臺記者為維護部落和諧而選擇粉飾太平？

我也不能說假平衡，我們是盡量做到真平衡，可是它真的很難。就是你說祭典觀光化，很多人就說我們沒有祭典觀光化，我們沒有，我們是開放接受很多人來，可是實際上多少攤子在那個時候就是要賺這一筆，可是你可以去問那些攤販嗎？當然可以啊，可是你不會被（新聞室審稿者）採納…

（記者A，女，布農族與拉阿魯哇族，訪談紀錄）

記者A先是表示不能以「假平衡」一詞評論「祭典觀光化」相關報導中慣於忽略現實狀況，但由原民臺對該類議題報導的呈現，記者A的後續言論更讓研究者確定，原民臺在「祭典觀光化」相關報導中雖強調正、反意見並陳，實際上卻是選擇忽略正、反意見之外的「異見」，「就是原住民（社會）內部已經有太多不同觀點的聲音，所以我們原民臺能做到真平衡嗎？沒有！我們永遠都是假平衡，所以我們常常遇到的狀況，是我們要去找一個正反兩邊的聲音，可是有第三邊的聲音啊，有第四方的聲音啊，絕對有…」（記者A，女，布農族與拉阿魯哇族，訪談紀錄），更坐實「假平衡」之名；且面對「祭典觀光化」相關報導時，表面上是推廣地方農特產品，但實質上就是擁抱觀光化的效

益，且祭典周邊攤販種類多樣，就是想趁著祭典舉辦期間獲取收益，但是這些在相關報導中不會被呈現。



就研究者自身觀察及相關報導指出，部落族人與「祭典觀光化」已形成相互依賴的關係。在祭典場域內，那群以維護傳統文化為自我使命的族人，在高呼「文化傳承」口號的同時，場外的攤商揮灑汗水換取「祭典觀光化」帶來的利益，祭典掛勾觀光已然演變成部落豐年祭最特別的風景，實難評價好壞。

研究者認為，原民臺「祭典觀光化」相關報導試圖基於部落主體，呈現族人正、反觀點，但對原民臺而言，仍有部分顧忌，顧忌源自部落與族人，記者並非不願意揭露，而是經過原民臺新聞室考量下，而選擇「淡化」。

當時擔任原民臺新聞部經理的 K 小姐²⁷提到，原民臺向來小心處理涉及部落的負面議題報導，深怕報導一出對部落造成傷害，後續得花更多時間修補與部落間關係，不可否認，新聞室內部選擇「淡化」報導的負面角度，不願揭露部落現實問題，原民臺則暫且無法發揮「看門狗」的角色。

不過透過 K 小姐所言，原民臺始終沒有放棄思考對此類報導的方式，只是現階段仍以「部落」為報導核心，不願觸碰爭議事實；由訪談結果亦可見，記者的自主思考象徵促進改變的力量正醞釀著，儘管其所主張可能危及自身與部落間關係，仍欲嘗試呈現不同觀點，演變成「記者」與「新聞室」各持所見，一則試圖呈現原住民族群祭典內部問題，一則避免傷害部落形象與自尊，但最終兩者皆站在「部落」的角度，記者從於新聞室。不過，改變並非不可能，而是對原住民社會內部而言，需要時間。

（二）2013 年—《祭典交互蹲跳事件》報導

²⁷ 研究者於 108 年 8 月 21 日假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午餐時間》分享本研究成果。其中一名曾經擔任原民臺新聞部經理的女性職員就本研究針對爭議報導分析結果進行回應，研究者於本文以「K 小姐」代稱之。

近年來，部落祭典不僅受到觀光客影響，其中「政治人物」的中途加入與致詞行為亦層出不窮，經檢視 2014 年祭典新聞，確實發現過去多有政治人物因著經費挹注而要求於祭典場合中發言的案例，因此部落對此擬出對策，祭典進行中，舞圈不停，部落仍迎接政治人物進場，雖手拿著麥克風，但舞圈族人以歌聲予以拚搏，一來讓政治人物說了話有了交代，二來也不失待客之道。不過研究者在 2014 年相關報導中發現，有關政治人物中斷祭典進行的報導，多是針對過去案例進行轉述，並未有具體事件躍上新聞版面。

經過訪談，研究者得知原民臺於 2013 年 8 月 19 日播出一則名為《祭典號令青年 花縣長夫人遭批荒謬²⁸》的報導，時為花蓮縣長傅崐萁的夫人徐榛蔚女士參加花蓮安通部落豐年祭，正當其代表花蓮縣政府致詞時，突然要求部落青年跳五百下的交互蹲跳，以展現阿美族體能，部落青年先是不願意，徐榛蔚女士則轉而要求頭目來號令青年配合她的指令，此事一發生便引起軒然大波，部落青年表示「憑什麼？」，報導中強調基於阿美族豐年祭的禁忌，並不允許「外族人」與「女性」發言，並呼籲政治人物尊重祭典，不影響祭典進行。

駐地記者 E 表示，事發當天他就在現場，並且第一時間取得第一手畫面，但因考量該事件涉及部落顏面與文化尊嚴，深怕對部落造成傷害，而選擇不在第一時間報導該事件，僅在私人臉書上分享，只是沒想到引起熱烈討論，新聞室主管隔日便要求其還原現場、進行該事件的報導。

第一個你要先問部落要不要，那時候我第一時間就打電話給他們（部落頭目），（問）說這個事件你們覺得怎麼樣？
(記者 E，男，阿美族，訪談紀錄)

駐地記者 E 在報導前先行詢問部落頭目的意見，先行告知部落即將報導該事件，有恐於負面報導對部落造成衝擊，並在知會部落且取得同意的情況下，

²⁸ 見原住民族電視台 2013 年 8 月 19 日報導《祭典號令青年 花縣長夫人遭批荒謬》。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K3-W3FkKbw>，上網日期：2019 年 6 月 9 日。

駐地記者 E 著手採訪當地部落青年，並完成了該報導，而檢視該報導中所呈現的是部落青年對政治人物中途破壞祭典的批評，及祭典對外開放的相關禁忌，但卻未見部落族人對「交互蹲跳」的行為給觀眾一個說明與交代。



駐地記者 E 坦承自己當時面對極具爭議性，且有可能傷害部落的《祭典交互蹲跳事件》時，於報導前諮詢的對象並非「新聞室」長官，而是「部落」，以「部落」意見做為衡量「報」與「不報」的尺；而當他在進行報導時也相當小心，寧可呈現部落對政治人物舉動的批判，也不願細究部落因何聽命行事？是政治壓力？或是部落頭目基於尊重外來者所展現出的高度包容性？在報導中，未見中族人對此提出說法，也不禁讓研究者思考，原民臺記者除了害怕報導對部落造成傷害之外，還有什麼影響因素？

當研究者與駐地記者 E 談到文化流失對部落祭典所造成的影響，正當要報導部落現實處境時，駐地記者 E 認為，應思考報導可能為部落帶來的影響，避免可能對部落造成矛盾與緊張的報導角度，或是面對可能衝擊部落現有結構的議題時，其選擇傾聽部落的聲音，採取正向報導，必要時則「淡化」處之。

其實在我的想法裡面就是說如果是對部落不利的事情，我倒覺得就這個部分就淡化掉，因為會讓他們（會）有更大的一些問題產生，因為你的報導可能影響他們很大，你要不要做一個這樣的罪人？其實他們會產生一些矛盾啦！但是我們也知道，我們一定要挖嗎？但是這造成很多傷害的時候，這個（就）有一些取捨啦。

（記者 E，男，阿美族，訪談紀錄）

對此，時任原民臺新聞部經理的 K 小姐表示，當時該則新聞的確在臺內造成轟動，且引起當時「新聞室」熱烈討論，到底該「如何報？」便成為難題；最終，如同面對「祭典觀光化」報導，欲顧及原民臺與「部落」間的關係，只得採取「淡化」方式進行報導，不細究部落本身於該事件爆發時所做的回應，因為他們知道這勢必為部落帶來傷害；於此，便能看出「記者」本身與「新聞

室」意見並未相左，皆站在同一陣線，以對部落造成最小殺傷力的方式報導該爭議事件。



而當研究者問駐地記者 E，是否因為自己做為阿美族年齡階級的一員，因此在重視部落集體的價值、強調族群集體的利益之下，選擇採取「淡化」方式帶過亦為報導核心的現實問題；駐地記者 E 並不否認年齡階級為他培養並建立成的文化價值觀，一旦遇爭議事件，報導與否？採取何種報導角度？各種拉扯便成必須，「除非今天我不想待在部落了！」這一句話便深刻地反映了駐地記者 E 奉部落價值為圭臬，以族群文化為依歸的精神。

若遇他族爭議事件的報導，駐地記者 E 則強調與部落站在同一陣線，重視群體利益，避免負面報導；當發生爭議事件時，首要想法就是如何保護部落族人？如何讓他們免於負面的報導泥淖？可能的作法便是於祭典報導中凸顯文化的內涵，以帶過爭議事件。研究者認為，導引駐地記者 E 所言所思便是阿美族的「集體價值」，延伸至對待不同族群的族人，仍以他們的意見做為決定報導與否的參考，也以保護為前提進行報導。

…已經養成這樣了，不管是哪個族群，我還是以保護這個族群為主，然後就呈現他們文化的內涵，如果是發現到有一些爭議的時候，這個部分如果他們要還是會做…

(記者 E，男，阿美族，訪談紀錄)

初步看來，講究「集體主義」此一文化價值可說是駐地記者 E 憤於正面報導「我族」與「他群」新聞的原因。他以「同胞愛」一詞包裝「同樣身為原住民」的群體認同感、集體思維，與原住民族群長久以來於社會結構中的弱勢處境，因而同病相憐。「因為是自己的族人，當然是這樣，我們原住民已經是被人家弱勢了…回歸一種就是說「同胞愛」啦！會希望說有個好的結果，不會傷害到部落啦…。」(記者 E，男，阿美族，訪談紀錄)，駐地記者 E 由自身族群文化價值延伸至不同族群，擁護「集體主義」，進行新聞實踐，有如毛利新聞記者恪守文化傳統，在不傷及「集體價值」的前提下，完成報導。

觀諸原民臺新聞製播自主公約、節目製播準則皆揭示原民臺與原住民新聞從業人員應本於提供公正、確實、客觀、多元化的新聞資訊，並且依循尊重民主自由、族群平等及原住民族主體等原則，針對不同族群、性別、宗教以及社會議題採取最適切的採訪與報導方式。不過，當原民臺記者因「祭典觀光化」而意識到部落內部問題時，揭露部落現實處境與否以及報導拿捏明顯可見仍偏向維護部落尊嚴與和平的處理方式，記者 A 激動道，現今有些助於促進原住民族社會內部進行反思的議題，很多時候不被重視，現實存在的問題則完全無法被正視。

…其實是會覺得我們的媒體（原民臺）到底在做些什麼事情？就是我們的內部，其實是不容批判的。然後再來就是我們一直去包裝我們的文化，但其實我們的文化真真實實地面臨到大的衝擊、挑戰跟拉扯。

（記者 A，女，布農族與拉阿魯哇族，訪談紀錄）

記者 A 表示，原民臺很多時候必須放棄有助於整體原住民族社會進行反思的議題與報導面向，原民臺記者不得去揭開面紗，只能迎合部落與新聞視的期待，盡可能地美化原住民族內部許多問題，有時還得遭「你沒有權利去批判別人族群發生了什麼事情。」此類的言論勒索，而那些問題卻仍實在地存在著。就如研究者所擔憂，若是一味報喜不報憂，面對族人真實的吶喊，卻要視而不見，真能落實原民臺服務原住民族公共利益的真諦？

他（族人）其實是有他的拉扯跟真實的反應的時候，我們的審稿的（新聞室長官），他就是把你刪掉，他就會告訴你說，你只要放好的就好了。

（記者 A，女，布農族與拉阿魯哇族，訪談紀錄）

反思記者所說，報導「祭典觀光化」新聞時，盡可能正反並陳，強調多元化觀點，實際上卻趨於一元論述，其所言所行皆為部落；報導《祭典交互蹲跳

事件》時，原民臺「記者」與「新聞室」站在同一陣線，皆以保護族人尊嚴為首要，且原民臺記者訴諸集體認同與價值，報導與否？取決於部落。

觀察前起事件攸關部落內部現實問題，後者則關乎部落形象與尊嚴，透過報導呈現可顯明看出原民臺記者報導方式皆偏向部落。經原民臺記者事後闡述亦才得知部分「記者」對於前項爭議報導所持有的觀點與「新聞室」確實小有分歧，但仍選擇不揭露內部真實處境；反觀後項爭議報導，透過「新聞室」代表K小姐的現身說法，可見當時報導「記者」與「新聞室」間以相同視野，有志一同維護部落尊嚴；以上討論有助於研究者釐清，原民臺「記者」、「新聞室」與「部落」三者間的角力過程，誰具勝算？事實上，部落皆勝。

（三）綜論「祭典觀光化」與《祭典交互蹲跳事件》報導

綜觀「祭典觀光化」報導與《祭典交互蹲跳事件》報導，前者雖多採取正反並陳報導，但多凸顯對部落造成的負面影響；後者則著重於部落青年如何看待政治人物參與祭典、打斷祭典，觀眾可能也有著與研究者相同的疑問，「難道部落青年不能說不嗎？」，但在報導中無法得到解答。

透過訪談記者對於「祭典觀光化」報導及《祭典交互蹲跳事件》報導的看法，以及其對於相關新聞製播的思維。由前者報導可見原民臺「記者」清楚了解部落內部處境及現正存在的問題，儘管試圖呈現不同觀點，但在做為新聞內容把關者的「新聞室」看來，認為維護部落內部和諧，及原民臺與部落關係才是首要，並進一步選擇淡化、霧化焦點，且「記者」亦順從之；而面對後者報導時，「記者」則為維護部落形象與尊嚴，以「部落」為首要諮詢對象，甚至做為報導與否的依據，儘管事件終究免不了躍上新聞版面，但仍見報導內容經「新聞室」熱烈討論後，偏向避重就輕，報導所呈現的是「部落祭典如何被外來者打斷？」，及「外來者應了解的禁忌」，而未著眼於「失序狀態中的部落回應」。

由「祭典觀光化」報導、《祭典交互蹲跳事件》報導及相關訪談指出，原民臺「記者」在經過「新聞室」把關之下，傾向與「部落」站在同一陣線。由「祭典觀光化」報導可見，駐地「記者」以自身祭典參與經驗道出部落現實，於報導中著重文化特色，免於對部落內部現實的討論，基於部落祭典文化延續而強調有利於部落的觀點，且在「新聞室」面對較具批判觀點的「記者」時，將可能危及部落與原民臺關係的觀點剔除，初見「記者」文化價值、「新聞室」報導動機與「部落」利益相互交纏、影響；另在《祭典交互蹲跳事件》報導，駐地「記者」起先怕有害部落尊嚴而選擇不予報導，想不到在其個人臉書平台分享後引起熱議，報導終究產出，駐地「記者」不否認阿美族年齡階級在其自身所形塑一「集體主義」的文化價值，面對該事件的報導，首先徵詢族人意見，且在「新聞室」成員還原當時內部對該事件的討論，念及「部落」，仍選擇以所造成殺傷力最小的方式報導之，最後可見該報導鏡頭下的溫柔，試圖藉由報導削弱觀眾對於部落的不解，挽回失去的尊嚴。

前述兩事件報導皆傾向站在「部落」角度進行報導，且經由原民臺記者訪談及新聞室內部人員後續口述得知，「新聞室」內部相當關切「部落」內部處境，且不願為了揭露而揭露。當原民臺「記者」認為某觀點有助於原住民族群內部反思而欲進行報導時，「新聞室」內部審查機制卻無法讓原民臺「記者」忠於自我，企圖在報導中避免「部落」成為眾矢之的，且在「新聞室」的要求之下，避免揭露有違部落利益、有害部落和諧的現實處境，因此，有「記者」便以「美化報導」評價「新聞室」的指導原則，且經檢視報導議亦可見原民臺「記者」的妥協。

單就報導並無法看出原民臺「記者」的反叛觀點，嗅不出其與新聞室間的緊張關係，但經訪談及相關口述可得知，即使有時「記者」本身的觀點與「新聞室」所要求存在分歧，但站在有利「部落」的報導角度，順從「新聞室」對「記者」而言是唯一路徑，不過「新聞室」所秉持立場卻是從一而終為部落；進一步來看，原民臺「記者」自身的「文化價值」導引，甚至是「原住民族身分」歸屬，為其面臨爭議報導時，促使記者分析事件可能為「部落」帶來何種影響，看見的往往是負面影響，故報導試圖對抗，而實際上卻是採取「淡化」

機制，避免揭露現實問題，為維持部落和諧，「美化」報導。顯見，原民臺在做為「看門狗」角色，面對族群內部報導爭議事件的表現上尚有不足，可見原民臺仍著重在「提供反論述」的報導原則。



綜上，研究者由爭議報導及訪談分析發現，大致彰顯出 Hofstede (2001) 所提「集體主義」、「高度規避不確定性」與「長期導向」文化價值。

原民臺「記者」不求個人成就彰顯，在乎「集體價值」的實現，不因個人利益，放棄部落公益，彰顯出「集體主義」文化價值偏向；原民臺做為族群媒體，由新聞製播守則看來，應彰顯原住民族主體性，提供多元觀點報導，原民臺「記者」則遵循著此一框架報導有利於族人新聞，當面臨爭議事件，「新聞室」以「部落」利益為先，不願揭露現實處境，使得「記者」在面臨爭議報導時，基於「文化價值」，從於「部落」，雖有批判觀點，仍規訓於「新聞室」規章與指令，更多的是不為破壞原民臺與部落間關係做為考量；諸多面向顯示出，原民臺「記者」報導爭議事件時對於不確定性的容忍度較低，原民臺「記者」在套上「文化價值」這層厚重外衣後，便難以訴諸個人意念，且在「新聞室」的把關下，無法揭露部落內部問題，也確實揭露真實可能帶來的後果無人可擔保，然而，在「記者」與「新聞室」站在同一陣線，報導有利於「部落」觀點，所呈現的是「記者」與「新聞室」對「部落」的「高度規避不確定性」，原民臺「記者」對「新聞室」的妥協則亦反映出「高度規避不確定性」文化價值偏向背後對於部落長遠影響的考量，亦彰顯出「長期導向」文化價值。

三、祭典新聞中的女性角色

本研究經報導消息來源分析發現，2014年至2016年間阿美族豐年祭報導中男、女性做為消息來源的比例相當懸殊，女性消息來源共 79 人，男性則近 3 倍之多，共計 236 人。初步經研究者檢視報導內容發現，部落豐年祭報導多著重於「男性年齡階級」的呈現，由報導可知男性年齡階級在豐年祭期間扮演主

導角色，對部落而言更具保衛任務；反觀女性則在極少數看似做為主角的報導篇幅中，被刻劃成「場外的勞動者」，即便在由女性主導的儀式中，仍遭形塑成附屬於男性的角色。



對！我們（阿美族）是母系社會，但以我們部落的社會制度來講是以男性為主，那女性的話，她是負責家，在這部落裡面的整個制度來講是男性在進行的，所以在過去，豐年祭女性是幾乎很少參與的，她們只是負責在家裡整理家務…

（記者 E，男，阿美族，訪談紀錄）

當研究者問及「女性」在祭典中的角色？及「女性」形象在祭典新聞中如何被刻劃？身為阿美族的駐地記者 E 先是道出阿美族「母系社會」此一傳統社會結構特質，強調祭典中男、女性別差異所產生的而傳統社會分工樣態。

簡單講就是男主外、女主內，女孩子是承接家裡的土地、房子、財產，她是在家裡的，那男生是，我剛剛講這個部落就是一個國家，這個國家就跟我們以前一樣，當兵要男生，警察要男生，所以頭目一定要是男生，不可能是女生，那所有外面的綜合事務，保護部落所有的、社會的工作都是交由男生處理，所以在祭典的時候，都是男生開始做的…

（記者 B，男，阿美族，訪談紀錄）

同樣身為阿美族的駐地記者 B 則同樣強調了阿美族母系社會中，男、女性別分工樣貌，透露著駐地記者 B 確實意識到祭典中女性角色逸失的現象，像是怕研究者將報導中「性別失衡」的發現歸咎於記者對錯似的，將其報導呈現的成果歸於阿美族社會中祭典儀式對男、女性的分工的規範與禁忌，「像捕魚祭也不可能女性去啊！」（記者 B，男，阿美族，訪談紀錄），可見駐地記者先是依母系社會中男、女展現權力場域的差異，帶出祭典中因性別差異與祭典禁忌所形塑出的男、女性別分工，使得阿美族駐地記者以「祭典中較少女性主導

的儀式」做為男性成為報導主角的合理化原因，變相以阿美族傳統社會結構與祭典文化中女性的退居幕後，合理化現今祭典報導中女性角色的缺席。

Hofstede (2001) 所提文化價值指標，包含「陽剛」與「陰柔」文化價值，有助於研究者針對記者報導阿美族豐年祭所著重男、女性價值輕重進行觀察與詮釋。Hofstede (2001) 筆下的「陽剛／陰柔」文化價值主要以整體社會所強調男、女的「性別氣質」及對其的「社會期待」，進而形塑一國家文化的陰陽氣質偏向，並就對男性價值與女性價值的偏重預示國家中男、女性的權力的平等狀態，像是著重男性價值的社會脈絡中，男性掌握較大的權力，整體社會強調男性應具備陽剛氣質，且被期待做為果斷的角色；而在強調女性價值的社會脈絡中，則企圖消弭對男性價值的強調，將高度價值置於性別平等之上。

若觀察阿美族「母系社會」內涵，較為不同之處在於其社會結構則建立在「權力分配」及「性別分工」的差異上，經檢視相關報導可見，女性掌有「繼承」家產的權力，男性則肩負「維護」社會秩序及祭典運作責任，男主外、女主內，權力各自展現，所強調的是彼此分工，基於阿美族傳統文化透過「權力分配」與「性別分工」穩定社會運作；研究者透過黃宣衛（1989）研究得出，男（年齡階級組織）、女（家庭）性分工蘊含互補性及階序性概念，男、女性並非二元對立；羅素玖（2005）接續在其研究中論述祭典中男、女性別分工存有互補關係，具體論證男、女間權力關係是可被逆轉的；蔡維庭（2012）更在其研究中納入社會變遷影響因素，研究發現，高寮部落阿美族人在變動中的社會脈絡中，兩性間分工仍存在互補性，且在權力變動的過程中，族人對女性的傳統認知轉變，文化結構的鬆綁，使女性得以藉由社會參與走出傳統女性管理家庭的場域，彰顯其多元價值。因此，研究者認為阿美族男女間權力的平等關係較難以 Hofstede 所見男、女性價值呈現對立且相互處於翻轉主導的狀態以論之，不過，就「陽剛」與「陰柔」文化價值所揭示對男、女性價值偏重程度來看，仍有本研究可取用之處，可進一步解釋阿美族豐年祭報導中所見男、女性被報導所呈現的關注程度差異，可見原民臺「記者」較為強調男性價值，男性則在媒體中握有發聲權力，女性價值則未如研究者對阿美族母系社會的想像，

應當在女性角色上有更多的呈現，消弭男、女性在媒體上所處權力不對等的關係。



不可否認地，以上兩者是分別基於「國家」與「族群」的社會文化脈絡，各自延伸出以「男性」與「女性」間權力運作的狀態。而在過去，對原住民族人而言，一個族群或許就可做為一個國家，時至今日，研究者在記者訪談分析中發現，原民臺駐地記者在表述阿美族屬於「母系社會」的同時，嘗試以訴諸於祭典中男女「性別分工」與「權力分配」進一步合理化女性在祭典報導中相當高程度的不在場狀態，且從報導中亦可以發現駐地記者鏡頭下不斷地彰顯阿美族男性做為維護社會秩序的主角，那般刻苦耐勞與堅不可摧的剛強形象，而阿美族女性則時常在鏡頭下消失，儘管女性仍有其主導的祭典儀式，但在駐地記者的報導之下，女性仍淪為報導配角。

研究者就訪談觀察，「阿美族文化」對於駐地記者影響甚深，特別是在面臨族群爭議事件時，基於「集體主義」文化偏向特別能夠彰顯出駐地記者文化價值與報導間的拉扯。而阿美族駐地記者自小便加入「年齡階級」，至今仍參與其中，相當熟知阿美族年齡階級的運作，及其對阿美族社會結構與祭典文化的重要性，然身為阿美族男性，就在其意識到女性在報導中未被平等報導的情況下，歸因於阿美族「文化」本身，正當化在以「母系社會」做為主要文化特徵的社會結構中，流於重男輕女的報導方式，或說原民臺記者呼應「陽剛」文化價值，就其「性別」與「文化養成」做為進行阿美族豐年祭報導的角度。

她們在做什麼？她們都是在家裡準備家人的一些飲食，包括備餐之類的，或是為自己的孩子準備衣物，當他們在準備要去參加祭典的時候，這個女性就要幫她們的孩子、家人準備他們的服裝，幫他們穿戴，然後去參加這個祭典，

（記者E，男，阿美族，訪談紀錄）

於原民臺服務多年的 M 先生²⁹就研究者發現回應道，阿美族駐地記者身為男性，不可避免著重在祭典中對男性年齡階級的拍攝，多彰顯男性價值，且就族群文化脈絡而言，豐年祭就如同漢人習俗，象徵阿美族人的「過新年」，男性年齡階級主導祭典的運作，一年一度的豐年祭到來便為男性提供一個表現的舞臺；研究者進一步解釋豐年祭讓男性在難得的祭典場合中不僅展現主導的權力，也能讓族人知道男性年齡階級在維持部落政治運作與祭典延續的重要性；反觀 K 小姐則是就其服務原民臺新聞部多年的經驗敘述，豐年祭是由男性揭開序幕，女性的參與已接近豐年祭尾聲，原民臺記者在祭典一開始便報導多則豐年祭新聞，為妥善分配報導人力與資源，便就難以顧及女性所主導的祭典，給予女性多點報導關注，這也的確是原民臺應當反思的面向。

不過基於駐地記者自身參加阿美族豐年祭的經驗，及多年來擔任駐地記者的看見，記者 E 仍能道出阿美族部落中女性在祭典前為家人準備飲食與服裝的景況，可見駐地記者於現實生活中並未忽視女性於祭典中的重要的角色，而是在報導取捨後，仍選擇以男性為主進行報導呈現。此外，研究者認為，文化並非一成不變，因現代化社會的轉變，祭典的性別分工與禁忌規範逐漸鬆動，然因女性參與意識的崛起，促使男、女彼此權衡調適，在不打破禁忌核心的價值下，放寬標準，讓女性除了參與豐年祭最後一天的「送靈」儀式外，也能參與其他祭儀場合，也使得過去祭典逐漸改變。

女孩子啊，你不管到長光（部落）還是哪裡，很多（部落）最後一天（豐年祭送靈儀式）都是女生啊，只是前面很多東西都是男生在做，都是男生來處理，最後送靈是由女生，部落有些女生還會 complain 說：「四天裡面只有最後一天是我們而已，那能不能提早一天下來跳舞？」，因為她們想跳嘛！那我們（男性族人）也開放啊，但是最重要的前面一兩

²⁹ 研究者於 108 年 8 月 21 日假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午餐時間》分享本研究成果。其中一名於原民臺服務多年的節目部職員就本研究針對報導性別分析結果進行回應，研究者於本文以「M 先生」代稱之。

天我們（男性族人）不能讓女孩子進來，那第三天你們可以開始進來跳，最後一天是妳們跳，因為通常到了最後一天我們男生也沒有在領唱了，都是給女孩子領唱，就讓妳們唱唱唱到通霄都沒有關係，因為最後一天了，已經送靈了，送完靈之後就是女孩子的天下了，女孩子來跳了這樣

（記者B，男，阿美族，訪談紀錄）



以上針對阿美族豐年祭現況的陳述可見於少數幾則報導中，觀眾得以了解豐年祭中男、女性分工職責、禁忌規範與現代化的權衡，不過相對男性，祭典新聞中對於女性族人的關注及報導仍有不足。記者A雖未察覺阿美族豐年祭報導中對男、女性呈現篇幅的差異，但在其所屬布農族與拉阿魯哇族文化中所看見的，族群中男、女性基於文化對於性別的刻劃導致持有的觀點必然不同，只是女性往往是少有發言機會的，對記者A來說，這不表示女性的聲音就該被忽視。

因為我覺得我們的族群（布農族或拉阿魯哇族）男生、女生的觀點就是（有）落差，就是一個非常不一樣的觀點，所以我從小就不覺得說為什麼男人說的話就是聖言或者什麼，就是女生她其實是有表達能力的，只是有沒有給（她）這個機會。

（記者A，女，布農族與拉阿魯哇族，訪談紀錄）

臺灣原住民族群各自有著不同的性別分工與文化慣習，記者A回顧自己過去報導經驗，向來習慣採取性別平衡報導原則，同時去強調女性在族群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具有「穩定」的力量。觀諸過去採訪阿里山鄒族祭典時，同於阿美族豐年祭中的性別分工，另基於祭典禁忌，可見鄒族祭典由男性主導，女性則於場外「看不見的角落」進行勞動與協助，但記者A不放棄追逐，試圖看見「女性」對祭典的付出，亦道出男、女性間的相互關係。

可是像我們去阿里山的時候真的訪不到女生，因為他們認為那（祭典）都是男生的，可是我就看到有一群人在煮菜的，我就衝過去訪問：「妳們煮的是什麼啊？」、「妳們為什麼要準備午餐？」，她說：「他們（男性族人）要吃啊，啊我們女生就要煮…。」

（記者 A，女，布農族與拉阿魯哇族，訪談紀錄）



學者孫嘉穗（2016）以「性別」分析族群新聞報導，發現原住民女性形象的不足，認為報導當順應時代變遷，多面向報導女性在族群社會中的角色與豐富底蘊，女性是應該被看見的。就如同記者 A 所說：「一個祭典要完成，其實女生是有一份力在裡面，女性！她不是隱藏的。」（記者 A，女，布農族與拉阿魯哇族，訪談紀錄）。

本研究基於研究命題關切原民臺記者如何報導祭典新聞？於此不深究族群文化對於性別分工與社會期待的歷史緣由，僅就過去原民臺阿美族豐年祭報導對男、女性呈現比例的差異，及原民臺記者對此現象的看法，進而理解其中因果關係，且回顧過去研究，並基於原民臺應多元報導族群文化並彰顯原住民族主體性的前提下，報導中應加入女性族人的文化視野，讓女性對於族群文化的參與得以被看見，呈現女性的故事，促進祭典新聞報導呈現上的性別平等。

但研究者亦認為，祭典中男、女性分工目的其來有自，在強調增加女性視野與故事的報導外，更重要的是透過原民臺的祭典報導，帶出族群性別分工的內涵，如同研究者所提相關研究，阿美族祭典中男、女性別分工是存在互補性的智慧，研究者認為原民臺在秉持「基於文化做適切性報導」原則下，更應適切交代阿美族文化脈絡，使社會大眾對於阿美族「母系社會」的認識不僅男主外、女主內、對「豐年祭」的認識不止於由男性主導、女性則附屬於男性的形象；透過本研究，研究者想提出的更是：「沒有場外的女性勞動，何來男性的祭典實踐？」此一見解，報導女性視野固然重要，但應兼具性別分工內涵的呈現，以此改善阿美族豐年祭報導中女性形象逸失的現象，讓女性角色深厚底蘊得以展現。

四、以「文化價值」指標檢視原民臺記者的「報導」實踐



本研究依據「報導區域分布特性」，可大致將所有阿美族豐年祭新聞區分為「都會區豐年祭」與「部落豐年祭」報導，分別以「北部都會區」與「花東地區原住民部落」為主要辦理地點，並在區域內配置記者，北區記者與花東地區記者則分別主則前開兩類祭典新聞的採訪與報導。而進一步依據「報導著重面向」分析「都會區豐年祭」與「部落豐年祭」報導，可見分別以「著重傳統儀式呈現」及「強調跨文化互動」做為報導主要角度，此現象也得歸因於現代化社會對於原住民族社會的影響，強化著祭典的流變。

「都會區豐年祭」因鮮少祭典儀式，北區記者又多為非阿美族群，並未能於相關報導中深度彰顯出阿美族豐年祭的深厚底蘊，且易流於「依據發稿單位決定報導角度」的報導方式；「部落豐年祭」則還保有相對傳統的祭典儀式，駐地記者又主要為阿美族群，在具備文化背景的基礎下，駐地記者的報導便能呈現更多元、更深入的祭典脈絡與儀式意涵。

前經研究者就「報導消息來源」進行分析，即反映出「族語」能力對於報導刻劃的影響。報導中，「部落傳統領袖」做為形塑祭典樣貌與解釋部落歷史的重要消息來源，其口中操練著流利「阿美族語」，表達出深層的文化內涵，同時可見駐地記者憑藉流利族語採訪部落阿美族人，且相對於北區記者所做報導的文化內涵較為豐富。也可說，記者的「族語」能力便象徵著對於該文化的理解，亦是區隔「記者」與「消息來源」的因素，為彼此劃分出不對等的權力關係，「族語」能力的有無對記者來說，便是一面牆，能否跨過那高度便取決於原民臺記者的「族語」能力，於報導中就能見真章。因此，「族語」能力的有無則彰顯出「權力距離」文化價值，亦深刻反映出訪談過程中，駐地記者對「族語」的重視，表示具備「族語」能力的記者便能找到「原味」，亦象徵著「記者」得以消弭與「消息來源」間權力距離，完成採訪並產出具有文化深度的報導。

另外，經「祭典觀光化」、《祭典交互蹲跳事件》相關報導及訪談分析發現，原民臺記者「文化價值」彰顯出 Hofstede (2001) 研究中所提「集體主義」文化價值，此也呼應研究者於報導內容分析所見。



阿美族豐年祭報導著重年齡階級報導，強調組織集體價值，而非個人成就的凸顯，此外，報導中以阿美族人做為主要發聲角色，報導著重於部落處境、傳統儀式、文化傳承，及族人自主，彰顯族群文化與主體性，並透過政策議題及政治面向報導，了解原住民族權利需求，報導強調集體福祉，且經報導立場分析，發現未有負面立場報導，正面立場報導計 33 則，皆呈現著重文化傳承精神報導面向，使得部落因面對現代化影響而衍生出文化傳承的集體精神得以被看見，深刻帶出報導中的「集體主義」文化價值面向，著重集體福祉的爭取、集體利益的追求，及集體價值的彰顯，而該文化價值無形中亦做為原民臺「記者」面對不利於「部落」的爭議報導時，衡量「報」與「不報」的那把尺。

報導中，原民臺「記者」與「新聞室」站在同一陣線；報導外，兩者訴說著，面對爭議事件，不去報導不利於部落的新聞，甚至另闢蹊徑，「淡化」或「美化」具爭議性的報導主題，原民臺「記者」思考「報導與否？」與「如何報導？」皆以「部落」利益為考量；同時「新聞室」的審核機制亦為「部落」把關，即使原民臺「記者」意識到族群內部現況，且曾想過反抗「新聞室」指令，呈現對「部落」可能具有殺傷力的報導觀點，但終究被「新聞室」打住，但最後仍以「部落」為先，進而妥協，在「集體主義」文化價值的展現，原民臺「記者」在面對爭議事件報導時的拉扯與妥協，看似是「記者」服從「新聞室」，但實為兩者皆以「部落」為依歸，進一步看見原民臺「記者」與「新聞室」面對「部落」時展現「高度規避不確定性」文化價值，且某種程度上，尊重傳統與部落進而權衡報導視野，強調長遠影響而非短期利益的展現，亦反映「長期導向」文化價值

研究者由爭議報導進一步反思原民臺報導是否能夠實現「看門狗」報導原則？根據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原住民族電視臺新聞製播自主公約（2018）所載，原民臺的新聞編採應落實言論自由，除了公正、客觀、多元化

報導外，原民臺新聞應遵守尊重民主自由、族群平等及原住民族主體的原則；另，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原住民族電視臺節目製播原則（2016）則揭示原民臺應積極滿足原住民族人需要、做為原民發聲管道、以原民世界觀與知識做為節目內涵、復振族群語言、尊重各族群祭儀與文化活動，及尊重各族群慣習與組織；研究者初步以原民臺基於尊重族群文化所訂定新聞的製播原則與原民臺記者間關係看來，記者應遵守新聞室製播原則，經報導分析，原民臺基於原民臺新聞製播原則，仍以部落、阿美族人，甚至整體臺灣原住民族利益為先，站在部落與族人的角度報導阿美族豐年祭；且經訪談結果發現，原民臺以「提供反論述」為至上報導原則，反觀原民臺在揭露族群內部問題，尚有不足，目的在於維繫「原民臺」與「部落」間關係。

此外，在「祭典新聞中的女性角色」的分析前，研究者先行檢視所有阿美族豐年祭報導發現，無不彰顯阿美族「年齡階級」對維持部落傳統社會的重要性，及「年齡階級」的「男性」於豐年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眾所周知，阿美族屬於「母系社會」，「女性」得以繼承家族土地與財產，男性則以「年齡階級」做為部落政治運作的中心，其中依循年齡長幼分層對部落事務工作職掌亦有所不同，目的在於使年齡階級中各階級能各司其職、保衛部落，使部落事務得以穩定運作；阿美族做為「母系社會」極具代表性的族群，研究者起先認為，阿美族「女性」會是祭典新聞當中報導的主角，但經分析發現報導並未對「女性」有太多著墨，只見報導對男、女性呈現的篇幅與深度懸殊，報導以男性做為鎂光燈焦點，女性則被型塑為場外的勞動者，而阿美族「母系社會」與原民臺阿美族豐年祭報導對「女性」呈現面貌，對研究者來說是一想像落差與矛盾所在；研究者進而透過報導消息來源「性別」統計，並檢視相關報導，初見新聞中強調男性價值多過於女性價值，所呈現男性視野多過於女性視野，報導初步反映 Hofstede (2001) 所提「陽剛」文化價值。

研究者反思，屬於「母系社會」的阿美族在祭典報導中為何多彰顯男性角色？女性形象則屢遭逸失？透過訪談可以發現，原民臺記者將報導中男、女性別失衡的現象訴諸於阿美族傳統社會的「性別分工」，祭典場域為「男性」的活躍範圍，場外則是「女性」實踐文化的場域，並加自身族群文化參與經驗，

導致多著眼於男性；透過於本研究報導分析區間—2014年至2016年，時任原民臺新聞部經理K小姐所述，因記者人力與報導則數分配因素，使得「女性」的後來加入難以被重視並著重報導；另透過對原民臺新聞製播多有了解的M先生所言道，駐地記者身為阿美族男性，且一年一度的豐年祭對男性而言意義非凡，得以展現自我，因此，報導多著重於男性；顯見原民臺男性駐地記者彰顯「陽剛」文化價值，並以此報導阿美族豐年祭新聞。

由過去文獻可見，學者認為族群新聞中應多面向報導女性在族群社會中的角色與豐富底蘊（孫嘉穗，2016）；而訪談過程中向來不吝表現批判觀點的女性記者A則由自身族群文化及相關報導經驗出發，對於女性做為「場外的勞動者」心有戚戚焉，但也不甘於此，其多關注「女性」的態度，試圖將女性觀點納入報導，有別於男性記者的報導，試圖在祭典報導中彰顯「女性」的觀點與價值，使「女性」能被看見。

對此，研究者以「沒有場外的女性勞動，何來男性的祭典實踐？」進行報導反思，報導中呈現女性觀點與視野固然重要，但若報導能基於文化傳統，彰顯祭典中男、女性別分工內涵，使得社會大眾得以站在阿美族文化脈絡中，認識阿美族祭典性別分工的智慧，在展現女性角色深厚底蘊的同時，也平衡男、女性於報導中的權力關係，使其平等發聲。

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建議

(一) 研究發現



本文試圖從原民臺阿美族豐年祭的報導中，探看原民臺如何呈現阿美族豐年祭報導？在被建構中的原住民新聞學與原住民報導觀點中尋找共同點；並藉由原民臺「記者」的角度，理解其如何報導阿美族豐年祭？且在面對「部落」與「新聞室」時，於「採訪」與「報導」實踐過程中，又彰顯何種「文化價值」？

第一章緒論中，交代本研究緣起、研究背景，及研究目的，說明本研究起於「文化」對於「新聞實踐」的深刻影響，回顧相關族群及傳播研究，發現新聞學研究中未出現阿美族豐年祭的視野，基於研究者自身族群身分與認同，奠基於原民臺豐富影像資料，厚植臺灣原住民新聞學相關研究。

第二章分四部分，先認識阿美族豐年祭，利用文獻耙梳出阿美族豐年祭背景脈絡，包含其重要性、禁忌及現代社會中的演變型態，做為研究基礎；進而嘗試從主流媒體中的原住民族再現脈絡中，看見原住民族被再現的形象；且在相對於主流媒體的軸線上，呈現出族群媒體發展歷史，及正在被建構的原住民新聞學面貌；並且藉由「文化價值」檢視「新聞實踐」中，「文化」影響的軌跡，使本研究所欲探究抽象價值觀點，更加具體而清晰。

第三章則透過研究對象的確立，交代本研究分析方式與框架，藉由量化內容分析法，初步就「區域分布特性」、「消息來源特性」及「報導著重面向」分析原民臺阿美族豐年祭報導，試圖歸納出其所呈現出的原住民新聞報導觀點；接續透過質化深度訪談法，就「採訪面」與「報導面」進行訪談並分析原民臺記者的新聞實踐，探究「文化價值」的影響。

第四章則由原民臺《每日新聞》中阿美族豐年祭報導內容分析看見，報導彰顯「原住民發聲」、「彰顯原住民族文化特質」、「正向報導」、「原住民族議題」，及「跨文化對話」等五項原住民新聞報導觀點，進一步對照其他原住民新聞學原則，卻未彰顯出「看門狗」報導原則，成為本研究針對爭議報導進行分析的基礎；且由「報導消息來源」分析發現，女性形象逸失，為阿美族屬於「母系社會」的想像帶來矛盾，亦成為訪談及分析的核心問題。

第五章分兩部分，從原民臺記者「採訪」實踐來看，由記者自身族群文化背景出發，關照阿美族祭典採訪經驗、採取的採訪策略，及其與消息來源互動情形，初步彰顯出「集體主義」、「權力距離」、「高度規避不確定性」，及「長期導向」文化價值；從原民臺記者「報導」實踐來看，則具體反映出「集體主義」、「權力距離」、「高度規避不確定性」、「長期導向」，及「陽剛」文化價值。

從以上各章節所歸納及分析過程中，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1. 原民臺在呈現阿美族豐年祭報導時，以「阿美族人」做為主要消息來源，其中阿美族「傳統領袖」則在形塑祭典樣貌及還原部落歷史的目的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整體而論，阿美族豐年祭報導由阿美族人自己述說，由阿美族人掌握發聲權。
2. 原民臺阿美族豐年祭報導呈現男、女性形象嚴重的失衡狀態，報導多著眼於主導祭典儀式進行的「男性」年齡階級，被再現為「祭典的實踐者」；「女性」則退居幕後，被形塑為「場外的勞動者」。
3. 原民臺阿美族豐年祭報導呼應「原住民發聲」、「彰顯原住民族文化特質」、「正向報導」、「原住民族議題」，及「跨文化對話」等報導觀點，報導緊扣「部落」與「文化」核心，但卻疏於掌握「看門狗」原住民新聞報導原則，呈現部落內部爭議事件。
4. 原民臺駐地記者憑藉深厚的阿美族「文化底蘊」及流利的「族語能力」訴諸「集體價值」，順利進入部落，破除「權力距離」，完成採訪；反觀北區記者皆非阿美族人，同樣訴諸「集體價值」，以自身族群祭典「禁忌」做為採訪阿美族豐年祭時所持有的採訪準則，進而遵守傳統，權衡採訪手

段，消弭「權力距離」，完成採訪；兩者面對「部落」皆展現「高度規避不確定性」文化價值，「長期導向」文化價值亦呼之欲出。

5. 原民臺駐地記者豐富的阿美族「文化知識」幫助其在呈現「部落豐年祭」報導時，具備文化深度與意涵；反觀北區記者則因缺少阿美族「文化敏感度」，導致其在呈現「都會區豐年祭」報導時則流於千篇一律，少了「原味」。
6. 面對爭議事件，原民臺「記者」儘管有揭露議題的動機，但最終服從「新聞室」，兩者站在同一陣線，基於維護與部落間關係，美化、淡化報導中不利於原住民族群內部觀點，展現「高度規避不確定性」與「長期導向」文化價值，卻也點出原民臺與記者基於原民臺成立宗旨，以「部落」為本，無法徹底落實「看門狗」原住民新聞學原則，以「提供反論述」做為主要新聞實踐原則。
7. 面對報導中女性角色逸失現象，阿美族男性駐地記者訴諸阿美族傳統社會分工，試圖以男、女性權力展現場域分野，合理化祭典場外女性的缺席，報導中強調「男性價值」多過於「女性價值」，呼應「陽剛」文化價值；針對該類報導，北區女性記者以其經驗凸顯祭典中女性觀點的重要性，呼籲報導中應納入女性的聲音，輔以過去學者研究，報導應增加女性視野與故事外，研究者則認為應呈現完整文化脈絡，帶出阿美族祭典中男、女性別分工互補性的內涵，以破除二元對立的文化理解，平衡男、女性報導呈現，平等彰顯個別價值。
8. 綜觀本研究，可見原民臺基於身為族群媒體的立場，與部落、族人站在同一陣線，且透過文化價值指標，探看原民臺記者「文化價值」影響「採訪」與「報導」實踐的軌跡，實際反映在諸多新聞實踐面向，也應證本研究問題；原民臺「記者」的「文化價值」影響新聞實踐且深且廣，且其在與「部落」、「新聞室」維持著拉扯與妥協的過程中，再次驗證報導所呈現記者與原民臺秉持一致立場的事實，奉部落為圭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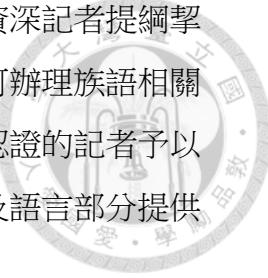
(二) 研究建議

本研究經報導及訪談分析發現，阿美族豐年祭相關報導對於「女性」報導「面向」與「篇幅」實然有限，阿美族男性駐地記者從祭典中對男、女性別分工，因而報導主要著重在「男性」角色的呈現，但女性北區記者卻覺不然，認為祭典之所以能夠完成，其中「女性」的力量不容忽視，因此常於新聞實踐中提醒自身女性角色的重要性；學者孫嘉穗（2016）亦認為「女性」是應該被看見的，且應多面向報導「女性」在族群社會文化中的角色與深厚底蘊，研究者亦深感認同，並且期待以「沒有場外的女性勞動，何來男性的祭典實踐？」一說，於本研究中拋磚引玉，希冀日後原民臺能有更多報導能夠呈現出祭典中的「女性」形象，並且能看見更多對於祭典中男、女性別分工內涵呈現的報導。

因此，研究者認為，應當由原民臺新聞室進行倡導，積極落實原民臺節目製播準則（2016）第二章針對「性別」相關報導之規範，其中第二點明列「確保公平呈現與參與機會平等」，在各種公共領域的言論發表中，注意不同性別應有公平的發言比例，且在專業領域中，不因過去傳統價值與性別分工，限制了性別形象刻劃；此外，原民臺應加強駐地記者與北區記者培力的工作，透過專家學者演講，以及性別工作坊，啟發男性記者的性別意識，多加關注族群文化中女性角色，也讓女性記者有更多信心，多報導女性故事，以帶動原民臺整體風氣。

本研究以原民臺記者「文化背景」做為探究其進行新聞實踐的主要影響因素，研究發現駐地記者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且具備豐富的阿美族文化背景知識，並熟習阿美族語，成為其在進行「採訪」與「報導」實踐時的最佳優勢；但北區記者因非屬阿美族群，採訪阿美族祭典多以自身文化及過去採訪阿美族祭典的經驗做為參考，導致在呈現阿美族祭典新聞時流於千篇一律報導方式，缺乏文化深度，儘管來自阿美族，也可能因不熟阿美族文化而有相同狀況。

研究者認為，原民臺可針對原民臺記者辦理講座與培訓課程，邀請原住民各族群耆老與專家學者進行演講，加強原民臺記者對各族群歷史、文化、語言與祭典的認識，讓記者實際演練採訪各族群新聞，並由專家學者給予建議；且定期辦理記者交流分享會，由頗具資歷的族語新聞記者與駐地記者向新生代記



者分享在新聞「採訪」與「報導」的實戰經驗，彼此交流，由資深記者提綱挈領，補足新生代記者於「文化知識」的不足。此外，原民臺亦可辦理族語相關課程，鼓勵記者學習族語，並且建立獎勵機制，針對取得族語認證的記者予以肯定，提高記者學習族語的動機，於本研究便針對阿美族文化及語言部分提供建議，進行新生代記者文化培力。

原民媒體為扮演「看門狗」角色，應發揮監督政府、揭露弊案，並且引導族群內部自省。經本研究可發現，面對爭議事件時，記者、新聞室因著原民臺設立宗旨，皆與部落站在、族人站在同一陣線，揭露部落現時處境可能為部落帶來傷害，因而使得原民臺記者新聞偏向報喜不報憂、美化報導而忽略實際存在的問題，全球原住民族電視臺亦面臨相同問題，研究者認為，我國原民臺可參考加拿大、紐西蘭、澳洲等國原住民族電視臺新聞製播方式，在有關報導爭議議題部份相互借鏡，思考如何在不侵害部落與族人的前提之下，揭露部落現況，促進族群內部對話；此外並鼓勵記者參與國內、外新聞獎項評比，於此過程更加精進基於族群文化為基礎的族群新聞報導，也拓展原住民族於主流社會中的能見度。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反思

因研究者亦屬阿美族群，欲探究「文化價值」對原民臺記者新聞實踐的影響，可能導致在分析他族群記者「文化價值」時忽略許多脈絡，也可能在分析阿美族記者「文化價值」時導致過度詮釋的情形發生；且研究者雖然身為阿美族，仍對許多祭典儀式不甚熟悉，不禁反問自身，真的能做這樣的探究嗎？

這也的確是一個嶄新的領域，在於研究原住民族群文化與新聞實踐間的關係，且「文化」涉及面向廣泛，難以認定某些影響因素純粹來自於某「族群文化」，而極力將某一族群文化抽離現今社會框架，在抽絲剝繭的過程中忽略了整體社會文化的影響。

對研究者來說，學者 Hofstede 的「文化價值指標」確實提供本研究進行原民臺記者文化價值分析的切入點，為完善本研究分析框架，研究者採用「長期／短期導向」文化價值，將其研究所強調的儒家思想轉換為各族群傳統核心思想，但研究者又無法針對各族群文化深究，歸納出如儒家思想所論核心概念，研究者認為此概念的借用流於強硬，尤其在面對原住民族群文化，係為截然不同脈絡，因此，研究者期待未來研究能夠針對某一族群文化，透過田野調查方式，深入了解記者族群文化，並試圖勾勒出得以替換「儒家思想」一詞，如同紐西蘭毛利族所遵守的「manakitanga」傳統文化價值，在我腦海中閃過的便是太魯閣族的 Gaya³⁰，亦翻作「祖訓」。

為了能更精確掌握「文化價值」對新聞實踐的影響，可採取一作法為，選擇單一族群祭典新聞，單一族群記者進行探究，論述便可專精。研究者希望未來能有更多相關研究，並發展更符合本研究興趣的「文化價值」理論，本研究雖可說是原住民新聞記者「文化價值」與「新聞實踐」的初探性研究，不過也因自己身為阿美族人的緣故，又企圖厚植原住民新聞學研究領域，如此，也才走了這一步。

³⁰ 太魯閣族的 **gaya**（祖訓），指祖先留下的生活規範，是太魯閣族人行為與道德的規範準則。
網址：<https://reurl.cc/0zg9j6>，上網日期：2019年7月15日



參考文獻

- 王玉民（1994）。《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原理》。臺北市：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王石番（1996）。《傳播內容分析法：理論與實務》。臺北市：幼獅。
- 王宜雯（1999）。《從宜蘭阿美族 Ilisin（豐年祭）看變遷中之祭典音樂文化》。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碩士論文。
- 王嵩音（1998a）。《臺灣原住民與新聞媒介：形象與再現》。台北：時英。
- 王嵩音（1998b）。〈原住民議題與新聞再現—以蘭嶼核廢料場抗爭為例〉，《台大新聞論壇》，5: 111-136。
- 王嵩山（2010）。《臺灣原住民－人族的文化旅程》。台北：遠足文化。
- 孔文吉（2000）。《忠於原味—原住民媒體、文化與政治》。台北：前衛。
- 方蘭生（2002）。《傳播原理》。台北：三民。
- 江吟梓、蘇文賢譯（2010）。《教育質性研究實用指南》。台北：學富文化。
- 吳欣駿（2012）。《原鄉與都市的豐年祭空間演變過程—以貓公部落為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茂政（1987）。《當代新聞學》。台北：正中。
- 李金銓（1988）。《大眾傳播理論》。台北：三民。
- 李富美、林榮章（1997）。〈阿美族豐年祭的巡禮—台東縣東河鄉阿美族豐年祭的觀察報告〉，《原住民教育季刊》，8: 99-116。
- 李美華、孔祥明、李明寰、林嘉娟、王婷玉、李承宇譯（2004）。《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台北：時英。
- 汪琪（1982）。《文化與傳播》。台北：三民。
- 明立國（1989）。《臺灣原住民族的祭禮》。台北：臺原出版社。
- 林子儀（1999）。《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台北：月旦。
- 林淳華（1996）。〈新聞記者工作自主權和決策參與權之研究〉，《新聞學研究》，52: 49-68。
- 林惠娟（2005）。《原住民的報紙新聞再現—以花蓮縣長補選期間殺豬涉賄選爭議為例》。佛光大學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靜玉（2007）。〈文化產業之研究—以南勢阿美族歲時祭儀為例〉，《大漢學報》，22: 135-153。



- 林春鳳（2008）。〈從豐年祭談原住民之民族認同〉，《臺灣原住民研究論叢》，4: 101-133。
- 林福岳、陳楚治（2008）。〈原住民族傳播權利之探源及詮釋〉，《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1(1): 59-81。
- 林福岳（2010）。〈由「他者」轉向「我群」—原住民電視臺傳播主體性實踐之探討〉，《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3(2): 131-162。
- 林福岳（2012）。〈主體性的呈現、傳播權的實踐：臺灣原住民族自主傳播的發展歷程〉，《臺灣原住民研究論叢》，11: 1-24。
- 吳紹群（2002）。〈內容分析法與圖書館學研究〉，《圖書與資訊學刊》，40: 47-61。
- 洪貞玲（2006）。〈誰的媒體？誰的言論自由：解嚴後近用媒介權的發展〉，《臺灣民主季刊》，3(4): 1-36。
- 洪貞玲（2013）。〈主體性、公共性的想像與實踐：原民臺建置的政治經濟分析〉。國科會委託研究計畫（編號 NSC 102-2410-H-002 -079 -MY2），未出版。
- 洪貞玲（2014）。〈原住民新聞學：臺灣及全球觀點與實踐〉。行政院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編號 104WFA0150396），未出版。
- 倪炎元（1998）。〈從「山胞」到「原住民」傳播權益—報紙對原住民正名運動的論述〉，《台大新聞論壇》，5: 79-110。
- 孫俊彥（2012）。〈儀式性質與歌舞系統：談馬蘭部落豐年祭歌舞的類型問題〉，《民俗曲藝》，177: 1-55。
- 孫嘉穗（2011）。〈原住民媒介逸失的女性身影〉，《性別平等教育季刊》，64: 134-137。
- 孫嘉穗（2014）。〈原住民新聞與文化翻譯：由媒體文化工作者探看原住民新聞的文化翻譯〉，《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7(2): 1-40。
- 孫嘉穗（2016）。〈原住民新聞中的性別與族群議題〉，《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38: 57-109。
- 高德義（2004）。〈臺灣族群平等的保障與實踐—以原住民為主體的探討〉，《新原素—族群文化與發展會議論文集》，頁 30-56。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 許木柱（1987）。《阿美族社會文化變遷與青少年適應》。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曹琬凌（2002）。《電視新聞專業規範與研究》。台北：公共電視。
- 張子媛（2003）。《阿美族豐年祭》。台北：遠流。
- 張育綺（2007）。《台北縣阿美族都市豐年祭展演之當代意涵》。臺灣師範大學運動與休閒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錦華（2012）。〈雲豹之眼：從雲豹新聞獎平面作品看原住民新聞觀點的建構與改進之道〉，《原住民文化傳播學刊》，3: 4-34。
- 張錦華（2014）。《多元文化主義與族群傳播權－以原住民族為例》。台北：黎明文化。
- 郭祐慈（2009）。〈阿美族傳統農業知識〉，《臺灣原住民研究論叢》，5: 99-124。
- 郭良文（2010）。〈蘭嶼的另類媒體與發聲：以核廢料與國家公園反對運動為例〉，《中華傳播學刊》，17: 43-74。
- 陳芸芸譯（2004）。《全球化下的傳播與文化》。台北：韋伯文化。
- 陳雨嵐（2004）。《臺灣的原住民》。台北：遠足文化。
- 陳清河（2004）。〈科技、政治與弱勢傳播—以臺灣原住民族之廣電媒體近用為例〉，《臺灣民主季刊》，1(4): 109-138。
- 陳國明（2009）。《跨文化交際學》。中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陳彥廷（2010）。《文化「傳統」如何落腳異鄉？－權力與象徵在溪洲部落阿美族豐年祭之變遷與重塑》。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美玲（2011）。《原住民節慶導入體驗行銷之研究—以馬太鞍阿美族豐年祭為例》。亞洲大學經營管理學系碩士論文。
- 陳維瑩（2013）。《阿美族織羅部落豐年祭儀歌謠》。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右果（2014）。《臺灣原住民族群的「他者」影像再現－以公共電視《原住民新聞雜誌》為例》。南華大學傳播管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金燕（2015）。〈臺灣重要原民祭典之性別平等檢視：以阿美族豐年祭及鄒族戰祭為例〉，《性別平等教育季刊》，71: 79-89。



陸正誼（2004）。《蘭嶼原住民電台發展之研究》。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彭家發、馮建三、蘇衛與金溥聰（1997）。《新聞學》。台北：國立空中大學。

游明儀（2003）。《新聞談話性節目的內容分析暨其節目中記者專業意理實踐之研究－以「新聞駭客 News98」為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程之行（1991）。《大眾傳播的責任》。台北：遠流。

程笙（1995）。〈到東海岸過夏季年－阿美族豐年祭〉，《師友月刊》，336: 62-67。

黃宣衛（1989）。〈從歲時祭儀看宜灣阿美族傳統社會組織的互補性與階序性〉，《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67: 75-108。

黃貴潮（1998）。《阿美族傳統文化》。台東：交通部觀光局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黃緯強（2002）。《阿美族豐年祭參與現況及其影響因素之研究－以台東縣長濱鄉樟原村為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與休閒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貞瑋（2008）。《文化展演與認同：馬太鞍阿美豐年祭的傳統與現代》。暨南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驛淵（2008）。《當「Ta'ay」遇上「記者」—從多元文化觀點探討「paSta'ay」觀光化及其報導》。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楊開煌（1988）。〈中共研究中的內容分析法及其爭議與反省〉，《東亞季刊》，20(2): 27-44。

楊政霖（2005）。《「原住民新聞雜誌」服務品質之研究－以原住民閱聽人觀點為例》。東華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論文。

楊仁煌（2008）。〈阿美族之歲時祭儀〉，《臺灣原住民研究論叢》，4:1-26。

達拉烏拉彎・畢馬（2001）。《臺灣的原住民－阿美族》。台北：臺原出版社。

劉慧雯（2016）。〈客家電視臺駐地記者之研究：新聞選擇與組織團隊的角度〉，《廣播與電視》，39: 29-58。



- 蔡中涵（2008）。〈台東市阿美族豐年祭儀的變遷與傳承〉，《臺灣原住民研究論叢》，4: 27-64。
- 蔡維庭（2012）。《社會變遷中高寮阿美族的性別角色與社會認同》。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論文。
- 盧夔竹（2007）。〈花蓮縣阿美族 Ilisin（豐年祭）音樂現況研究－以港口部落為例〉。臺灣師範大學民族音樂研究所碩士論文。
- 謝偉姝（1998）。〈公視原住民記者觀點之探究〉，《臺大新聞論壇》，5: 61-78。
- 謝世忠、劉瑞超（2007）。《移民、返鄉與傳統祭典：北臺灣都市阿美族原住民的豐年祭儀參與及文化認同》。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謝博剛（2010）。《「玩」作為一種族群認同生成的策略：四個 Pangcah／Amis（阿美族）豐年祭的比較研究》。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鍾嘉順（2009）。《我們是誰？我們自己述說－原住民族電視臺中原住民新聞報導之內容分析》。南華大學出版與文化事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顏寧譯（2011）。《質性研究設計與施作指南》。台北：五南。
- 羅文輝（1993）。《新聞理論與實證》。台北：黎明。
- 羅文輝（1998）。〈新聞人員的專業性：意涵界定與量表建構〉，《傳播研究集刊》，2: 1-49。
- 羅文輝（1995）。〈新聞記者選擇消息來源的偏向〉，《新聞學研究》，50:1-13。
- 羅素玖（2005）。〈性別區辨、階序與社會：都蘭阿美族的小米週期儀式〉，《臺灣人類學刊》，3(1): 143-183。
- Alia, V.(2009). Outlaws and citizens: Indigenous people and the 'New Media N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a and Cultural Politics*, 5, 39-54.
- Alia, V.(2010). *The new media nation: Indigenous peoples and global communication*. New York, NY: Berghahn Books.
- Brown, D. R.(1996). *Electronic media and indigenous peoples: A voice of our own?* Iowa, IA: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Brooten, L.(2008). Media as our mirror: Indigenous media of Burma(Myanmar). In P. Wilson & M. Stewart(eds.), *Global indigenous media: Cultures, poetics, and politics*. North Carolina,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Cohen, B. C.(1963). *The press and foreign policy*. California, CA: Institute of Governmental Studies o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Condon J. C. & Yousef, F.(1975).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diana, IN: Bobbs-Merrill.
- Curnow, J.(2002). A brief history of Maori-language newspaper. In J. Curnow, N. K. Hopa, and J. McRae(eds.), *Rere atu, taku manu! : Discovering history, language, and politics in the Maori-language newspapers*. New Zealand, Auckland: Auckland University Press.
- Fuller, L. K.(2007). Top-down community media: A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from Singapore. In L. K. Fuller(ed.), *The Power of Global Community Media* (pp. 129-138).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 Ginsburg, F.(2002). Screen memories: Resignifying the traditional in indigenous media. In F. D. Ginsburg, L. Abu-Lughod, and B. Larkin(eds), *Media Worlds: Anthropology on New Terrain*. California,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rixiti, J.(2011). Indigenous media values: Cultural and ethical implications. *The Handbook of Global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Ethics*, 2, 342-363.
- Hall, E. T.(1976). *Beyond Culture*. New York, NY: Anchor Books.
- Hofstede, G., & Bond, M. H.(1988). ‘The confucius connection: From cultural roots to economic growth’.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16(4), 5–21.
- Hall, S.(1997).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New York, NY: Sage Publications.
- Hofstede, G.(2001). *Culture's consequences: Comparing values, behaviors,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across Nation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Hallin, D. C. & Mancini, P.(2004). *Comparing media systems: Three models of media and politics*. U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nusch, F.(2009). A product of their culture: Using a value systems approach to understand the work practices of journalist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71(7), 613-626.
- Hanusch, F.(2012). The visibility of disaster deaths in news images: A comparison of newspapers from 15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74(7), 655-672.

- Hanusch, F.(2014a). Dimensions of indigenous journalism culture: Exploring Māori news-making in Aotearoa New Zealand. *Journalism*, 15(8), 951-967.
- Hanusch, F.(2014b). Indigenous cultural values and journalism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 brief history of Māori journalism.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4(4), 390-403.
- Ignatieff, M.(2007). *The rights revolution*. Canada, Toronto: House of Anansi Press.
- Kroeber, A. L. & Kluckhohn, C.(1952). *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 UK, Cambridge: Peabody Museum.
- Kluckhohn, F. R. & Strodtbeck, F. L.(1961). *Variations in value orientations*. Illinois, IL: Row and Peterson.
- Kress, C.(1996). Representational resourc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subjectivity: Question for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In C. R. Caldas-Coulthard & M. Coulthar(Eds). *Texts and practices: Reading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pp.15-31). UK, London: Routledge.
- Littlefield, D. F. & Parins, J. W.(1984). *American india and alaska native newspaper and periodicals, 1826-1924*. Connecticut, CT: Greenwood Press.
- Lie, R.(2003). *Space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 interdisciplinary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culture, and globalizing/localizing identities*. New Jersey, NJ: Hampton Press.
- Loew, P. & Mella, K.(2005). Black ink and the new red power: Native American newspapers and tribal sovereignty.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7, 99-142.
- Levo-Henriksson, R.(2007). Media as constructor of ethnic minority identity: A Native American case study. In L. K. Fuller(ed.), *The Power of Global Community Media* (pp. 55-65).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 Mowlana, H.(1997). *Global information and world communication: New fronti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nd ed.). UK, London: Sage.
- Meadows, M. & Molnar, H.(2002). Bridging the gaps: Towards a history of indigenous media in Australia. *Media History*, 8, 9-20.
- Pietikäinen, S.(2003). Indigenous identity in print: Representations of the Sami in news discourse. *Discourse & Society*, 14(5), 581-609.

- Roth, L.(2000). Bypassing of Borders and Building of Bridges: Step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boriginal Peoples Television Network in Canada.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62(3-4), 251-269.
- Rennie, E.(2007). Remote beginnings, metropolitan developments: Community and indigenous television in Australia. In L. K. Fuller(ed.), *The Power of Global Community Media* (pp. 21-29).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 Roth, L.(2007). (re) Coloring the public broadcasting system in Canada: A case study of the Aboriginal Peoples Television Network. In L. K. Fuller(ed.), *The Power of Global Community Media* (pp. 31-41).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 Pietikäinen, S.(2008a). Broadcasting indigenous voices: Sami minority media produc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3, 173-191.
- Pietikäinen, S.(2008b). Sami in the media: Questions of language vitality and cultural hybridisation. *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Discourses*, 3(1): 22-35.
- Samovar, L. A., Porter, R. E. & Jain, N. C.(1981). *Understand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alifornia, CA: Wadsworth.
- Servaes, J.(2000). Reflections on the differences in Asian and European values and communication modes.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0(2), 53–70.
- Samovar, L. A. & Porter R. E.(2001).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Connecticut, CT: Wadsworth/Thomson Learning.
- Servaes, J.(2002).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al Diversity’. In the meet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ijing, CN.
- Weaver, D. H. & Wilhoit, G. C.(1991). *The American journalist: A portrait of U.S. news people and their work*(2nd ed.). Indiana, Bloominton: Indian University Press.
- Weaver, D. H. & Wu, W.(1998). *The global journalist: News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New Jersey, NJ: Hampton Press.
- Wilson P. & Stewart, M.(2008). *Global Indigenous Media: Culture, Poetics, and Politics*. North Carolina,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Zabaleta, I., Xamardo, N., Gutierrez, A., Urrutia, S., Fernandez, I., & Ferré, C.(2010). Between Language support and activism: A complementary journalistic function among European minority-language newpeople. *Journalism Studies*, 11(2), 190-208.
- Zito, G. V. (1975) *Sociological Concepts*. Ohio, OH: A Bell & Howell Company.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成立沿革，《原住民族電視臺》。取自於：

<http://www.ipcf.org.tw/about.jsp>

阿美族豐年祭介紹，《臺灣原住民族資訊資源網》。取自於：

http://www.tipp.org.tw/ceremony.asp?CD_ID=190

〈阿美族婚喪喜慶結束辦 Pakelang 完工慶祝〉，《原住民族電視臺》。取自於：
於：<https://reurl.cc/VdEnA>

公共電視與原住民傳播，《公視與原住民影像展》。取自於：

http://web.pts.org.tw/php/news/abori/exh/docu_1.htm

阿美族部落介紹，臺灣原住民族資訊資源網。取自於：

http://www.tipp.org.tw/tribe_detail3.asp?City_No=19&TA_No=7&T_ID=313

節目介紹，《荒野求生秘技》。取自於：

<https://www.discoverychannel.com.tw/tvshows/manvswild/>

龐凱駿（2011）。〈傳統建築之美：庫巴 鄒族文化核心〉，《原遠流長》。取自於
<https://reurl.cc/y3EOq>

〈青年動員"觀光"觀光局 反祭典淪為觀光〉，《原住民族電視臺》。取自於：

<https://reurl.cc/YAOGX>

〈祭典號令青年 花縣長夫人遭批荒謬〉，《原住民族電視臺》。取自於：

<https://reurl.cc/N7rne>

太魯閣族文化介紹，《原住民族委員會》。取自於：<https://reurl.cc/0zg9j6>



附錄、原住民記者訪談大綱



記者個人背景與媒體機構背景資訊

- 請問您來自哪一個族群？
- 您是傳播媒體背景出身的嗎？
- 何時進入原民臺？在原民臺負責報導哪些新聞？
- 您是否有參與過自身族群祭典的經驗？
- 阿美族（祭典）文化與您自身族群（祭典）文化的不同？
- 每逢暑假，是否經常處理阿美族豐年祭典的新聞？
- 首次報導阿美族豐年祭典的經驗？

豐年祭典新聞採訪

事前規劃

- 報導前，您對阿美族豐年祭的了解有多少？
- 於採訪前會做什麼準備？對於該祭典之認識，諮詢的對象？

進行採訪

- 在報導阿美族豐年祭的過程中有何印象深刻的事情？
- 採訪過程中，您如何找尋消息來源？如何與消息來源互動？如何蒐集不同觀點？過程中會特別留意哪些事項？

採訪困境

- 在報導阿美族豐年祭新聞的過程中，您是否曾遭遇過挑戰或瓶頸，例如語言隔閡、性別限制、族群差異？您又如何因應？
- 報導角度是否受發稿單位／消息來源影響？如何面對？

報導撰寫

- 同屬阿美族群的您，採訪自身部落祭典時，報導會選擇呈現哪個面向？何種觀點？如遇正反觀點衝突時，您如何應對與報導？影響觀點呈現的因素有哪些？（屬阿美族群之記者）
- 不屬阿美族群的您，採訪阿美部落祭典時，報導會選擇呈現哪個面向？何種觀點？如遇正反觀點衝突時，您如何應對與報導？影響觀點呈現的因素有哪些？（非阿美族群之記者）
- 對於該祭典理解之深淺是否影響報導撰寫過程？諮詢的對象是？
- 撰寫報導的過程當中，是否曾與審稿人於報導內容與觀點上有意見相左的狀況？他／她給予何種建議？報導最後露出的結果與您所期待／交稿時相同嗎？
- 消息來源是否曾給予您報導上的反饋？是否與他們的期待相符？

反思

- 報導阿美族豐年祭典之後，您如何評價該祭典儀式／活動？
- 您認為自己的報導有何優缺點？
- 反觀主流媒體對該祭典之報導方式，其符合您心中對好的祭典新聞的標準嗎？
- 與自身族群祭典文化對話／對照，有何差異？自身文化對於您在新聞報導過程有何影響？

對於原住民新聞的看法

- 您認為如何報導祭典新聞才是恰當？而其中包含了哪些原則？
- 在報導祭典新聞時，您會強調何種報導觀點或面向？為什麼？
- 您認為原住民祭典新聞應該具備何種元素？與主流媒體有何不同？